

第七期 (2023 年 9 月)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



组织 宣传 学习

联系&订阅: RSF-kan@tutanota.com

(使用安全邮箱向我们的邮箱发送“订阅”，即可在每月 27 号收到杂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目录

关于我们.....	3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8
论统一战线的问题.....	9
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	26
论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	34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38
我们是怎样进行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	39
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	49
融工中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问题-兼对离火《去进行政治灌输吧》一文的批判.....	56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60
评“九二大起义”的根源及意义.....	61
简评《治安管理处罚（修订草案）》引发的舆论热点事件.....	67
2023年8月中上旬到9月中上旬工人运动的趋势.....	70
第四部分 国际文章.....	72
对贡萨罗主义的批判性评价.....	73
第五部分 宣传内容.....	102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103
第六部分 斗争艺术.....	104
元数据-隐形的追踪器.....	105

关于我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致力于在中国推进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阵地》旨在通过对一些普遍公认的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帮助马列毛主义者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我们也十分乐意帮助任何真诚的想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志们进一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和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养和能力一方面是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帮助同志们少走弯路。（例如：各种合法斗争的方法、发展秘密组织的经验、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的艺术、和反动警察斗争的经验、信息安全技术）

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以来，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就从社会的主人沦落为了雇佣奴隶。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被资产阶级完全专政的地位，而毫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世界上绝不会有人甘愿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甘愿永远任人摆布。中国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一秒。而且，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统治阶级必然会向工人阶级发动越来越多的进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必然会有重大提升，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头一次见到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由此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实际是“反击”）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十分高效的维稳能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保证雇佣奴隶制能够延续到永远）。中国的统治阶级（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任何挑战，哪怕是最普通的经济斗争也会招致最无情的打击，在这种法西斯国家里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需求都难以做到。面对这样的法西斯怪物，我们的工人们除了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几乎别无他法（当然了，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要非法斗争）。而工人们除了组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谁能够设想工人们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一场小规模、最初步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即使是最初步的经济斗争也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宣传联络工作的，更不要说未来的政治斗争乃至最终的阶级决战了。一句话：没有组织就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没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疯狂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知道，虽然工人们非常需要组织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恰恰又是这个武器。要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从而“武装”工人阶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环境极端恶劣。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容不得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前几年那些对资产阶级统治完全无害甚至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补充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搞得东西和现在未明子之流的活动差不多）都遭到了最严厉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就有些人跳出来，告诉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应该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推进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等等主义者”。诚然，真正的革命者也会分析困难，

但真正的革命者分析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克服困难以实现最终的目的，而绝非逃避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等等主义者”的“高论”，那么即使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机会，更不必谈无产阶级专政了。试想在我们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真的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群众即使真的无法再继续往日生活了，但那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群众会跟着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实际联系却又自封为“革命家”高谈阔论的人走吗？到时候整个运动最好的结局估计也就是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样被回过神来的统治阶级粉碎罢了。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是促成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一罢了，而真正能使革命危机转变为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足准备。我们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准备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走在相对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所在；第二方面是我们是否具备具体的斗争实践方法、必要的物质和技术等等现实物质条件。

虽说第一方面是根本性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要抛下第二方面不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现实物质条件严重不足的这一矛盾呢？毛主席说得好“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一句话，我们不是成为了大多数才去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我们不是在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后才去运动的，而正是在运动中逐渐具备各种物质条件的。（当然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盲目的去送命，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快速的学习并成长起来）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要争取到必要的现实物质条件应该在坚持正确道路的前提下先投入到斗争中去，而绝非一味的等待。当然了，这世间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绝对真理，所谓的正确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无数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理论和经验罢了，而这些理论和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今后的斗争。这也正是马列毛主义的生命所在。

近来中国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虽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非常强大，但也绝非是不可战胜的。疫情时期我国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如：上海封城时期的各种群众运动、富士康工人们的斗争、乌鲁木齐事件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冲关事件、白纸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难道最终没有迫使当局放弃了极端反动的“清零政策”了吗？（当然了，有的人肯定会说全面开放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假真如此，这也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群众用实际行动愈发的迫使政府放弃他们的极端政策，这就使得他们在十月份都还坚持要防疫到底却又在十一月份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向。）然而这个时候估计又有些“革命家”跳出来准备“实践”一番了，从成天专注于喊口号、做大梦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中共（毛）”[2]，到部分贡派的朋友们的所谓“中国毛主义者小组”（他们僵化的简直震撼世人，他们竟打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抵制不存在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3]再到最近成立的所谓“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都是如此。这些朋友们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当成某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当成是某种只需要几个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再出份宣言就可以变出来的东西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戏法师傅，绝不能从真空中变出一个党来，我们也相信他们也同样不具备此种神奇魔力。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从这个逻辑来看，目前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任何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顶天不过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罢了。

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而又缺乏斗争的武器的现象。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句话：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而我们正是要使革命的阶级逐步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劳动者能自觉的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并最终能够组织起来走向彻底解放自己的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而要改变现状以达到这

个目的，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批具有各种必要素养的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这也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将首先联合起来，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宣传、去组织、去斗争。当然了，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到工人里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那里去，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命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连自己都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科学的认知又怎么能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对革命的学说都不能有一个基本理解的话又怎么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呢？如果我们没有发展革命组织的必要知识素养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要手段怎么能够代表群众并使他们走向革命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种渠道，来把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所总结出来并尝试加以分析，以促进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身在基本理论上的进步，为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也就是我们这份杂志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杂志也必须要做到能推动我国目前还很弱小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现实组织工作，要推动建立革命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家组织，所以它必须还要服务于我们现实组织工作的理论、政治路线需求。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要求不顾世界各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不相信各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以极端傲慢的态度要求革命率先胜利的国家不顾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强行推进所谓“世界革命”，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很可能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

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因此我们的杂志相对而言应该不会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肯定还是会有有的）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

合”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墙内的网络平台上，用视频之类的途径进行所谓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工人们并不会花大把时间在这些平台上广泛活跃，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去网上大量的看这些视频。通过这种倍受限制的方法去缓慢的直接影响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主要任务。而对于有更高追求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则更不会把看视频当作提升自己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是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汉字也要比任何视频或音频的效率高得多，尤其是在传播严肃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更不要说我们在那些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只能做最初步的政治宣传而任何一点涉及关键内容的东西都是难以涉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像“火星报”一样现在就要扮演一个能够团结起全国各地活动小组的全国政治报的角色。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根本还不存在什么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们相结合的活动小组。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线下组织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我们只是要促进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往这个方面发展，从一个更基础的地方开始起步做起；从这点看，以叛徒“米宁”为代表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前几年搞的什么“全华政治报”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存在。诚然，布站的马列毛主义者们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很多方面的工作上，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布站老管理们的不少判断（例如那“五个基本判断”）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了，这些判断在当时大多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内容放在今天都极具价值，而有的地方在今天却显得过时了，例如将当下的中国判定为所谓的“二流帝国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是目前唯一有野心又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在有的问题上，布站的同志们又谈的太少了，例如台湾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并且布站的老管理们如今还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如：提出了完全错误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恶劣的诋毁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在一些行为上故意的阻碍和破坏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线下组织工作，老管理们其在布站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问题严重的伤害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和革命工作者们，用错误的路线影响群众等等。这些错误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批判，但我们也不否认布站以前的历史成绩，不否认布站其他优秀的同志，不否认布站现在还在起正面作用的革命工作，不否认其他受其影响的还很有革命意愿的进步人士。我们目前要求批判布站老管理们现在的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径和要求布站改正其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迅速认识错误改过自新，我们也希望布站的其他同志们和受其影响的人士们能认识到问题，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批判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帮助其改正错误、克服其错误影响等等。

现在我们的经验确实十分有限，对于很多问题不可能现在就能做出非常完备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一些最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也做不到，在这点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超越我们曾经的老师的。虽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并尝试进行分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只局限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社会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当然，我们还需要全国优秀的马列毛主义同志和先进群众们的参与与帮助。除此之外，我们也试图使我们的内容能切实的帮助到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使它能对我国的革命工作者们能起到现实的有益帮助。

并且我们除了这个刊物本身的作用外。我们革社也希望通过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等方式来团结起我国优秀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以更好的斗争各种机会主义和纠正我国革命力量的各种错误；并竭力推动我国革命工作的发展，努力消除那些种种阻碍我国革命事业前进的

阻力；并能在这样的不断团结、不断消灭机会主义和错误、不断发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逐步的建立起我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对于未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对此我们只有两句话可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要持续阅读我们的作品，请联系我们在下面段落标注的邮箱地址，发送“订阅”的内容。

如果是有意见或问题、以及有投稿或其他事情的读者也请通过邮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力回复。（当然如果是恶意破坏的行为或有安全风险我们则不会回复。）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

对读者朋友们的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或当作接收我们订阅的邮箱。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反动派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出于对同志们安全的考量，我们也不会接受来自国内邮箱的订阅，也不会回复联系，还请理解。

并且，读者朋友们如要向革社（RSF）进行投稿或者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我们的，请通过邮箱以邮箱文本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请不要向我们发送文件、文档等一切形式的附件以及各种链接，为避免安全隐患，我们不会接收附件，也不会打开任何链接。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第一部分是本刊物最重要的部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运动中主观力量的精神条件，是我们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也是革命的灵魂所在。我们在这部分集中创作或整编了一些其他国内外同志的优秀文章，用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和其他进步群众们的理论成长，以及指导目前我国各种早期幼年的进步组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读者和同志们的要求、建议，以及我们的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目前把该部分重心转到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

论统一战线的问题

革社（RSF）编辑部

一. 统一战线的本质

任何统一战线都应该有着明确的目的，它始终是统一一定的因素以对抗和他对立的因素，这里就有着非此即彼互相敌对的双方，当然在此之外也有着中立于两者之间的力量，但矛盾的发展会促使中间的过渡力量一定要朝某一个方面发展。统一战线的本质也就是要尽可能的团结除对立因素之外的其他所有因素以解决他的对立面。对于新事物来说，则是要通过这个过程而把事物发展到一个由它主导的新阶段；对于旧事物来说则是要消灭新事物的挑战而维持旧事物的统治地位。

所以，统一战线的哲学内涵就是一种矛盾关系，它是矛盾的更高级体现，它的彻底实施代表着矛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矛盾对立面双方的斗争发展到最全面的阶段。

统一战线的性质如此，故必须抛弃一切错误的做法。比如那种只追求统一而不追求和对立面作更彻底的战斗的“统一战线”就是虚伪的统一战线，是为统一而统一的“战线”，这种统一就是没有目的和没有力量的统一，其必然要失败的；我国的改良派就经常搞这种“统一战线”，欺骗我国的无产阶级和更广大的受压迫群众为他们的利益和种种不切实际的改良愿景所服务，而不是为了消灭与我们根本对立的共同的阶级敌人。而那种只追求战斗、而不追求或没有很好的去做到统一一切非对立面因素的统一战线则也是虚伪的统一战线，是“假统一”真“战线”，其必然是做不到广泛的统一的，也是必然要破产的；我国的贡派也经常搞这种虚伪的“统一战线”，他们也经常口喊民主集中，但实际行动却是完全是相反的，得罪的人比统一的人要多得多，所以根本做不到统一，甚至也做不好战斗，他们往往首先对非根本对立的群体作坚决的斗争。

因此对于社会范畴的统一战线来说，民主集中则是必要遵循的原则，不能足够的实施了民主集中就绝无可能达到统一战线的结果，民主集中始终贯穿于整个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民主集中详细的来说，民主是过程、是条件，集中则是结果、是目的。只有先达到了一定的民主才有可能进一步的集中，具体说来，这个“一定”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式以及各个具体事物的条件所规定的；然后在此民主的基础上推动了并且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了才能算真正做到了统一，同样的，这个“一定”也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式以及各个具体事物的条件所规定的。所以，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和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做法也都是错误的，前者只重视了目的而没有提供足够以完成目的和必要过程的条件，后者过度重视了过程和条件而没有或者没有很好的去完成目的。

二. 统一战线必要性

任何新力量要战胜旧力量，它不得不首先使自己团结起来，单个的、分散的或者少数的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所以即使在无产阶级的内部也需要实施一定的统一战线来把这整个无产阶级给团结起来。可能有人会疑惑，历史上的统一战线不是一般用于团结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吗？这是因为在今天的我国，即使是马列毛主义者内部也有数不清的各种组织，活动在电报等墙外软件的马列毛组织至少就有几十个，而墙内活跃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则数以千计，线下的各种小组也是零零散散的，秘密存在着许多的。而要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就必须用统一战线方法，绝不是像多年前的一些如“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党”以及之前的“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一般宣布成立一个党就可以解决了的。名义上的党和实际上的党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们统一战线就是要达到实际上的革命分子乃至无产阶级的统一，是首先追求实际上的党而非名义上的党，自然要形成一个实际上的党还涉及其他许多问题，但本文不详细论述这一点。

所以对今天的中国革命来说，中国的各种革命组织、革命分子就首先需要统一战线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而我国革命分子的统一就会使得我们以此有了进一步的实施新的统一战线以统一更多力量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分子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并且我们也知道，今天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分子中还有少数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恶劣的阻碍作用，这些分子是要把他们踢出我国革命力量行列的，是要彻底斗争打垮他们的。不克服机会主义的影响则剩余的革命分子也难以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需要统一战线来把大多数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以战胜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则是我们推动我国革命和革命分子团结的绝对对立面，不克服他们是不行的。因此，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团结大多数革命分子起来克服少数混进革命分子行列中来的机会主义分子影响的战线，而一旦完成了这个使命，我国的革命分子就统一起来了，我国的革命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统一起来的革命分子们作为一股团结起来的重要力量就有条件进行下一步的活动以继续推动我国革命的前进。

而对于非我们对立面的其他进步力量和其他阶级来说，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未来也需要新的统一战线把这些力量给团结起来，以消灭与我们根本对立的共同敌人——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把事物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不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相当程度的团结起这些力量，则消灭官僚垄断的统治是无可能的。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这么去做的条件，因为最有可能去实施和最能推动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观力量还不存在。具体来说，我国今天的革命分子尚且不统一、各自为战，而无主观力量去统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统一则无主观力量去统一我国社会的其他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统一起来的主观力量则是团结其他力量的条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主观力量的带领，其他的力量是势必要随着既有轨道而运动的。正如列宁同志在怎么办里所论述灌输论的内容一般，一切历史事实都证明了，劳动着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仅靠自己是无法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势必要通过革命分子的灌输，必须要和革命分子广泛的结合起来；没有这个过程，无产阶级势必只能在既有的资本主义轨道上自发的运动；而其他阶级更是如此，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广泛和其他社会群众、其他阶级所结合，没有无产阶级的带领，这些中间阶级、各类群体是一定要遵循着既有的轨道运动的，他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社会主义的结果的。

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如此，今天的革命者不得不正确的利用这种统一战线以团结大多数的力量以打击真正的敌人，使事物发展到新的阶段，不断的壮大革命力量。

三. 统一战线的范畴

过去我国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后来也建立过反对苏修的统一战线，这两种统一战线是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统一战线。并且同一统一战线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有不同相对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新民族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一种，我们也可以从周恩来当时的讲章中看到这样的区分。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

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分为三种不同的统一战线，但这三种不同的统一战线又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范畴。前者是特殊、是具体，新民主主义是一般。所以，之后的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在一般方面、它们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其他的具体团结目标和所针对的直接对立面（包括敌人），在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和采取的斗争形式上，在各个时期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产生了不同阶段、不同特殊性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在其基本的一般性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性质，内容上也会根据不同的性质、形式有所区别，工作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统一战线，从性质上、形式上、工作上也和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有根本不同。

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内容一样，今天我国的革命分子需要一种统一战线来使大多数革命分子团结为一股统一的力量战胜机会主义以推动我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革命分子也需要新的统一战线来统一无产阶级，未来的无产阶级也需要新的统一战线来统一其他阶级和社会群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所讲的统一战线都是有着不同的性质、目的和内容的。

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会有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对付混进革命分子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中，少数最进步的革命力量所创建，引导大部分革命分子的团结是主要内容，而少数机会主义者则是它的主要对立面，这就是这条统一战线的政治范畴。而革

命分子团结无产阶级的统一阵线中，革命分子是主导者、团结整个无产阶级是主要内容，阻碍这个团结的各种分子、各种机会主义、各种政治派别则是它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一条统一战线的政治范畴。而在无产阶级团结其他阶级和社会群众的过程中，革命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团结其他阶级和其他群众是主要内容，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则是其对立面，这些便是这一条统一战线的政治范畴。不同的政治范畴下就有不同的统战路线，而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只能进行一定的统一战线；而任何人或组织不根据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来采取相应政治范畴的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失败。因为他们所根据的力量还是不存在的或者还是不成熟的，又或者它错误的判断了对立面，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不可达到的。

除了政治范畴之外，很多时候还必要有活动范畴。活动范畴是相对次要的，他是统一战线政治范畴所需要采用的各种活动策略。任何只要稍微参与了我国实际革命工作的同志就会发现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墙内和墙外相当程度的割裂了开来，墙外的组织一般是从墙内来的，墙内的力量则还大部分的不了解墙外的力量，这还只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在革命工作上墙内、墙外的力量更是天堑一般被割裂开来的，根本没有多少结合，就算有结合也大多数是不安全的、而非科学的结合起来的。这就不得不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墙外组织的工作没有墙内组织广泛的配合则墙外组织的宣传岂不是还没有根基吗？墙外组织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根基、而墙内组织也没有使他们成长的材料。同样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很难做到同时统一两个方面的力量，因为没有能够去推动这种统一的主观力量，况且两个领域革命分子的对立面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只能做到先统一一方而后统一另一方；就条件而言先从墙外统一起是更好的选择。除了墙内、墙外的活动范畴，还有线下和线上活动范畴的差异，我国的线下组织也零零散散的孤立存在的，但现在也有少数线上组织开始发展起了自己的线下组织。除此之外，在各种工作部门的活动范畴中，在各个行业的活动范畴中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不得不从先从一定活动范畴内的统一战线开始，从微小的团结和斗争开始，在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后，才能有使我们又能去建设更广范围内的团结和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条件。这要求我国的革命分子必须从最现实、最具体的条件出发，从最基础的第一步开始做起，不断团结起革命力量以克服一个又一个对立面来增长我们的力量和彻底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整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进行量变到质变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运动。

四. 统一战线中的各种角色

谈了统一战线性质和范畴问题。我们再来归纳统一战线中的各种角色，说明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的性质和不同作用。任何统一战线都是针对共同的某一对抗性矛盾的力量联合，除与这条统一战线所根本对立的对抗性敌人外，统一战线内部至少有这样五种角色：**领导力量、进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派、敌人中的分化力量。**

领导力量

任何统一战线都有一个势力、一条路线起着主导作用，所以领导力量就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和灵魂。它至少决定着整体统一战线一半的性质，另一半由敌人的性质决定。它主要决定着整条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即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发展方向，以及对统一战线对立面的态度和对付方法。因此，它将决定着一条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

在过去的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它领导着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力量真诚的团结起来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它的目标是把中国从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风险中解救出来，使中国往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它对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发展方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个角色，调节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乃至至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这是因为在和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性的对抗矛盾下，这些矛盾基本都成为了次要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尊重各个党派的相对自由性。所以这个角色主要决定着整个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发展方向，和这一时期许多破坏统一战线的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及另外所有的想利用统一战线更多的为自己阶级或群体、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时而要投降与日本帝国主义，时而又大肆的破坏、取缔统一战线（如袭击共产党和要求取缔各党派既各党派的军队等），中间派较差的部分则经常怀疑统一战线，中间派的中较好的部分能积极参与统一战线却不可能自觉的引导统一战线中的内部矛盾往这个方面发展。只有进步力量，在这一角色的引导下也能够最积极的、最自觉的发挥同样的作用。

同样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也提出统一战线的运动方向和历史目的问题：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

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明确的提出来，要实行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历史目标，它要领导着统一战线中的各个角色往这一方向发展。而这些角色只靠自己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纲领，也就谈不上付出这样的积极行动，只有在“领导力量”角色的领导下或引导下时，它们才会开始走向这个方向，并往这个方向付出行动。

综上所述，“领导力量”的角色可以说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作为一条统一战线得“领导力量”必须得责无旁贷的积极的起到这样的作用。

进步力量

进步力量是任何统一战线的根基，它是推动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也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但他的发展也需要经过坚定的斗争，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

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在这一条统一战线中，进步力量的范畴是比较大的，基本包括了除敌人、汉奸以及各种资产阶级以外的部分。这是因为在团结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路线上，这些力量根据其阶级或群体利益都是和这条路线高度统一了，是最有可能成为积极的拥护者和践行者的。它们和“领导力量”区别只是在于这些力量分散、构成成分众多的群体的利益不是和共产党的利益所完全统一的，以及能够赞成统一战线的路线而非共产党的大部分独立主张的。所以许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如一部分中农、富农等）等，就是这种力量。但从这些力量中也有一些群体或个人是能够发展成共产党员的，大部分共产党员就是从这些群体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一般的进步群众和党员的区别在这里就成为了“领导力量”和一般进步力量的区别；当然，在进步力量中也相对较消极的部分，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抗日以追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基本不赞成共产党其他独立的主张的。当然差异还体现在对统一战线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和力度的问题上，这同样也是因为各阶级、群体、个人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

所以进步力量内部至少区分为三种，即一般的进步力量、较消极的进步力量、较积极的进步力量（即可以发展成“领导力量”的进步力量）。它们的一般性是支持领导力量对于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差异则体现在除统一战线之外对领导力量的独立主张的态度上，以及对统一战线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和力度上。

进步力量的发展是要经过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顽固派和统一战线外部的敌人作斗争才能够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非常鲜明的体现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足够的进步力量，或是进步力量不能战胜统一战线内部的顽固派和统一战线外部的敌人，那么统一战线就有瓦解的风险。因此，进步力量是统一战线的根基，它是推动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也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因此任何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众，也要注意推动我们所进行的一切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力量的发展，使它们得以巩固；并且对于进步力量内部来说，我们尽力使积极的部分能够发展为更优秀的领导力量的角色，而使一般的部分发展为积极的部分，使消极的部分变得不再消极。

中间力量

中间力量根据统一战线的不同，其具体内容自然也不同。但一般的来说中间力量是介于顽固派和进步力量之间的一部分力量。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中间派主要是各种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根本利益缘故，它们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部分政策，但又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部分政策；它们和顽固派有矛盾，同时又和进步力量有矛盾，想利用顽固派和进步力量的矛盾。抽出来谈一般的统一战线的问题时，也总会遇到这样的群体，它们对于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体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支持一部分、不支持一部分的，所以他们的立场是游离于两个不同的方向之间的。并且在中间力量的内部之间也有各种差异，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对部分政策的支持或反对的不同态度上，因此其支持和反对的程度、方法也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群体内部至少也会有三个部分：更统一战线和进步力量的部分、中间游离不定的部分、较反对而支持顽固派或敌人的部分。

并且这部分群体由于进步力量和顽固派的斗争、统一战线和敌人的斗争越发严峻和激烈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要进一步分化。我们需要必要的一些斗争、充足的自身力量，以及用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方法把他们尽可能的团结起来，最差则是保证其中立态度。

顽固派

顽固派是同时和我们根本对立的敌人有矛盾，但是却完全不支持或者基本不支持我们所领导或参与的统一战线的群体。过去顽固派是这样的：

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三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过去的顽固派虽然在抗日，但是又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反对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的。所以它们在许多时候又反过来攻击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意图使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彻底的接受他们的路线和统治。虽然他们仇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需要他们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

并且这里顽固派内部也是为两个部分的，即降日派和抗日派。他们都同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矛盾，区别在他们主要采取了和哪一个部分为敌。所以一般的来说顽固派也至少可以分为亲敌派和抗敌派。而毛主席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来对付，反击他们进攻和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但同时也尽可能的团结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体所领导统一战线一定要正确的处理顽固派的，一方面要反击他们的进攻和破坏，一方面又要尽可能的团结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今天顽固派也是存在的，当革社和东风联合起来和布站的老管理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并意图形成反布站老管理机会主义的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有一两个顽固的贡派分子跳

了出来攻击和污蔑我们的联盟。他们之前派人去东风组织捣乱却被群众揪了出来而遭到了普遍的反攻，在自己的群里也被别人驳斥，过去以错误的方式反对布站也失败了，现在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目前在电报和墙外其他领域上活跃的几个贡派分子就是目前反对我们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顽固派，因为我们反对一些贡派对马列毛主义的歪曲主张，所以这些分子就要攻击我们。他们反对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反对布站的路线，除了在贡萨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他们主要是因为贡萨罗问题和我们分歧，融工路线问题次之。自然，这些个贡派分子的力量是非常的小的，相比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力量和我们所要克服的其他机会主义的力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目前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也要足够的在意起这个问题，以防出现什么可能的变故。虽然他们同时也不赞成布站的路线，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正确的去反对布站老管理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据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作我们统一战线的顽固派，但他们目前还没有特别鲜明的立场，对于我们的联盟和布站则处于游离的普遍反对的立场中。所以他们处于顽固派中的中间游离派，势必要随着我们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我们和布站老管理等机会主义斗争的发展而不断的分化而导向亲敌派和抗敌派。对于这部分分子我同样要足够的反击他们对我们攻击，也要需要团结他们的一些力量以反对布站老管理的机会主义。

敌人中的分化力量

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张学良部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国家也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了德意日法西斯势力。这部分力量在其他时期基本是与我们对立的敌人，但却在我们敌人内部矛盾不断变化的一些时期中，他们却能和我们合作起来以对抗更反动的敌人，而形成一种临时性的同盟。所以他们就从过去的敌人变成了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的抗敌派。但同时也要注意这种抗敌派的性质和一般的抗敌派是有所不同的，需要具体的区别对待。随着国内社会危机的普遍发展和国际帝国主义矛盾的增加，这样的敌人内部的不断分化的现象是一定会不断的产生的，这样的现象自然是有利于我们对付各种敌人的统一战线的，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力量。

我们必然需要审时度势，在必要时机下和敌人中的分化力量达成临时性的同盟以对抗另外一部分更反动的敌人，把这些分化出来的力量变为我们统一战线中的抗敌派，以加强我们对抗敌人的力量。但对于他们的各种问题和错误的行为，我们也要正确的处理。

五.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在谈论了统一战线中的角色问题后，我们在谈谈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的问题。这里自然要谈及许多基本的原则和工作方法。除了一开始谈到的民主集中的原则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

A. 统一战线中各单位的独立自主问题

正如我们之前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文章里的内容一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相对的自由权，就党派问题来说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有各党派的相对自由权，如果破坏这种相对自由权就会破坏了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因为我们要使统一战线中的内部矛盾不扩大，以求非对抗性的和平解决，我们不能在统一战线中主动制造不必要的对抗性矛盾（除非顽固派等挑起而需要必要的反击），不能使任何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颠倒主次为取代了敌我矛盾。

所以一般的来说，在任何统一战线中各种具体的单位，或是党派、组织、个人，他们以独立的地位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都应该由一定的相对自由性，这种相对自由性的边界必须是统一战线的共同的民主集中所决定的，决定也应该是合理的。但我们也要说清楚，由于这种相对自由的边界是由集体决定的，并且当我们进行这种马列毛主义组织的统一战线时，它的历史使命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不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的是战胜敌人后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统一，我们的追求是战胜马列毛主义阵营内部的除机会主义分子外的革命派的统一，它的统一就是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重建，自然这各重建除了真正的革命派的统一外还需要线下工作的一定发展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党。然而这条统一路线中大部分革命分子也都是能赞成这个目的的。

B. 有代表性

任何统一战线都必须要有它的代表性，否则它就还是空洞的和无力量的统一战线，如果一个号称要统一整个民族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本民族其他一些进步阶级和中间阶级代表的足够参与，就不能证明它代表了本民族，也不能证明它真的团结起了本民族的力量。我国过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这样做的：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过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了三种力量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即确保了党能够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步，又保证了统一战线的稳定性，也保证了统一战线的代表性。对于其他各种统一战线也是这样，在保证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和稳定的基础上，也应该根据其性质和内容，也要使他的成员也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自然这个代表性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具备的，但领导力量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马列毛主义力量统一战线也应该尽力使自己战线具有代表性，增加各种革命组织的代表和我国杰出革命分子的参与。

C. 如何领导

在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文章中有所涉及，我们这里刨除特殊一般的总结来谈。

在任何统一战线中，要保证最革命的一部分力量的领导，不是通过要求别人服从我们来完成的，不是通过喊口号来完成的，这是毛主席特别鲜明反对的一点。只能通过正确政策和我们自己模范的工作来完成，以此为根基、利用民主集中来说服和教育其他力量，引导他们往我们的路线上发展并愿意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在统一战线中，掌握主导权的革命派和其他进步力量必须是最积极拥护自己团结的部分，他必须要通过自己模范工作和民主集中以及说服教育来实行这种领导，这种领导不是强迫式的领导，是自觉的、民主集中的领导，是正确路线的领导。

并且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统一战线的多数和群众的多数，统一战线的任何工作都不能独断专行，或把其他参与者置之不理。一定要照顾多数、照顾全局，养成和其他统一战线参与者一道工作、一道商量的习惯，这样才能建立起正确路线和正确工作对统一战线其他参与者的领导作用，也能借此培养起他们对正确工作、正确路线的遵循习惯。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和未来的统一战线中，我们的革命派也都要积极的做到这一点，用模范工作和民主集中、说服教育来实现革命派的领导，用一道工作、一道商量的方法建立起正确路线和正确工作对其他参与者的领导作用。

D. 必要的斗争和斗争的方法

在统一战线的团结以外，有和我们对抗性的对立面的敌人斗争，也有统一战线内各种矛盾的斗争。和统一战线外的敌人的斗争必要性不必要再讲了。但统一战线内部也有一些必要解决的斗争。

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种是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都是在领导力量、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内部或它们之间产生的，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也会影响我们工作的进行和实施，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发展，也是必须要去解决的。对于这种矛盾，革命派

要积极的用民主集中、民主协商、说服教育的方法来推动解决，也要使其他分子也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

而对抗性的矛盾就要用对抗性的方法来做相应的处理。这种矛盾一般都是顽固派挑起的，只有他们才会经常的制造关于统一战线的对抗性矛盾。对于他们总的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比如在过去毛主席就是这样应对的：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这是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主席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步，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所以对于挑起对抗性矛盾的，特别是这些顽固派挑起的对抗性矛盾，一定要以针锋相对的斗争求团结的方法来对付。统一战线内部出现对抗性矛盾，处理不正确就会损害乃至使统一战线灭亡，革命派不在统一战线内挑起这样的矛盾，但对于挑起这样矛盾的部分（特别是顽固派）则一定不能软弱，否则统一战线就会被顽固派攻破。

而和这种对抗性矛盾作斗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统一战线的问题，因为他是统一战线内部产生的对抗性矛盾而不是和对立面敌人产生的对抗性矛盾，所以斗争的方法也要有所区别。

具体方法就如毛主席在上文所指出的：“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

我们不挑起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对抗性的斗争，但要坚决的反对这种斗争，这就是有理；不要惧怕被挑起这种斗争，我们一切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我们要对他们的挑衅有所准备，当他们挑起这种斗争时，我们就争锋相对的对付他们，这就是有利；每一次针锋相对的反击在达到反击胜利目的后又立即休战，不追求扩大矛盾，要求继续团结以对抗敌人，这就是有节。这种斗争原则也可以概述为自卫、胜利、休战。

E. 路线斗争

路线问题是决定统一战线性质的问题，不仅统一战线中各角色和单位之间会出现一定的路线问题，革命派需要以正确的处理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也就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两种方法去对应的处理。在领导力量的内部有时也会出现路线斗争，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了，这个路线斗争的结果也会直接决定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结局，这只能靠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力量内部解决，同样的根据路线斗争的严厉情况也会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性质的，非对抗性矛盾用组织内部的民主集中来和平协商解决，对抗性就要用适应的根据情况来相应的处理，如教育、批判、革职、开除等等方法。

F. 基本发展策略

根据以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个策略在今天也可以通用的，对于一切革命派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则政策。但考虑到领导力量的作用，比如毛主席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问题中就提到了需要有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和三分之一进步力量的代表，而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是有所不同的，这里的共产党是起领导力量的力量，并且他也要解决自己党内和统一战线内的路线问题，关于这部分力量的作用也可以补充进原则性的策略。而对于敌人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可以和统一战线在一定时期内合作的分子的作用也可以补充进这个策略中。

综上所述可以把这条策略扩充为这样的：“巩固领导力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利用敌人中的分化力量。”

巩固领导力量主要是为了保证正确路线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需要革命派解决自己内部和统一战线内的路线问题，使统一战线的革命性质得到保证；发展进步力量则是扩大能够积极拥护和执行统一战线正确路线和政策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则是为了使更多的群体参与统一战线以聚集更大的力量防备顽固派和对付敌人；孤立顽固力量则是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中的分化力量则是为了更好的战胜敌人。

G. 统一战线的参与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统一战线中，有直接参与、积极完成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领导力量，也有统一积极参与，也自觉服从统一战线各种政策的许多直接的进步力量。但同样也有部分参与和大部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部分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有部分参与并且少部分执行的中间力量和顽固派中的抗敌派。也有不参与、不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很多时候还要攻击统一战线的顽固派（当然统一战线的许多问题上也不会让他们成为直接参与的一方，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机关），但他们只是和统一战线有着某些共同的目的，所以在不攻击统一战线的时候也能算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因为敌人相同；可利用的敌人的分化力量中，大致也是如此。

所以统一战线也自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参与形式，有直接的参与的形式，有间接参与形式，也有不参与的形式。

直接参与的形式中，有积极接受和执行统一相关政策的部分；有积极参与，但不积极接受政策的部分。对于这两者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问题和用不同方法来团结他们。在间接的参与形式中，也有积极接受和执行统一战线的相关政策的部分和不积极接受和执行的部分。在不参与、不执行的形式中，也有积极对敌和积极对我的两个部分。而对于这些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部分，我们就要以不同的方法处理问题和团结他们的力量。而革命者特别是统一战线中的积极的革命者，不能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方法局限为一种参与方式、一种联合或团结方式，在团结和利用不同的力量的问题上一定要用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同的统一战线下所要掌握的方式亦不同。

五. 我们今天的统一战线

我们今天的统一战线也必须从今天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以采取正确的范畴。在政治范畴上我们要求首先团结大部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分子，以清除各种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少数混进这个革命队伍里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但这个统一战线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它还要推动我国的革命活动，发展我国现在的革命工作；因此，发展革命活动、革命工作，反对阻碍这个活动和工作的的发展的一切力量也是它的内容。这个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不断斗争的矛盾，是在斗争中形成我国马列毛主义者的广泛的团结，形成革命事业的一个较大发展，这个矛盾的矛盾解决就意味着事实上的新的统一，即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的条件的完备的统一。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不可能做到统一小资产阶级、或其他什么政治团体的任务，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们目前应该去做的，这需要未来有更大的力量（至少是有一个真正的、有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党）并以新条件下的新的政治范畴的统一战线去做。我们现在这个统一战线目前只拉拢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力量，即各种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和个人。我们这个统一战线的直接对立面的敌人便是一切形式的危害我国马列毛主义力量团结的恶劣的机会主义力量，特别是一切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恶劣的机会主义分子或组织，以及克服一切阻碍我国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们要力求基本消灭他们的影响，并通过统一战线适当的工作，团结起其他大部分革命分子或组织加入我们的统一战线；包括线上的力量和线下力量。如果这个统一战线基本完成了这个目的，那么这个统一战线就达到了统一大多数国内马列毛主义力量的历史使命，如果这个统一战线在质量上它的领导机关和各种重要的活动、组织机关也达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程度和水平，那它就事实上的形成了一个党，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我国大多数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组织（线上和线下）的统一战线，只是说在质量上它也还要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所以，从政治目的来说，这个统一战线是要通过战胜各种机会主义和推动革命工作的方法来团结我国大多数的马列毛主义者；它的整个历史使命就是主要通过以上的过程来形成一个中国的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

在活动范畴上，我们认为目前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先从墙外的统一战线开始，采取先墙外后墙内的策略；同时我们也要发展线下组织的统一战线，墙外公开、半公开活动，线下半公开、秘密活动为主。之所以要先墙外后墙内，这是因为墙外革命力量是我国能动性相对较强、平

均的革命素养较高、安全素养较高、规模较小，在这里实现统一是最容易的一个范畴，也是目前相对最有深远意义的一个范畴。一旦这里的统一战线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就有力量扩大目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活动范畴而把其他领域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以及更广泛的克服机会主义影响。而这个策略将会根据我们统一战线变化而相应的调整。

从我们革社和东风团结起来对付布站老管理的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开始。也从斗争公社的加入形成马列毛主义的统一战线开始，也从丧钟加入这个统一战线开始。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要团结精力应该还用于更多墙外的革命力量和秘密的、半公开的线下革命力量的加入上；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不断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各种革命工作，使它成为我国马列毛主义力量的模范；同时它还要克服如同之前的布站老管理一般的在墙外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及各种机会主义影响，主要是影响我国革命分子的团结和革命工作的发展的各种机会主义。而在这条统一战线中，我们也应该以最大的诚意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使参与这条统一战线的各种革命分子、革命组织能够享受足够的民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真正的集中和统一。

因此，我们也欢迎布站和电报大群的优秀同志能够克服布站老管理的机会主义影响而参与我们的马列毛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的事业。

就参与的问题来说，只要各种“革命力量”它不是机会主义的，都可以在适当的方式下、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统一战线。比如各种革命组织可以派出一定的组织代表，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通过民主集中的原则逐步的形成统一立场、统一路线、统一活动、统一工作的结果。而单个的革命分子也可以通过安全的方式保密参与其中，形成我们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下的新同志。

加入、参与我们统一战线的方式，不一定需要直接加入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加入的合作也是可以的，在适当的条件下某种程度的联合或是临时合作也是能够的。优秀的个人也可以加入统一战线或合作、或参与统一战线工作。不一定要组织，因为我们统一战线的各项革命工作或是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也是需要各种同志们的参与的，可以直接加入统一战线或合作，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直属工作部门或合作等等。当然这些具体政策在每个个人和组织身上的情况也是可以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根据对应的具体情况来尽量作最适应的针对性政策，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政策或联合的方式。那些不适合直接加入、参与我们统一战线的组织或工作部门的、暂不需要和这类内容合作的，也有可能反对某些机会主义的问题上或其他所需要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合作等等，这也算是增加了我们共同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这里论述的这种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是科学的、有原则的、有明确目的的统一战线，也是力求执行民主集中和尽可能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也是不死板的、灵活统一战线。

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

革社（RSF）编辑部

我们注意到我国目前墙外的马列毛主义者中，有人对于线下组织工作中的“扎根”问题产生了一些疑惑，产生关于是否“扎根”的争论，有人提出反对“扎根”的路线。在墙外，“扎根”是布站的老管理最开始提起的，我们革社虽然根本反对目前布站老管理的许多根本错误的路线，但我们不反对“扎根”，我们是赞同扎根的。在墙外领域，由于受各组织反布站老管理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问题所影响的部分原因，已经有同志开始反对“扎根”或者对此产生了疑惑，或是分不清“扎根”和“不扎根”的区别，甚至有人也开始质疑“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现在的工作成果和路线，因为他们把“到工人中去”也看做是“扎根”的融工路线。这个政治倾向是很危险，如果这种倾向肆意发展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目前还很弱小的革命分子的线下组织工作（特别是融工工作）。诚然，布站老管理的最早提出来的那种“扎根”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看来的确是问题很多的，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去扎根的理由，革社编辑部在这里要更进一步的、全面的说明这个问题，还要说明“扎根”的重要性，以及试图以更实际、更科学的阐明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种“扎根”。

一. 布站老管理的“扎根”和这种“扎根”的不足

在《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这篇文章中。过去的布站老管理首先提出“扎根”的路线，并引入了斯大林的巴库经验，文章正确的反对了当时佳士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融工中的流氓主义的问题和脑力小资论的“反扎根”错误。在当时这还是比较进步的，当然这篇文章对于现在融工的理论和工作路线需求来说仍然是非常不足并且是有问题的。

在老管理的《佳士运动与马列毛主义者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篇文章中也详细说明佳士当时的一些问题。

发动佳士运动的团队频繁的组织短期、中期的在各个工厂中的活动（一般几个月），他们频繁的在各个工厂流动，试图鼓动起大的社会运动，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人斗争中，他们都没有很好的组织起广大工人进行运动，他们在佳士运动中只是发展出了极少数的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工人和他们团队本体加起来只有三十人左右。由于不善经营和没能发展出坚实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组织成员普遍的低士气和革命工作涣散而又脱离群众，他们迫切的希望通过发动一场激烈的运动来拯救整个团队。

他们盲目发动的运动自然面临了失败，成员也被捕。但之后又进行了多次盲动的行为，如冲击派出所、号召全国左翼声援等等。于是这个不超过30人的团队就暴露当时全国大部分左翼（当时许多的左翼组织的确去进行了支援），这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觉，使得包括北马在内的全国各类左翼组织被反动派很大程度上的清洗了一波，全国高校和工厂自此再一次加强了对左翼的管控政策，至此我国左翼组织和左翼分子的工作迎来了一个新的低谷。直到今天，“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工作成果才算正式的标志着我国革命分子的革命活动再次恢复到了2018年的水平。过去佳士团队的部分成员在警察的打击下投降叛变，还编写了投降的材料被派发到各地镇压机关给左翼青年们阅读，成为了反动派的优质劝降材料。这些自然可以说明我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左翼是非常警觉的，对付社会运动是非常成熟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我国当时左翼普遍的幼稚性、盲动性等问题。但更重要的组织工作路线的彻底错误。除了佳士运动外，与佳士运动团队关系莫测的中毛共（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江苏周群的中革共（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成为了那个时期我国左翼运动的代表。

布站的老管理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融工工作者应该扎根，更多动员群众，形成“熟人网络”等观点，利用斯大林的巴库党经验来试图说明这些内容。这个时期，因这些事件间接产生的

还有脑力小资论等提法，一些认为脑力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而不值得信任的种种荒谬的观点，也在这里也是被得到反驳。

不能扎根、不能建设坚实的组织、脱离群众、盲目发动运动、认为脑力劳动者不可靠，这些就是这个时期线下组织工作路线（也包括融工路线）的重要问题。这种问题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和现在的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想依靠来波大的来解决问题的“左”倾机会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和今天中国贡派的路线也是基本符合的（军事化的党、同心圆的建设、发动人民持久战争、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和其他急不可耐要在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群众关系、坚实的群众组织、有力的革命组织时就要试图发动远远超出自身掌控能力和应对能力以及群众理解程度的运动的急性病先生们的问题也是基本符合的。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是支持布站老管理所提出“扎根”的。必须通过“扎根”才能解决这些“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布站老管理的所提出来的那种“扎根”也是不足的，他们的提法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工作计划，更没有足够的组织工作来配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提法基本也成为了他们不去进一步发展线下组织工作（特别是融工工作）的理由。

布站老管理们对于自己的“扎根”理念的解釋和“熟人网络”的解釋是比较零碎的，各个文章里都有一些零碎的内容，但意思大致相同。

难道接触群众就是一个完全不懂行的人上来就问工人收入多少？受的压迫重不重？振臂一呼，一闹而平天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换位思考从反动派角度想想这个问题。白崇禧在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时有句名言：“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反过来想一想，反动派更怕哪条路线？他们难道怕你孤立地在厂子里闹？简而言之，我们要做各个行业的明白人，钻研它，学透它，不如此，根本没法在行业扎根，更不可能建立在该行业的牢固根基。革命者只有长期锚定某个行业长期耕耘，几年、十几年的干下去，才能成为该行业的明白人，熟悉产业情况、熟悉行业趋势、更加熟悉该行业工人阶级的状况，最终成为地下网络的有效节点。

- 《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

在这篇布站老管理们的代表性文章里提出的“扎根”还是论证得很不充分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实际需求来说是不足的，当然它也因此被现在的新观点所抨击。但“扎根”是必须的，我国各个行业都需要革命工作者扎根（特别是工厂），这些“扎根”的革命工作者也确需要了解各个行业的业务。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各个行业发展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而不只是熟悉该行业工人阶级的状况当一个地下网络的节点；而要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时间可短可长，也许最短的确只需要几个月，但长也会需要好多年。所以布站老管理的“扎根”是缺乏明确的目的，并且这里谈及的时间也是缺乏条件的，仿佛为了达到这个有效节点就要一直待下去。这里就无法把革命分子和一般进步群众给区分开了，并且也是没有正确的现实的目的和工作计划的，如果革命者发展出来的革命组织、群众组织已经能够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了，新发展出来的群众中革命工人和进步群众们已经可以很好的完成我们的这个基本目的了，那么革命者还需要无条件的呆在这里吗？他还可以去做工作，或者去别的地方重新进行这种扎根以达到建立组织的目的。所以布站老管理们至今都无所作为，而甚至反过头来也进行攻击“到工人中去”的工作成果。无有效目的的、无工作计划的、不进行切实工作的“扎根”就是布站老管理们的“扎根”的问题。

“熟人网络”是什么？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是好汉我挺你。胡志所在的万晖厂的工人历来有团结斗争的传统。几年前，因为万晖厂整月整月的加班，又不按劳动法算工资，大家集体罢工，并去市政府上诉，厂方迫于压力答应了诉求：周末固定休息，平时加班1.5倍，周六加班双倍工资，加班自由，之前少给的加班费和20%的滞纳金也全额补齐。胡志把师傅英姐的遭遇诉诸自媒体，遭到开除，被开除的当晚，胡志去大哥大姐家里作客，讲到被开除的事情。原以为大家可能不理解，不料大家都知道他被开除的原因后，都为他愤

愤不平。亲不亲，阶级分。大哥大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煲肉汤、切水果，透露给他万晖以前的黑历史，还介绍他到熟悉靠谱的老乡厂里工作。

-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对于“熟人网络”的解释也是不充分的。革命分子通过熟人网络来发展群众，最后又要通过熟人网络来使群众运动起来。自然这篇文章里承认了要发展群众组织，也承认了要去工厂里利用这种熟人网络来发展群众，也承认可以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来发展进步群众。所以在这篇文章里，熟人网络就是一种革命分子利用各种形式联系起进步群众、发展群众的关系，老管理们在这里即把它当作了一种方法，也把它当作了一种组织。一种革命分子所领导着的包含许多进步群众的组织。这的确是一种方法，也的确是一种组织。布站老管理在这里的问题在于没有把一般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分子的组织区分开来，更别提和职业革命家组织区分开来了。这是布站老管理经常犯的错误，无法很好的区分一般的群众组织、革命组织、革命家组织、无产阶级的党。而这些区别对于融工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无法区分这些不同的组织，自然线下组织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向也就会不明确，实际相关的组织工作也就会产生各种混乱，这样的内容是还不足以服务我国广大的、而又细致具体的革命组织工作的。单单用这样的内容去指导实际组织工作者，然会导致负责工作的人漫无目的、工作也无从着手。这就是只谈熟人网络的下场，因为现实的工作情况要比他们所掌握的理论复杂十倍、广阔十倍。所以熟人网络的文字在这里主要表现为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实际工作需求，我们不能说它什么用处都没有，它的确是很有用处的。但它只告诉了我们现实工作者一些会在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工作需要的小部分的内容、它只揭示了所要掌握的一小部分工作方法，至于我国现在线下的革命组织工作的实质和发展条件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规律、需要和可以达到的目的等等则毫不涉及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站老管理们提出的“融工”和“熟人网络”的历史局限性是如此之大，它们完全不足以指导实践，它在反对佳士路线的错误时起到了许多有益的帮助，但从来不能很好的服务相关的融工实践。但这两个观点也的确能够有利于实践，所以这两个观点也算是布站老管理们的历史贡献了，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多做一些这样贡献，而不是现在像“孔明借东风”似的搞破坏（那里的观点就特别反动了）。

今天，布站老管理们犯了错误，在融工问题上提出了种种错误的、荒谬的机会主义观点遭到了许多同志们的反布站。现在的新十月的离火先生提出了反对扎根的提法，还有一小部分贡派分子也具有类似的观点，他们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志。他们反对布站，甚至到了反对“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现在的融工工作。主要由于离火先生的提法和其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我们认为现在关于“扎根”和“反扎根”的内容已经彻底变化了，变为了现在的融工工作是以厂外活动为主还是厂内为主的两条路线。

二. “到工人中去”的“扎根”和反“扎根”的观点

实际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特别的讲述“扎根”的东西。我想“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之前也不会想到自己现在突然会和布站老管理们的“扎根”观点扯上了关系。因为就之前的情况来说，布站的老管理们恰恰认为“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是不扎根的代表，他们在“孔明借东风”里攻击“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不扎根，认为他们是佳士路线的泛左翼融工。

过去被布站老管理认为是不扎根的代表，现在变成了扎根的代表。那为什么现在有人把“到工人中去”看作“扎根”路线的代表之一了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现在也不得不把他们看作某种程度的“扎根”路线的代表了呢？

这是从离火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开始的，即《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

当下，对于渴望实践但是却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做的知识分子们，有这样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

我想要提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刚开始时的政治灌输和理论学习一定要符合所接触的工人的情况，要与他们本身的被压迫的地位，现实的各种矛盾相联系，少列些晦涩的数据，多讲些通俗的比喻；少说些死板的教条，多讲些生动的理论；少说些之乎者也，多讲些是啥为啥怎么办。而实现以上这三条要依赖于对工人们的一切生产生活、政治观点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

-《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

这一段前面还有一大截内容是批评“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问题的，并且在这个段落里总结式的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的路线归结为了“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的路线，离火先生在这里是认为这条路线是先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的路线。然后争锋相对的提出了另外一条思路，即不需要去工厂扎根，而是知识分子在工厂周边活动，直接就能做好政治灌输和理论学习的工作路线。

除了这一个问题外，这一段话前面那一段批评“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内容，也和布站老管理们在“孔明借东风”里犯的错误相似（但不完全一样），他们同样的根本的曲解了“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观点，也是认为对方提的“交朋友”的工作方法是对方工作的工作目的和性质（即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路线的），我们认为这么说为时尚早。所以这个相似的问题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论证只要同志们翻翻我们上期月刊的文章和详细看看离火先生的文章就知道问题是类似的了。

离火先生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看作是“扎根”路线的，布站的老管理不把“到工人中去”看作是“扎根”路线的。离火先生对“扎根”的评判标准是“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布站的老管理是错误的认为别人是“一次罢工就原地解散的”而不“脚踏实地，长期耕耘”。两者都是错误的，但对扎根的理解可谓是完全不同；前者是根本的反对扎根的观点、根本的反对以到工厂中去为主的融工路线，后者是实际的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从实际工作上和实际行为上背叛了自己以前提出来的路线。所以，布站老管理和离火先生各自谈的“扎根”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离火先生提出来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以离火先生对“扎根”的理解来看，先不论离火先生对“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曲解，联系上下文（我们后面还会谈到离火先生对现在融工工作的理解），离火先生其实是不认可进厂融工的工作路线，或者认为这只是次要的。它提出来的争锋相对的、他认为是更正确的路线，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路线。

离火先生的这个提法实际上也是在向我们提问，对于我国目前的融工工作来说，我们革命分子（离火先生这里提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目前是到工人中去进行组织工作更重要一些，还是从他提的到工人周边去做组织工作更重要一些呢？我想任何有足够的现实工作经验并能从工人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同志们都应该能很好的做出正确的判断，即目前到工人中去进行组织工作更重要。

并且这个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离火先生在这里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是很不严谨的，这个提法暴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分子立场。他在这里是不自觉的用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考虑革命运动的需求的，我们希望离火先生能认识到这一点错误。如果我们谈学生（因为我国现在大部分左翼的确是学生），学生自然也能勉强算作知识分子，学生也的确是无法进工厂里扎

根的，但如果用革命分子这个整体的提法来说就不一样了，革命分子即可能有学生，也可能有其他工人，也可能有社会各行业者。对于那些已经从学校毕业的，可以出去劳动的革命分子来说，扎根工厂的融工是有条件做到的，他们就可以不保留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进去进行扎根的融工工作。所以我们这里也不是要强迫学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工厂扎根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组织工作，学生短期的、间歇性的融工工作完全无法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他们放假最多两个月，以前其他种种原因，导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现实的，知识分子自然能够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有他的特殊作用，但他的力量是局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以知识分子立场的提法来代替革命运动的整体需要，不能单从知识分子、但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革命组织工作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革命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整体角度来思考的话，没有非学生的革命分子的长期的在厂内的融工，要使工人能受到普遍的政治灌输是很难的，没有这些分子的足够工作而要使工人们有组织的进行系统的、预先想好的、有长期准备和计划的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果不能用革命的方法首先从无产阶级的最现实的日常生活、日常劳动的角度出发来影响、鼓动、组织、动员他们，而只是从他们周边、外围、间接的角度出发去这么做，那么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是一定产生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只靠厂内的组织工作也是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相比厂外工人组织工作，厂内工人组织工作是第一性的，厂外的工人组织工作是第二性的。

并且我们一旦根据我国革命运动的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还能看到离火先生提出的这个路线的许多不足。既要在工人周边长期活动，又要长期接触工人、组织、教育工人，那我们就得很大程度上专门养着一些不工作的、或者兼职的人员来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现在是肯定养不起，我国现在没有多少厂内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再考虑到我国工人阶级的高度流动性、我国工人的高强度的工作（普遍的12小时工作制），这种机会非常少（甚至平时许多工厂的工人们离不开工厂），这就使得这些厂外周边活动的同志能起到作用非常有限，如果没有更加强大的厂内的同志们的工作，厂外工作就产生不了足够的效果。在这里厂内的组织工作是内因，厂外的组织工作是外因；厂内是根据，厂外是条件。我们应该先做好厂内，再做好厂外，这才是合乎逻辑和历史规律的。并且任何有足够劳动经验并做了足够现实考虑的同志都能察觉到，如果有人想要进行专门的厂外工作，就必须要有厂内的同志养着他，或者至少养着他们一半；所以单从现实的条件来说，我们也应该先做好厂内的组织工作，才能发展一些在厂外活动的专门的人，当然这种人很大程度上来讲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职业革命家没有足够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支持是无法想象的，而那种将来的那种专门在厂外活动的职业革命家，最好也要从前一个时期在厂内活动的革命分子中选拔出来，否则就很难保证将来那批工厂周边的职业队伍是可靠的。

最后，离火先生有这样一段总结：

现有的“融工”忽视政治灌输的重要性，轻视政治因素，缩小政治灌输的范围和深度，使得奉行“融工”的人无数次的错过了提升当下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机会；忽视党的作用，推迟建党的过程，使得革命工作容易陷在手工业方式的局限性中，不仅不能当满足工人运动的需求，甚至因为忽略自觉因素而在某种程度上当了工人运动的尾巴。

工人阶级已经被推向这样一个境地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已经使得工人阶级经济上普遍停留在维系基本生活和后代养育的边缘，在政治上几乎丧失自身话语权，工人们在这种压迫中不断产生要改变现有状况的想法。

工人运动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富士康和海珠区的斗争表明，工人反抗这个制度的愿望已经非常强烈了，但是工人的大规模斗争在统治阶级的镇压之下不得不从反对一个资本家的斗争发展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然而工人的分散状态，经验得不到保留的现状，没有与资产阶级暴力机器作斗争的经验和自觉性都表明了自发的工人运动需要更向前迈一步。

目前的工人运动中已经存在着对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进行否定的萌芽了——这种萌芽来源于工人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面临阶级镇压的经历对于自发运动的局限性的否定，要求且必然要将当前的工人运动转向工联主义亦或社会主义的方向。要将工人运动向着社会运动的方向转变，非得对工人进行阶级政治意识的灌输，非得用党将工人组织起来不可。

-《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

这一篇文章只专门的批评了“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所以这里的第一段话指的“现有的‘融工’”只能是专指“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了，并且默认他们代表现有的融工。那一段的批判内容简直就是把列宁在《怎么办》里批判《工人事业》报的内容基本照搬过来了，只是没有直接说“到工人中去”是今天的工联主义者，但工人运动的尾巴这个评价倒是直接说出来了。以现在的真实情况来判断我们革社不认为“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是工联主义的。离火先生也犯了布站的老管理们在“孔明借东风”里所犯的同样的乱扣帽子的错误，当然离火先生扣得没那么狠。但污蔑和歪曲“到工人中去”同志的角度上，离火先生的方法是更要高明一些的。

而这段引文中的第三段的内容也就暴露了离火先生的不足和主观臆断的地方。离火先生认为，富士康和海珠区的斗争就可以表明工人反抗这个制度（根据第二段内容，这里应该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了。事实上这仍然是两场经济斗争，所以并不能用来说明我国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已经非常强烈了，并且这两场特别激烈、少有的经济斗争甚至也不能代表我国的经济斗争的普遍水平，它们只能代表目前工人运动的最高水平，它们也只能代表我国工人运动的自发的（没有革命力量足够干涉的）发展趋势。所以离火先生误判了现在的局势。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工人运动是普遍的经济斗争，我国工人普遍的不具有反抗这个制度的愿望，我们只需要引用一下具体的数据就明白了。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 10343 起，占比 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 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从规模而言，其中有 10984 起都是 1 到 100 人的小规模运动，占比 84.89%；101 人到 1000 人的中等规模的罢工有 1786 起，占比 13.8%；超过一千人的只有 164 起，占比 1.27%。还有 3 起运动没有查到规模。所以，从我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言，小规模运动仍然是主流，超过一百人的中等运动则少见，而超过一千人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更是稀少无比的。但从总的规模来说，八年发生了 12940 起工人运动，相比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工人运动还是很少见的现象。按照大多数规模不超过 100 人而言，就算都按 100 人算，八年内只有 129.4 万人次参与了工人运动，就算乘以 50，也对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现象。工人运动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足的，129.4 万人次只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0.17% 而已，这还是用八年的总数来统计的，就算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多得多，每年参与斗争的劳动者也应该难以超越 1% 很多。如果拿历史上的数据做对比，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在持续的 13 个月里，当时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而这个时期中国只有 200 万工人，当年就有 15% 的工人参与了罢工。1900 年俄国工人数量为 205 万人，1905 年全俄政治大罢工就有 200 万人参与，算是整个俄国工人阶级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国今天的无产阶级占全国劳动者比重的 61.3%-86.6% 之间，取中间数则是五亿多工人，这样一看我们就能知道我国今天的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还差多远了。

难道经济斗争可以用来说明推翻政治制度的愿望吗？离火先生还在前文隐蔽的、不直接点名的批评了正在融工的、参加了经济斗争也做了政治灌输工作的“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是工联主义的呢。如果以离火先生自己在其他地方的标准来看，我想是得不出这个定论的。那只能说明离火在这里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所以根本的误判了形式。我们也还不处于列宁批判《工人事业》报的那个革命阶段，我们今天还差得远呢。

通过我们上面的阐述，说明离火先生这段总结的第四段也是错误的，反应了一定的离火先生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他没能很好的认识到我们现实的条件和俄国当时的条件和具体社会情况的差异，而认为“目前的工人运动中已经存在着对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进行否定的萌芽了”，这相当于对第三段错误的延续所做的判断。并且我国目前的工人运动就已经基本全是工联主义的方向了，没有什么未来必然要转型两种方向中的一条的情况，只有革命分子需要努力克服我国目前工人运动的工联主义方向并且把这个方向扭转过来的情况。最后离火先生说了一段大体正确话，“要将工人运动向着社会运动的方向转变，非得对工人进行阶级政治意识的灌输，非得用党将工人组织起来不可。”但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上，离火先生却在前面提出来一些错误的观点。

除了这两点致命的错误外，其他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相对不重要的错误，我们就不再专门指出。诚然离火先生的文章也不全是错误的观点。离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给我们强调了工联主义的危害，给我们强调了政治灌输、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强调了建党工作的重要性。这些观点用来给我们复习《怎么办》还是很不错的，有助于巩固知识。但离火先生却在运用《怎么办》的内容到我们今天的实际中时又犯了许多许多的错误，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拿俄国革命当年的一些不符合我们今天条件的情况的具体内容来规定我们今天的策略，把“到工人中去”当作今天的《工人事业》报来批判，把他从《怎么办》里学到的批判工联主义的内容拿来批评“到工人中去”的工作，选择性的遗忘了、并且曲解了别人的观点，并抛掉了其他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提醒离火先生，这种做法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诚然，我们相信离火先生对我国革命事业也有诚挚的追求，但请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四.“扎根”的必要性和“扎根”的地位

以上，因为离火先生的提法。“扎根”意义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考虑到布站老管理们当时提出那种“扎根”的不足指出，我们也要尝试进一步阐明了。

今天我国的工人运动还是普遍的工联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没多少实际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它至多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我国工人们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往往打着一些社会主义口号，借用社会主义的皮（有时是毛主席的、有时是实际维护特色的那种）来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赋予的特征。

所以，我国没有革命分子去工厂扎根，做足够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那么工人运动往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工厂周边的专门活动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还是相对次要的，也是不可能普遍的做到的，它需要足够的厂内工作才能起到他的作用，才能有条件发展起来。而革命分子普遍的融工却是我们现在和接下来一个时期有条件做得到的，只要现在和未来有劳动条件的革命分子们（而不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能够普遍的参与融工就行了。

这种融工，是需要有明确目的和足够的、正确的、基本的工作方法的，布站老管理的那种“扎根”和“熟人关系”是很不足的（他们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熟人关系”了还停留在线上，远远还不如“到工人中去”三年的工作成果）。我国的革命分子们应该在工厂和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中发展新的革命分子出来，建立起各个工厂和各个劳动部门中坚强的、秘密的、能扎根的、有继承性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要源源不断的为我们发展新的革命分子，并且能够动员和组织起其他群众。在这个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就可以更好的进行各劳动部门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可以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等等，努力形成受革命组织控制的、很大程度影响的或者群

众自己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也要是足够坚强的、秘密的、能扎根的、有继承性的。这样我们就在一个个工厂建立起坚实的革命核心（革命组织），又能时时刻刻影响和动员起各劳动部门的群众（通过群众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工作需要大量坚强的革命分子们去切实的扎根，通过长期的、细节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做到。自然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定的、专门的在工厂周边活动的职业革命家了，并且我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养得起他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们的工作来更大程度的影响工人们的思想，更广泛的组织起各个劳动部门的工人以形成更大的运动。当然这批分子应该主要是各个时期最进步的革命分子构成，他必须经过足够的革命工作的考验，所以他很大程度上是上一个时期的去工厂扎根并建立起组织们的革命分子们来构成。并且在发展这样坚实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发展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成功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也用现实的工人斗争来争取更大的组织工作成果。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党才有可能实现。党是革命家组织的最高产物，它需要一定的革命家组织的基础，需要更多的革命组织基础，还需要更多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没有这样的足够的现实组织工作，没有今天从扎根开始的工人组织工作，党是不可能的，开始建党也是不可能的。开始建党的过程如果单是从融工这一个方面来看，就不得不依靠“扎根”的路线。

论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

革社（RSF）编辑部

多少人借“路线斗争”的名义严重的破坏了革命组织、革命工作、革命事业。却掩盖了真正的革命路线。在许多我国的左翼组织中也存在许多本不应该存在的、错误的路线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所有路线斗争都不应该出现），这种不应该出现的路线斗争严重的破坏了革命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也破坏了的真正的路线。今天我们打算详细的论述一下这两种不同的路线斗争的问题。

一. 路线斗争的普遍性

路线斗争产生于一切社会运动中。在一切有关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运动中，在各种各样具体的或总的运动中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运动的趋势。关于运动趋势的矛盾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产生路线斗争。这也就是说，路线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也是社会运动中一般矛盾的特殊性（和非社会运动的矛盾相比的）。

矛盾也是运动，有运动就会有运动的趋势，和社会性有关的一切运动，都不得不体现出一定的、具体的社会性主导着的一定的运动趋势，这些运动都是社会的运动。只是在社会领域，在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运动趋势之间的矛盾的最高阶段就会体现为路线斗争，因为不同的运动趋势会导致矛盾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导致一定的矛盾产生不同的结果，而社会性的矛盾导致不同的社会性追求不同的矛盾发展方向和不同的结果。自然和社会一相比，后者的运动趋势的斗争在社会的范畴内能体现为社会的、自觉的、能动的斗争，它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路线斗争；而在自然界内部体现为自然的、自发的、被动的斗争，也就是自然界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演化。因此自然界的矛盾的运动趋势是能被社会比较容易的认识清楚的，而社会运动的矛盾的运动趋势认识起来就更加困难。

任何运动的运动趋势如果是不正确、是有错误的，是不能够正确的反映和正确的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那就会导致这个运动陷入失败，并且还要遭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彻底的反击。在社会领域，则是运动的运动路线能不能正确的反映和正确的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

二. 路线斗争的产生过程

正确的运动路线需要人正确的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且还要正确的反映和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认识，第二阶段主要是社会实践。

在认识和实践上的不足都会导致错误路线的出现，错误路线主导的运动就会导致运动以错误的趋势发展，最终则会产生坏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用正确的路线来取代错误的路线。用具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社会实践的路线来发展运动。那么这个错误和正确的趋势之间的斗争中总会产生矛盾，但并不是一切的矛盾都会产生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因为路线斗争是在不同的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这里的认识和社会实践是不同的，但真理确实一定的。

所以认识上的不足、社会实践上的不足是产生路线的斗争的基础。

并且人的社会性是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革命者，他们团结起来要用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来主导社会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相同的（除了少数可能产生的叛徒外）。那么这个群体的运动路线是需要相同的。但这个群体内部也往往会产生路线斗争，也会产生代表不同认识和不同社会实践方向的路线。所以这里还涉及更复杂的问题。

认识的不足、社会是实践的不足自然会导致运动路线根本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别的错误的方向发展，最严重的就会发展为我们敌人的立场，彻底的为敌人的利益所服务。自然会有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但根据错误的严重程度、根据其犯错误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程度，有犯错的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自觉的犯错误的人、自觉的犯了大错误的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彻底的叛徒和敌人等等不同的区别。对于不同的情况需要用不同的但是适当的处理方法来对待，这里是万万不能简单的等同的处理的。中国的贡派分子往往就是把大部分情况都当作彻底的敌人来对待。

三. 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因为有好几种可能情况的组织和同志，所以我们就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对待之和处理之。这里大致谈比较常见的几种情况和基本对应的处理方法，但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和最具体的情况。

对于不自觉的犯了一些不是严重错误的同志，他们不自觉的拥护和支持了错误的路线，但其恶劣影响还不是很大，这种错误是他们不自觉的产生的，是在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社会实践上部分的产生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是错误的，是和他们的革命立场相矛盾的。对于这种错误，许多同志都遇到过，他们总是通过不停的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加强交流等方式改变了错误，大多是的同志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通过指出错误、加强交流、加强学习、加强社会实践（包括工作）等合适的方式，使他们的错误认识被重新统一正确认识内、使其错误的社会实践（包括工作）被重新统一到正确社会实践方向上。所以我们和这种同志的错误的斗争还不是彻底的路线斗争。这种矛盾、这种斗争还不是那种敌我性质的路线斗争，这些同志本意上是革命的，没有犯严重错误的，所以它还只和这些同志的错误认识、错误社会实践的斗争，是同志内部之间的斗争，是同志之间的不同认识、不同社会实践方法的斗争。而如果遇到其他组织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及缺乏关系的其他的同志产生了这样情况，我们则以加大沟通、指出错误、民主协商、以团结的目的比较和谐的帮助其改变错误。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些同志，也是不自觉地犯了错误的同志，这一点上他们的和前者是一样的。但我们要说的情况就是，不自觉地犯了严重错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同志。那么这一种同志除了要解决他的错误的认识、错误社会实践方法的问题之外，由于他还犯了严重的错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还要根据其具体的情况对其做适当的惩罚。根据人民群众的看法、根据其改正错误的态度和结果等情况，具体的调整处罚力度，如适当减轻和适当加重等。而如果遇到其他组织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及缺乏关系的其他的同志产生了这样情况，我们则应该根据各个时期其他同志们和群众们的普遍意见来正确的处理对待他们的关系和方法，我们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适的对待和处理其错误，也需要通过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的得到改造而走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

以上是不自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下面谈谈自觉的犯错误的一些情况和大致对待方法。

所谓的自觉的犯错误，就是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却依然要继续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他开始开始主动的部分的或彻底的脱离革命立场了。

对于自觉的犯错误的，但是确实犯的小错误的同志，采取适当的处罚（根据群众和同志们的普遍意见以及其错误程度来具体确定），然后加足够强制的、硬性的措施来强迫他改变。当然这只是对一组织内的同志而言的。对于其他组织或关系不深的其他同志，我们则应该要批评其错误，在其错误的地方，我们需要通过公开批评、公开批判等强硬的对抗手段来尽力制

止使其错误影响的扩大，使其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恶劣影响和自己不改变的后果。因为其自觉地在犯错误，所以必须更依靠用斗争来促进改造的方法，在这里斗争的作用加强了。

对于自觉的犯错，并且犯了较大错误的同志，却依然不限制要继续犯的。如果组织能有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极大的限度惩罚他、如任何惩罚都不能补救其过错的、或者其极大的得罪群众的，那就需要开除他，并依据群众的意见处理他。而如果遇到其他组织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及缺乏关系的其他的同志产生了这样情况，我们则应该严厉的批判他们，尽可能的清除其对其他同志和群众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使群众和其他同志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根据群众和其他同志们的在各个时期的普遍意见并联系革命的需求而在各个时期正确的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最坚定的、最彻底的斗争，不然无法在各个时期正确的处理他们的问题。

四. 产生问题的一些途径

路线斗争问题的最初根源在于认识的不足、社会实践的不足。而产生这种不足的具体因素和具体途径也有很多种，比如革命分子的个人素养的不足、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之间的互相信任不足、组织成员和组织之间的交流不足、组织制度的不足等等因素。

因为革命者素养的不足，这种不足可能是整体也可能是部分的、可能是临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这种不足有可能导致其更加弄不清一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或者掌握不了具体的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他们在处理其他的同志犯错误的问题上，在犯了严重错误和犯了一些错误之间有很多细致的区别，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错误需要相对不同的处理错误的方法，往往会更有可能处理得不对，这就会有负面影响，会破坏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这种素养不足有时也会产生许多认识和不足和社会实践的不足，导致其推行错误的运动趋势，乃至推动错误的政治路线。而个人素养不足所导致的部分同志在部分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是可能通过适当的加大组织交流、集中正确意见来一定解决的。所以个别、部分的素养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的优秀和全体的集中来一定解决。

互相信任和交流的问题也影响着革命组织和革命工作的发展。互不信任和交流不足就会导致问题总是会往更严重的倾向发展，他会导致组织之间、同志之间更倾向以更严重的程度来判断其他同志的问题，倾向于以对待更严重问题的方法来对待处理其他同志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使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同样，制度的不足，也会扩大以上这些因素和途径所产生的问题，制度的漏洞会加大其他坏因素和坏途径的问题产生。如果同时正确革命立场的组织之间、同志之间的信任和交流不足、制度的不善就有使同志之间的矛盾发展为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使人民内部矛盾往敌我矛盾发展。本不是应该是敌我矛盾的矛盾发展为了敌我矛盾只根本的伤害革命者、人民群众和革命运动本身的。

所以处理以上途径产生的问题的方法不足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也是产生这类问题的一个途径。因为处理问题的不足，往往导致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严重的反而可能会把小矛盾升级为了大矛盾，甚至升级为了有害革命者、人民群众和革命运动本身的矛盾。这也算人为制造的问题。需要提高处理矛盾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更细致的认识问题、把握问题的关键、更正确的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等等。

所以，在这些会导致问题产生的途径上我们要尽可能的解决。逐步的加大同志们的集体素养，加强同志之间的信任、加强同志之间的交流、改善组织制度、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以上的内容虽然是具体的针对革命组织、革命分子之间来说的。但对于革命分子和群众之间，人民群众内部之间，也是大致相同的道理，我们也需要逐步加强群众的素养、加强我们和群众之间以及群众内部之间的信任和交流，构建正常的关系等等。否则人民群众和革命分子之间、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的团结和统一行动就无从谈起。

五. 正确的路线斗争和错误的路线斗争

根据前文所谈及内容。我们认为一般有这样两种路线斗争，即正确的路线斗争和错误的路线斗争。

正确的路线斗争，是指和必要进行路线斗争的人或事物进行了正确的斗争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这种路线斗争是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发展的。不进行这种斗争就会丢弃真正的团结，它至多只能得到虚假的团结，因为团结在阶级社会是有具体社会行的，我们所要的团结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革命阶级的团结，而不是反动阶级或其他中间阶级为核心的团结等等。不进行足够的这种路线斗争革命运动就无从发展，革命运动就一定会遭到暂时的失败，就会走一段弯路，遭到一定打击等等。这种正确的路线斗争所必然产生的一些分裂等负面影响有时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总的来说，正确的路线斗争的所产生分裂等负面影响总是暂时的、部分的影响，由于它的正确运动趋势和正确方法则一定会产生更长久的、更全面的团结和正面影响。革命力量总是要进行这种正确的路线斗争的，这它不能推辞的任务。

而错误的路线斗争。具体问题会出现在产生这种问题的各种途径上，即产生于个人素养的不足、组织的之间的互相信任不足、互相交流的不足、组织制度的不足、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足等等。这些途径上产生了许多本来不该出现的路线斗争，这种错误的路线斗争产生了本不应该产生的矛盾，或者把同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了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了敌我矛盾；把一时的认识不足、社会实践的不足上升为了长期的、始终的不足或故意的、敌意的不足等程度。这种错误的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里是不应该存在的，它产生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坏革命组织、破坏革命运动。而在我国部分左派组织和革命组织里往往产生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现在也还存在着，并且成为了危害我国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是间接使我们脱离群众。真正的革命分子、革命组织应该大力的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错误的路线斗争往往也危害了真正的革命路线，它和正确的革命路线之间也是一种根本的路线斗争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解决那些产生错误路线斗争的问题和途径，对于那些故意的、持久的、长期的阻碍我们来正确的解决路线斗争和消灭错误的路线的人或事物就是我们的敌人。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第二部分当作刊物第一部分的补充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在这一部分中具体收录最近重要的或关乎我们的路线斗争的文章。

在这一期中我们继续收录了部分关于布站和东风频道目前的路线斗争的文章。这一方面的路线斗争仍然是关于线下组织工作和融工方面的问题的。并且由于我国左翼力量的弱小，这些问题不得不决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弱小的线下组织工作和这种工作在未来很长一段事件内的发展方向。

在线下组织方面的问题上，革社也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实践，形成了我们的路线和观点。并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路线斗争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正在开展的线下组织工作和我国其他更多正在做或正准备做相似工作的同志们。除了之前我们反对布站老管理们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包括融工）问题外，近期“新十月”组织的离火先生近期文章的一些错误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一系列文章代表了一条新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社也有自己的看法、立场、态度和路线。本刊第一部分的《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问题》就算我们的部分正式回应。除此之外，在这一部分上我们将放出与之对应的离火先生的那篇文章、离火先生批评的“到工人中去”同志们文章，和一位其他同志对离火先生的批评文章。值得说明的是，离火先生近期还有其他好几篇文章，问题观点还有一些，但本期刊物只对他的部分重要内容做了回应，还没有完全涵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呼吁“东风”、“到工人中去”、“布站”、“斗争公社”的同志，还有“新十月”和“革命火炬”的其他同志，以及我国更广大的同志们、进步群众们能够团结起来对付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宣传上驳倒这个错误，帮助离火先生改变这些问题。并且我们也希望离火先生能够严肃认识到自己所提出的部分观点、路线的严重错误和自己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并能有较快的、较彻底的改正。

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

作者：到工人中去

我和两名同志一同融工3年，在3个不同的工厂开展过工人工作。这里以第二个工厂（A厂）为例，分享一下融工的经历和感受。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加入融工的队伍，探索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深度结合。

一、融工第一步：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进入工厂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工厂的各方面情况，发现其中的关键矛盾，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我们3名同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利用各种渠道，最终摸清了工厂的基本状况。

1. 工时、工资、待遇等基本情况

A厂是一个电子厂，是某大型集团下属的一个分厂，共有200余人，工友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男女工友的比例约为6:4。A厂包括办公室（约50人）、仓库（约10人）和生产车间（约150人）三大组成部分。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是生产车间的工人。

生产车间为流水线工作模式，共10条产线，每条产线约15人。A厂主要生产大型电子产品（重约10kg-20kg），工人需要站着干活，工作强度比普通电子厂大很多。一般情况下，工人每天上班时间为8:00-20:30，其中12:00-13:00为午饭休息时间，17:00-18:30为晚饭休息时间，平均每天加班按两小时算。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在订单比较多的时候，工人会在周中加班到晚上9点，周日也会加班。产线工人底薪为2400元/月，算上周中和周末加班，每个月的工资约为4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的到手工资约为4000元。加班比较多的时候，工人到手的工资约有4500元-5000元。

A厂算不上大企业，但由于它是某大型集团的子公司，该厂基本上还是遵守劳动法律的。加班工资按照合法的标准支付，也会为工人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但是，工厂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没有以法律规定的实际工资（约4500元/月）作为基数，而是以工人底薪（2400元/月）作为基数，实际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工人眼中，相比于工业区遍地的小黑厂（随意克扣加班工资，不缴纳社保及公积金）而言，该厂已经是良心企业了。

之前几年，工厂的福利很不错，夏天会有水果及消暑的绿豆汤供应，逢年过节也会发放许多礼品，比如在中秋，A厂一般会给每个工人发放价值100元-200元的礼品券。由于待遇基本

合法，收入不算低（在A厂所在的工业区而言），福利还不错，所以A厂的员工流动率较低，工人工龄普遍在2年以上，个别老员工的工龄甚至达到10年。

2. 阶级结构

在阶级结构方面，生产车间呈现出车间主任-领班-班组长-全能工/多能工-普工的等级结构。日常工作中，领班及以上的管理人员基本站在工人对立面，代表统治阶级压迫工人，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逼迫工人完成产量。一线员工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工厂中处于被剥削的状况，被迫在资本意志的驱使下赶产量，完成生产任务。而班组长和全能工/多能工则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作为最底层的管理者，对上需要把工厂的任务落实下去，将产量提升上来；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和工人朝夕相处的劳动者，对下不能以非常恶劣的态度对待普工（这个工厂工人流动性很小，大家经常生活在一个圈子里，班组长态度太差了不好混下去；对于流动性比较大的厂子，班组长长的态度往往比较恶劣）。因此，班组长一方面会向上层转达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产量过高，难以完成。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向普工诉苦：这些任务是上面下达的，我已经向领导争取了，但没有作用，我也没办法，只能尽力去完成了。

总体上来说，班组长的工资比普工高不了多少，A厂班组长和普工在大多数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班组长在本条产线的普工中威望较高，如果能争取和团结他们，是可能在工人斗争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

3. 矛盾分析

分析工厂中的矛盾点，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工人的实际感受出发，而不是从左翼同志的主观认识出发。在这方面，我们3名同志走了一些弯路。

刚来没多久的時候，有个同志就凭着自己的感觉，认为A厂加班时间过长，且工作强度太大，工人必须站着工作，十分劳累，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矛盾点。但是，随着跟工友的交流增加，该同志慢慢发现，很多工友已经适应了這個强度，他们并不觉得很辛苦，多数工友反倒希望加班时间能更多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该同志这才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认识到判断矛盾应该从工友的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出发，不能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愿望代替。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后，我们最终找到了工友普遍关心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社保和公积金补缴问题。A厂按照底薪而不是实际工资为基数为工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导致每个月给工人少缴数百元。虽然工人无法支取社保，但可以很容易地提取公积金，将公积金转换为实际收入。具体来说，按照基数的5%作为公积金缴纳比例，工厂每月少为工人缴纳的公积金约为120元，4年下来便有5000多元。如果这笔公积金能补缴，工人能增加实际的收入。

其次是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最近一年来，A厂的订单减少，效益变差，是因为母公司想要将该厂关停结业，而在其它地区开设新厂。劳动法律规定，在工厂向外地搬迁的条件下，跟工人解除劳动合同，资方需要支付（工龄+1）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对于一个工龄4年，月工资4000元的工友而言，能获得20000元左右的补偿。多数资本家不愿意支付这笔补偿，普遍采用卑鄙手段规避法律。A厂的母公司也没有公开宣布搬迁，而是通过缩减A厂订单的方式，使工人减少加班，收入降低，逼迫员工自行离职（在劳动法律上，自行离职的工友无法获得经济补偿），以这种方式不支付经济补偿。随着效益下滑，工人的待遇和福利被削减很多。在工资方面，工人的加班时间被缩减，周末开始实行双休，甚至周中也逐步实行5天八小时工作制度，工人的工资大幅减少。在没有加班的情况下，普工到手工资不到2000元，根本不足以维持生存。在待遇方面，随着效益变差，工厂的福利也大幅缩水，夏天的水果供应被取消，中秋节礼品从100多元的礼品券变为一块小月饼。这种情形下，不少工人已经不愿意在A厂呆下去，但如果工人自行申请离职，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经济补偿，很多工友选择继续坚持。搬迁补偿涉及到几乎全部工友（包括班组长们）的切身利益，且金额大多为几万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是多数工友普遍关心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判断，在A厂会围绕着补缴社保/公积金以及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着手开展交朋友和筹备斗争的工作。

二、融工第二步：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交朋友的目的是形成一个能将工友广泛地团结起来的圈子，建立工人的初级组织，为进一步开展斗争和思想灌输工作进行铺垫。需要说明的是：先调研，再交朋友，其实是我们在逻辑顺序上做的一个粗糙的阶段划分。在现实中，进入工厂之后，交朋友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调研结果、对工厂矛盾做出的判断都离不开深入的交朋友工作。所以，交朋友和工厂调研这两项工作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在调研工作结束的时候，交朋友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调研分析的结果为下一步交朋友的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帮助我们将交朋友的工作进一步深化，更好地进行工友的组织（圈子）建设。

交朋友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比如在上班的时候给工友递个烟、扯几句或给个口香糖给对方，拉近彼此的关系。第一步走通了后，就可以通过下班后聚餐/周末出游等方式增进联系，建立更深的信任。

交朋友的过程中，不应排斥班组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产线上有威望，身边的普工愿意听他们的，换句话说，他们能聚集起一批工友。通过跟班组长交朋友，我们能更快地同相应产线的普工熟悉起来。除了产线上的工友外，也应该尽量结交非产线的员工，比如说，我们交了几个办公室的文员，其中一个是工厂的生产计划员，她能掌握工厂的订单情况，包括厂里怎么安排生产、什么时候交货这些重要信息；还结交了2个仓库的仓管，他们掌握工厂的存货量、原材料数量等信息，这些信息对后期罢工过程中工人掌握工厂的全面情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经过两个月的交朋友工作，我们基本上认识了车间的所有工友，并建立了以我们自己人为核心、以班组长和产线重要人员为骨干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中，产线工人有四五十人，仓库人员和办公室人员各有三四人。这个朋友圈，事实上是一个不定型的、初级的合法（合乎群众习惯之法）群众组织。我们认为，交朋友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要看朋友圈的规模，也要看朋友圈中成员的代表性。我们的这个圈子，在车间的每条产线、办公室和仓库都有朋友，可以代表工厂的所有重要部门，基本能掌握工厂的全方面信息。

我们利用这个朋友圈不断地交换信息，交流法律知识，分析工厂的动向，为搬迁补偿的斗争做准备。

三、融工第三步：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在进厂4个月后，厂方为逼迫工友自离，试探性地发起了进攻行动：停止3条产线的加班。于是，一场长达4个月的斗争行动拉开了序幕。

1. 牛刀小试：资方减少加班，我方积极怠工，争取加班

在被停止加班的3条产线中，有一条产线上有我们的同志，另外2条产线上有朋友圈的骨干。我们判断，停止3条产线加班是厂方的一种试探性进攻行为。如果这一政策畅通无阻地实施，资本家必然会扩大停止加班的范围，从而逼迫更多的工友离职。于是，我们组织这3条产线的工友，以及暂时还在正常加班的十几名工友聚集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在共同商讨对策的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团结性的力量慢慢就产生了。对于那些被停止加班的工友来说，他们在遭到厂方打压的时候，感受到了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在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而对于那些暂时还没停止加班的工友而言，他们也能慢慢感受到，大家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今天是其它人被停止加班，后面就会轮到自已。因此，工友此时就从浅层次团结（口头上的团结），向着深层次团结（面临重大利益时一致行动）迈进了重要一步。不仅如此，在召集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左翼的同志也逐步在工友中获得了真正的威信。在之前的阶段，即使交朋友工作做得很好，工友最多以为我们是活泼开朗的人，而不会认为我们很有主见和办法。但在讨论会中，我们向工友分析工厂局势，并判断资本家下一步的可能行动，提出正确的应对策略，并组织工友分工行动。通过这些，工友能切实感受到，我们这些人是有思路和办法的，提出的方法也是正确的，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工友们就越来越愿意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根据讨论会定下的策略，我们共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1) 消极怠工。按照劳动法律，工厂不给工友加班并不违法，因此去劳动局和政府部门投诉注定没有结果。另一方面，资本家虽然让一部分人停止加班，但厂里还是有一些订单需要完成的，工友可以通过怠工的方式，降低产量，给资本家施压。经过分工动员后，产线的多数

工友开始消极怠工，将流水线的速度调至最低，每天的产量仅能达到正常产量的10%，以此逼迫厂方前来谈判；

2) 派出代表前往办公楼，向厂方提出恢复加班的诉求；

3) 向工会主席施压。该厂的工会是一个壳子工会，除了过节发些福利之外，工会并未发挥其它任何作用。但在法律上，公司的重大行动，比如规章制度的调整、开除工人等行为，需要工会盖章。通过一堆工友聚集向工会主席讨要说法的方式，我们在向工会施压，以达到厂方开除工友时，工会不敢轻易盖章的目的。

怠工持续了两天后，老板便把工人召集在一起，询问大家为何停工。工人代表们提出恢复加班的诉求。两天之后，工厂答应恢复加班，怠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当天晚上，工友们一同聚餐庆祝，在后半段，我们提醒大家，这次胜利了，但集团总公司关闭A厂的决心不会改变，胜利只是暂时的，很可能一两个月后，工厂继续不给工人加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两个月之后，资本家又停止了另外两条产线的加班，我们将工友组织起来，继续采取相同的怠工策略，同样在1天后，公司同意恢复加班，斗争再次获得了胜利。

劳资博弈是一个双方出招和拆招的过程，资本家的两次行动只不过是试探性行为，如果能不受阻碍地推行下去，结果必然是工人收入减少，很多工友被迫离职。我们通过怠工斗争获取了胜利，使资本家的这一小伎俩无法得逞。不过，怠工斗争能成功的前提，是厂方还有一些订单要做，工人怠工会影响厂方的生产和出货，从而对资本家造成压力。但是，一旦订单进一步大幅减少，怠工将不会对资方造成实质的影响。果然，在1个月后，我们从办公室的生产计划员那里得知，过不了多久，总公司分配给A厂的订单将会急剧减少。新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2. 反复拉锯：资方全厂放假，我方组织打临时工，密切守卫工厂

很快，资方便宣布：由于没有订单，全厂工人放假1个月。资本家的这种手段，是通过放假进一步逼迫工人自离。

经过和工人骨干们的仔细讨论，我们采取了以下应对策略：

1) 争取放假期间的工资。劳动法律规定，工厂在放假期间，应按照不低于底薪的水平支付工人工资。但是，厂方本着能忽悠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在放假通知中并未说明工资怎么发放。经过工人骨干的动员，工友们一起冲到办公楼，就放假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讨要说法。在冲突中，警察和劳动局都来到了现场。由于关于这一点的法律规定十分清晰，警察和劳动局人员也无法在明面上站在厂方一边。于是，资本家很快妥协，同意按底薪支付放假期间的工资。

2) 组织工人打临时工。对于工友来说，2400元/月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维持生计的，但在放假的情况下，工人还没有和A厂解除劳动关系，便无法到其它厂入职；如果工人为了新的工

作选择了主动离职，又会损失一大笔经济补偿，这就正中资本家的下怀。为解决这一矛盾，大家商议后想到一个办法，那便是通过各种渠道，组织工人在放假期间打临时工。在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还是能找到不少日结、周结和月结的临时工工作，可以有效地弥补工人放假期间的收入损失，支撑工人更有信心、更持久的坚持斗争下去，争取经济补偿。

3) 组织工人护厂。根据一部分工友的经验，资本家很可能在放假期间转移机器设备等公司资产，使得工人斗争缺少必要的筹码。为了防止资本家转移机器和存货，我们组织工友白天和夜里都在厂门口轮班值守，监视工厂，防止大货车进出。果然，在放假第二天，有一队正在打临时工的工友发现资本家正在拆机器，搬设备（这一队工友的临时工工厂刚好正对着A厂大门，他们透过窗户便能清楚地看见A厂的动态），他们在群里紧急通知大家，多数工友很快到工厂里聚集，阻止资本家转移资产。工人质问老板是否要搬迁，如果要搬迁，就必须立刻支付经济补偿，资本家拒不承认搬迁。在警察和劳动局的介入下，老板被迫将设备重新转移回厂内。

4) 组织工友就社保和公积金问题进行投诉。A厂的社保和公积金都是按底薪缴纳，严重违法法律。考虑到公积金补缴能为工友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以及在当前的博弈中，工友们总体上处于防守的态势，因此，需要通过投诉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对资本家形成一定的攻势。我们将工友组织起来，集中去社保局和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A厂违法，要求资方补缴。在两天的时间里，前去投诉的工友多达130多人，有力地鼓舞了工友的士气，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

依托上述策略，我们成功地将停工放假期间的工友继续组织起来，通过打临时工的方式，使工人通过拿两份工资（A厂放假期间的底薪+临时工工资）的方式保证实际收入不减少，且经过护厂斗争和社保公积金投诉，有效打击了资本家，使得厂方以放假逼迫工人自离的企图落空。

资本家在看到放假这一招对组织起来的工友无效后，很快便采取了新的策略，使得劳资双方的冲突达到高潮。

3. 斗争高潮：资方放出大招，我方集会抗议，争得经济补偿

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资本家本想通过放假的方式，逼迫工人自离，但在我们的组织下，放假一个月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的经济压力，一部分工人的收入甚至有所增加。于是，资方调整策略，使出了第三招：假期结束后，A厂宣布所有工人复工，但A厂没有订单，工人上班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绝不允许离开工厂。

资本家的这一招是极其恶毒的。搬迁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但绝不承认搬迁。明明没有订单，却不辞退工人，从而避免支付经济补偿；不给工人放假，使得工人不能离厂打临时工，呆在厂里又挣不到钱，只不过是拿着低工资在这里空耗。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工龄比较短的工友选择了离职，对他们来说，本来能拿到的工龄补偿也仅有几千元，没必要为此一直在这里长时间耗着。而其它工龄较长的工友，涉及到的经济补偿金较多，他们选择继续坚持。

针对资本家的这一招，我们和工友讨论后，决定采取如下应对手段：

- 1) 做工友的思想工作。核心骨干分工向参与斗争的工友分析形势：虽然我们每天在厂里耗着坚持斗争，拿到的工资很少，压力很大，但老板也一直在这里耗着，每天的房租、水电气等费用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僵持对资本家也是一件无法支撑的事情。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哪一方先放弃，哪一方就会走向失败。以此帮助工友提振士气，坚定信心。
- 2) 明确斗争诉求，防止工友被分化。我们通过结交的核心骨干，提醒工友不要接受资本家的欺骗，单独同资本家妥协。这一时期，资本家极有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比如忽悠某几个工友，说工厂也没钱，没法支付全部的经济补偿，只能按 50%甚至 30%的水平支付；忽悠工友独自撤销对社保和公积金的投诉，相应地直接补一笔小钱给这些工人。骨干分子向工友反复宣传，坚决不能和老板单独签订协议，要统一行动，不然就中了资本家的圈套，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都是不小的损失。我们和工友商定之后，明确了统一的诉求：社保可以适当让步（因为补缴的社保不能转换为工人的直接收入），公积金必须全部补齐，经济补偿必须按实际工资水平支付。
- 3) 组织工友在下班之后打零工。工友下午 6 点下班，还是能找到一些晚班（如晚上 7：00-10：00）的零工，可以多挣一点钱，以减轻坚持斗争带来的经济压力。
- 4) 阻拦资本家出货。仓库还有最后一批货要送出去，工人们组织起来围着仓库门口，不让资方运货。老板打电话报警，试图给工友们扣一个“阻碍生产，寻衅滋事”的罪名，警察来了之后，一开始态度很凶，要我们散开，不能阻挠出货，否则就是违法。工人选出的代表和警察据理力争，表明这是一场经济纠纷，资本家欠我们经济补偿金、社保和公积金，在厂方停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这批货作为抵押，以防止资本家后期不认证。警察听了之后，也认为是厂内纠纷，于是随便交代了几句，要求我们不闹事，他也就懒得管了。警察走后，劳动局的人也过来进行处理，在劳动局的组织下，工人和资本家进行了第一次谈判。我们明确提出了 4 项诉求：① 按法律标准支付搬迁的经济补偿；② 补缴社保和公积金；③ 支付仓库人员的高温补贴。（仓库虽然有空调，但仓管经常要去室外搬东西，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也应获得高温补贴）；④ 工人斗争期间的工资正常结算。资本家对于后三项诉求都满口答应，因为这些诉求涉及的钱不多，对他影响不大，但对于第 1 项诉求，资本家矢口否认工厂要进行搬迁，以此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在核心诉求上没有达成统一，第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 5) 集会抗议。工友们在上班期间已无生产任务，我们便通过核心骨干串联，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厂区内进行集会抗议，大家一起高喊口号：“XXX 厂拖欠公积金，违法违纪，严加惩处”、“黑心老板恶意搬厂，不给赔偿”。老板听到了这种口号，马上报警，警察和劳动局的人又来了。警察把工友的喇叭和音箱都收了，恐吓我们再这么搞就要抓人拘留。劳动局的人则出来和稀泥，站在资本家一边，忽悠说厂方没有承认搬迁，因此没办法认定搬迁，按照法律规定也就没有补偿金，凡事都要按法律来。资本家这时候也极其无耻地装可怜：“工厂没有任何要搬迁的意思，但现在经济困难，的确没有订单，我们正常努力协调，希望广大工友能够理解工厂的难处，和工厂同舟共济！”自然，没有人相信老板的鬼话，警察走了之后，我们继续集会、抗议，很多工友还自发地进行演讲，把工厂历年来发生的不公平事件都讲了出来，通过这种“开诉苦会”的方式，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在集会斗争第 5 天的，A 厂资本家第一次真正让步，同意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补缴社保和公积金。甲方的条件与我们的最初诉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工友们商定后，一

致认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斗争，工厂最终答应了工友的诉求，按照实际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斗争大获全胜。

这次斗争前后持续了4个多月的时间，共有60多名工友坚持到了最后胜利，他们的平均工龄为4年，争得的经济补偿总额在100万左右。

四、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

这次斗争对工友的教育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它深化了工友的阶级意识。在此之前，不少工友虽然能在总体上认识到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但是，在面对身边的资本家时，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表象所迷惑。比如A厂的很多工友同情老板，因为该厂的老板在之前的工作中表现地勤勤恳恳，工人8:00上班，老板7:40就到了工厂，也和工友一起忙活一天；他在工友面前总是呈现出一副平易近人的和善面孔，下班路上碰到了工人，还会亲切地向员工打招呼。因此，不少工友认为老板人很不错的。当我们尝试着宣传劳资对立的时候，许多工友将信将疑，觉得老板似乎也挺不容易的。但这次斗争中，老板虚伪的面具被撕得粉碎。为了节省成本，资本家采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迫工人自离，让工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深刻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工人的阶级意识大大增强了。

其次，这次斗争让工友学会了团结。在交友阶段，每次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团结，工友也会讲团结，但这种团结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抽象团结。真正的团结，不仅要有团结的意识，还要有团结的行动和团结的能力。这次斗争中，我们通过核心骨干将工友们组织起来，使大家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在行动中分工协调，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一次次地化解了资本家的进攻。于是，团结的意识转化为团结的行动和能力，最终争取到了集体利益。斗争结束后，一位工友向我们讲述他之前经历的一场失败的罢工经历，参与那次斗争的工友就只有意识层面的团结，在守夜班护厂这些现实行动问题面前，大家开始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脱，缺乏奉献精神，最终导致罢工失败。而在A厂，我们通过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合理的分工，安排工人轮流守夜护厂，最终顶住了各种压力，实现了绝大多数工友的一致行动，始终保持了多数人的团结。

最后，斗争锻炼了一大批骨干，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灌输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斗争前的交朋友阶段，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经济和政治揭露。比如，通过工厂中扣工资、少缴社保和公积金、罚款等各种剥削和压迫事件，揭露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和劳资对立；通过工厂外的警察乱执法、罚款、上访、农村征地问题、基层选举腐败、医疗腐败、教育的阶级差距等问题，揭露政治的黑暗和劳动者的艰难处境。

在斗争过程中，我们组织核心骨干一起学习劳动相关法律的细节，将法律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之一，为斗争提供更多有利的依据；同时，我们集体学习一些工人斗争案例和经验，特别是组织工人的技巧以及和资本家斗争的技巧，从而应用于正在进行的斗争。

斗争结束后，我们将沉淀下来的五六个核心工友继续组织起来，一起学习工运史，并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通过学习、聊天等多种渠道，推动这些工友认识到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获得一次斗争的胜利，而是要从事一项长期的事业。这项事业是把工人阶级的兄弟姐妹尽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为实现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并肩战斗后，这几名核心工友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愿意作与我们一道前往下一个工厂继续开展工作。我们将在后续的工作中，和他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一同为了革命事业坚持奋斗！

五、说说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

首先，并不是一定要经过经济斗争才能进行政治灌输。该厂中我们曾遇到一个工友，很喜欢谈论政治问题，有朴素的民主思想，且很有正义感。对该工友，我们没有经历经济斗争就直接有计划地进行灌输，效果也不错。该工友很快就认识到了国家的阶级性质，明白了资本家和对立，并明确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多交朋友，多团结人。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也成了主力之一。

其次，经济斗争往往能成为政治灌输的起点。上述类型的工友，在当前的比例并不多，我们会偶尔遇到几个。我们遇到的多数工友，一般都是相对保守，或者说是相对中性的。这些工友不反对团结，但是又强调看不到团结的可能性。这些工友愿意斗争，但是前提是有人能够组织起斗争。一次成功的斗争，往往能让这些工友有巨大的改变，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而且，胜利的斗争培养了我们之间战友般的感情，他们更愿意听我们讲东西。借斗争切入，可以具体地分析斗争中资本家的行为、官方的行为等等，鲜活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更容易理解国家的本质，资本家和对立等等。

再次，当前条件下，绝对不要在经济斗争的时候提政治口号。当前条件下，如果在经济斗争的时候提出政治口号，试图证明自己也在搞政治灌输，这是极端愚蠢的，只会给当局以口实，本来能胜利的斗争，都会失败，而且会被严厉镇压，完全丧失了壮大自身培养同志的后续可能性。

第四，我们的灌输是多种多样的，是随时随地的。多种多样指的是形式，主要有日常灌输和系统学习两种。日常灌输包括常规的吐槽产线、聊家常中引导等等。比如，有一个工友在谈恋爱，彩礼很高，经常抱怨。我们就以此切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然后逐步引导到我们想讲的话题。系统学习分成两种，斗争之前一般的学习内容以劳动法为主，斗争之后的学习内容以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相关内容为主（政治灌输）。不论是哪种系统学习，一般都会有纪律要求，都要求一定程度的保密，而且后一种学习的保密要求会更高。随时随地指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引导。

第五，灌输一定要和工友的切身利益或实际经验结合，不能想当然的强灌。有人一进厂，和工友也不算熟悉，也不了解人家的打工经历或者家庭情况，一厢情愿地就按自己的想法去讲，结果工友根本不理他。之前我们有个同志就是这样，结果工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教授”。他最初还挺得意，以为是在表扬他，后来才知道是在讽刺他。

最后，一定要关心工友的生活。工友不是革命的工具，而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当然要极具目的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当然要把每一个有希望的工友培养成同志，因为这样才是真正地对工友负责，才是对工友最大的“善”。但是，这样的培养绝对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真心实意地关心工友的生活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只有真心实意关心工友生活的人，才能获得工友的信任。我们会帮助工友搬家，工友生病了我们会去看望，工友遇到经济困难我们会力所能及地帮忙捐款，工友被欺负了我们会帮忙出主意，等等。当你真心实意地关心工友的时候，工友也更愿意听你讲东西，也更愿意相信你，在斗争中也更愿意站出来一起战斗。

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

作者：离火

之前“新火”的文章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从两个方面谈一下对其写的文章的理解，一个是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一个是关于建党的问题。

工人运动的策略：必须从第一次深入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就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

到工人中去频道在《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中提出“左翼融工的目标和方法：不要一上来就着急搞灌输，先从交朋友开始”。在文中，作者提到：

和工友交朋友聊天，是一门技巧。我们最初的时候很稚嫩，总想着一上来就给工友灌输马列主义的意识，碰了一鼻子灰。要么人家听得云里雾里，要么人家对我们爱答不理。有一次，我秉着要随时随地做政治结论和鼓动的原则，给工人讲着讲着就说到了要革命，结果把工友给吓到了，之后再也不和我玩了。这是工友不觉悟吗？不是，这是我们工作太粗糙。我们对灌输理解得太机械。

.....

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和工友交朋友首先要讲感情，你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和他成为朋友，了解他的经历、困难、苦楚等等，当他和你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之后，很多东西就更容易听进去。

后续的文章《【网友来稿】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中他提到了即便改变了策略以后的效果也并不好：

两个月下来我们认识了三四十个工友，和我们无话不谈的有十个左右。我们关心大家的生活，在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力所能及地帮助工友，比如帮着搬家，等等。但是这些工友里面，明显有斗争精神，明显对权益感兴趣的很少。

上述做工人工作的同志最开始在不了解个别工人思想状况的前提下，教条主义地提出革命，让工人对此比较抗拒，他总结为“对灌输理解得太机械”，但最终提出的结论竟然是“左翼融工不要一上来就着急搞灌输，先从交朋友开始”。于是融工就先从交流感情的拉家常开始了。而正像该频道之后的文章里说到的，这种从先交普通朋友开始的的效果不佳。

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人工作，不能教条的做，而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以后付诸实践，在了解工人整体情况和分类、工人工作和生活的的主要矛盾，工人的意识状况之后科学地选取话题和方式进行灌输。这个并不意味着要一个一个地去跟工人交朋友，去解决生活琐事，

而应该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某地区工人阶级整体情况，分类，他们的意识状况，结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针对性的提出政治灌输的策略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者做工人工作时的任务，不是拉家常，不是解决各种生活琐事，而是使得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向着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发展以及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弄不清自己做工人工作的任务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不了解我们的任务和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务是两码事的时候，工作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

那么具体的工人工作该如何做呢？“新火”文中提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巴布什金的回忆》，另一本是《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里面的工人小组的基本的、长期的任务只有两条，一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散发关于政治鼓动和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和传单（在必要时这些传单可以转为服务罢工，成为罢工的信号）。

当下，对于渴望实践但是却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做的知识分子们，有这样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

我想要提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刚开始时的政治灌输和理论学习一定要符合所接触的工人的情况，要与他们本身的被压迫的地位，现实的各种矛盾相联系，少列些晦涩的数据，多讲些通俗的比喻；少说些死板的教条，多讲些生动的理论；少说些之乎者也，多讲些是啥为啥怎么办。而实现以上这三条要依赖于对工人们的一切生产生活、政治观点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

在整个工人运动中，于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四个角色而言，知识分子相较于工人更能充当理论家、宣传员的角色。而工人自身是容易成为工人运动的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但是却较难成为理论家和宣传员。这是因为多数工人一是长期缺乏写作、逻辑的学习和实际应用（动笔的宣传员），二是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用作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中，可用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种政治观点等内容的时间太少了（理论家）。这点也需要在做工人工作的过程中予以重视。

那么是否应该从经济斗争开始，和工人先交朋友，不谈政治灌输或者少谈政治灌输，等到筛选完人以后再着手谈政治灌输呢？我们需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进行灌输和启发，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经济斗争固定成一个阶段，固定成政治灌输的前置流程，并不意味着没有经历过经济斗争的工人就不能进行政治灌输。

只要工人对于我们的观点都是比较接受，愿意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就可以立即进行政治灌输了。从我的实践来看，我们完全能够从第一次深入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就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抱着真诚的态度，拒绝教条枯燥的话语，去与工人们交谈，这时候工人们是乐于去聊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去与你分享对于自己的生产生活的吐槽、对一切社会热点中不公平现象的批判、对于国家和党的观点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政治立场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的机会之一。

要优先对工人进行政治揭露、政治灌输，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学习、教育、鼓动、斗争，使得工人阶级了解自身这个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系，以此让工人阶级真正认识到自身是一个阶级，觉醒自己的阶级意识。

“其实哪一个打工的不是受剥削的，哪一个打工的不被压迫，谁都想反抗，但是没有人带头都不敢”

“政府上面的意思还是好的，就是下面执行歪了”

“虽然有很多坏政府，但还是好政府的，它们真的会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劳动法真的有用吗？”

“要是真的像你说的按五天八小时上班，家里（生活、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的钱从哪里来？”

“劳动法不顶用，（工资）根本要不回来”

“打工挣个几年钱以后就去老家开个店，自己当老板，不打工了”

这就是工人们目前的一些政治观点和处境：工人们身处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背负着各种各样的负债；想要自发的反抗，但希冀有人带头；普遍对政府抱有一丝好感，认为“上面都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出问题了”；多数人对于劳动法并不信任，只作为最后无可奈何的手段；对于未来的出路，受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多，很多人对未来比较理想的出路都是赚钱开店当老板。这些略显矛盾又在情理之中的想法正是当下工人阶级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中，工人们期冀着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对专制制度的反抗，如果我们能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政治揭露和合适的理论学习，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工人们能够迅速向着革命家的方向成长，工人运动也能朝着阶级斗争的方向发展。

而顺从于自发性、惧怕统治阶级镇压的经济主义者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力图缩小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的规模，甚至完全不敢做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这是在拖慢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的步调。

“白纸运动”等疫情中的群众运动难道不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的反思一下嘛——当自由派的思想影响了这些群众运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这场一般民主运动中又有多少影响呢？这些影响足够取得这场运动的领导权吗？并不够。

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当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时，其它社会阶层才会开始向无产阶级靠拢，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被取得，根据 1905 年的经验，只有这个时候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才可能结合起来，推翻专制制度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下对于政治灌输的轻视，阻碍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进步和扩大。我们有必要从第一次深入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就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

为什么要建党：现有的“融工”是远远不够满足工人运动继续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观点，可是如何结合呢？绝不是说进厂当工人就可以了。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的结合应该是让工人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并依照于这样的纲领和策略将工人组织起来。

目前中国的工人运动迫切的需要着一个能够领导全国工人运动、领导全国一般性民主运动、反抗当前中国帝国主义政府的革命家组织，即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郑州富士康，马克思主义者没能获得这一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其仅仅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不少郑州富士康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在这之后被一一清算；在由小市民阶级为主导的反封控的民主运动中，是自由派影响了这场运动，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只是旁观者而已。

过往的运动已经证明了，没有这样的一个革命家组织是无法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是无法领导全国一般民主运动（其他各社会阶层发起的社会性运动）的，也就无法实现对于当前中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反抗。

我认为，工人运动的策略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当下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拥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才能在各个政治环境下，最灵活地调动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是的，先进行党的组织，因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先组织它，然后才能准备有力量的工会。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工人工作，恰恰相反，党的成熟要依赖于其群众基础的发展，工人工作要同党的发展同步进行。

但建党的条件是不是不太成熟呢？要承认，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党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拥有的条件太过匮乏，匮乏到哪怕是要组建一个如婴儿般新生、初具模样的政党也远远不够。

可党是一个结果，建党却是一个过程。

最初各个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各自发展，大家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对工人工作的认识，也遇到了自身工作的瓶颈，例如本身工作（比如工人工作）发展缓慢、工作面狭小，小组成员变动大、新鲜血液拥入较少，组织建设混乱、纪律松散，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缺少于政治警察做斗争的经验，落后于群众运动（即便发生了什么斗争也完全不知道）。党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出来，可是仍然是不够，过去经济主义的教训告诉我们，手工业状态下的地方小组会不自觉的为自己的狭隘性做辩护，并将这种狭隘性上升到一种理论的层次，这种理论对整个运动有着错误的引导。

建党的过程正是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性而进行的努力。

建党需要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上进行理论斗争，达成一致性，这个过程中大家应该对于目前的重要任务、具体行动的策略、组织形式等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政治上需要形成共同的纲领，这种纲领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联系的，这要求革命家们必须对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有所了解，纲领最初是从地方小组提出来的，在各个地方小组的持续讨论和酝酿中，最终为绝大多数的地方小组所承认的纲领才能诞生。

在组织上要在全国甚至所有愿意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者的范围内具备实际联系的、共同的机构和共同的事务。譬如在列宁的全俄政治报计划中，《火星报》的地方代办员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机构，它将全国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全面政治揭露的工作，当某个地方群众运动高涨的时候，能够立即参与到其中进行鼓动工作。

建党要做的这些任务无一不是对具体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作出回应，并且要力图将整个工人运动推向阶级斗争的方向。

它要将离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和各个地方萌芽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给组织起来，用更强大的革命力量去进行群众工作；它要将现有的工人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从“到工人中去

“转变到“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既要从社会各个阶层中汲取政治知识灌输给工人阶级，培养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增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又要使得一切反政府的阶层尽力去帮助这样一个在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上生长出的政治力量；它要能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利用每一件引起大家关注的事情来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斗争意义，将工人运动推向社会主义的一方，而不是工联主义的一方。

“融工”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进厂做工能够培养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进厂做工是一种更贴近工人阶级、更加深入实践的方式。但是仅有进厂是不够的。已有的融工经验表明，如果仅仅停留在交朋友，做服务，做合法的工人工作，进厂的同志的有限精力下在这些工作中白白消耗，没有成果，往往是最早坚持不住并退出相关的革命事业的。

我认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这样的工作中来的：一方面广泛的交流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们广泛的认识材料，在各个地方经验、材料、人员等内容的交流下，他们得以获取更多的认识，使得他们所在的组织规模更大、地方工作的丰富度更多和涉及面更广，一个地方的成功会激励其它地方的工作的进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他们所在地方的群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飞跃式的进步，其本身的能力也会得到十足的成长；另一方面领导群众面对统治阶级能够锻炼马克思主义者本人和他所在的团体，他们了解各个地方的群众运动情况，在共同工作的训练下，他们能够在各种群众运动中灵活的调动一切力量（“传单”、人员等），与他们的敌人的实力相适应。他们得以比之前更深入获取群众运动与统治阶级的知识，使得他们在不管是一般的还是突然的运动中都能灵活的发动群众与专制制度做斗争。

现有的“融工”忽视政治灌输的重要性，轻视政治因素，缩小政治灌输的范围和深度，使得奉行“融工”的人无数次的错过了提升当下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机会；忽视党的作用，推迟建党的过程，使得革命工作容易陷在手工业方式的局限性中，不仅不能当满足工人运动的需求，甚至因为忽略自觉因素而在某种程度上当了工人运动的尾巴。

工人阶级已经被推向这样一个境地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已经使得工人阶级经济上普遍停留在维系基本生活和后代养育的边缘，在政治上几乎丧失自身话语权，工人们在这种压迫中不断产生要改变现有状况的想法。

工人运动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富士康和海珠区的斗争表明，工人反抗这个制度的愿望已经非常强烈了，但是工人的大规模斗争在统治阶级的镇压之下不得不从反对一个资本家的斗争发展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然而工人的分散状态，经验得不到保留的现状，没有与资产阶级暴力机器作斗争的经验和自觉性都表明了自发的工人运动需要更向前迈一步。

目前的工人运动中已经存在着对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进行否定的萌芽了——这种萌芽来源于工人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面临阶级镇压的经历对于自发运动的局限性的否定，要求且必

然要将当前的工人运动转向工联主义亦或社会主义的方向。要将工人运动向着社会运动的方向转变，非得对工人进行阶级政治意识的灌输，非得用党将工人组织起来不可。

融工中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问题-兼对离火《去进行政治灌输吧》一文的批判

作者：革社线下组织工作者

“到工人中去”此前发表的《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一文中，“不要一上来就着急搞灌输，先从交朋友开始”，引来一些左翼频道的部分的同志批评，他们认为“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目前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甚至暗示其现在就是“工联主义”的。然而就这样简单的判定和草率的行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1. 对待到工人中去观点的态度

“和工友交朋友聊天，是一门技巧。我们最初的时候很稚嫩，总想着一上来就给工友灌输马列主义的意识，碰了一鼻子灰。要么人家听得云里雾里，要么人家对我们爱答不理。有一次，我秉着要随时随地做政治结论和鼓动的原则，给工人讲着讲着就说到了要革命，结果把工友给吓到了，之后再也不和我玩了。这是工友不觉悟吗？不是，这是我们工作太粗糙。我们对灌输理解得太机械。”

“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和工友交朋友首先要讲感情，你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和他成为朋友，了解他的经历、困难、苦楚等等，当他和你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之后，很多东西就更容易听进去。”

文章的愿意很明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搞灌输”“这是我们工作太粗糙，我们对灌输理解太机械”，作者从来没有否认不要进行政治灌输，只是结合自身经验提出搞政治灌输的方式要灵活一些，不能机械的去理解和操作，作者此前没有认清工友的思想状况，一上来就机械的搞政治灌输，直接聊革命，推翻政权，就会把工友吓跑，这在今天工人政治觉悟较低的时期，是正常现象，“到工人中去”后来的一篇《谈谈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一文提到列宁姐姐的《回忆列宁》中，列宁说过：“当然罗，要是马上就谈到反对沙皇和现有制度，那只能把工人吓跑。”到工人中去的同志显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教训，作者得出结论“不能一上来就搞政治灌输，先从交朋友开始”，后来作者就改变了方法，并不是不搞政治灌输，而是“平时聊天，不能仅仅是扯淡，要形成以我为主的氛围。我们虽然不再机械地灌输，但是我们常常会讲些东西引导话题，潜移默化地灌输。”，更换了更适当一些的灌输方法。克服对政治灌输方法的刻板运用，使作者后面的工作中发展的较为顺利。也许作者是应该深入分析一下其深层次的原因，或者更具体的阐述一下这么做的理由，更具体的说明为什么要先从交朋友开始？为什么一交朋友革命工作就顺利了许多？他是根据怎样的具体条件的呢？交朋友自然只是了解工人思想状况和加深群众关系的其中一个方式，通过这个方式，就能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处于何种水平，依据一定的群众关系，再通过工人的思想水平制定合适政治灌输策略，执行这个合乎工人思想水平的政治灌输策略，那么取得胜利也就可以预见，胜利也就有迹可循了。

自然这样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高级的方式，但它却是目前比较实际的方式，这个方式比较的符合我们目前这个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时期和革命条件极其不足的阶段的特征。在革命分子和群众关系还基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群众还对革命理论没有系统性了解的时候，从交朋友开始的政治灌输的方式是在很多时候适用的。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仅凭这一点就认定“到工人中去”现在是经济主义的、甚至是“工联主义”的，这样的结论下得太草率了，根据不足、有失偏颇。

2. 制定正确的政治灌输方法

制定正确的政治灌输方法的前提是，要了解目前的工人的思想水平，一般而言，目前阶段我国工人的政治思想水平还较低，普遍的没有掌握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这是主要的方面，所以融工的同志们制定政治灌输策略时一定要首先考虑这个情况，再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策略。所以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如何结合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如何具体的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交朋友是方法之一，在我们目前时期的很多情况下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新十月频道的离火同志在《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一文中，对到工人中去同志的交朋友方法持批判态度：

“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人工作，不能教条的做，而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以后付诸实践，在了解工人整体情况和分类、工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工人的意识状况之后科学地选取话题和方式进行灌输。这个并不意味着要一个一个地去跟工人交朋友，去解决生活琐事，而应该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某地区工人阶级整体情况，分类，他们的意识状况，结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针对性的提出政治灌输的策略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做工人工作时的任务，不是拉家常，不是解决各种生活琐事，而是使得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向着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发展以及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弄不清自己做工人工作的任务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不了解我们的任务和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务是两码事的时候，工作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

前一段中，“这个并不意味着要一个一个地去跟工人交朋友，去解决生活琐事，而应该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某地区工人阶级整体情况分类，”，离火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既认同交朋友，又不认同交朋友，交朋友不一个一个的交，还能怎么交呢？后一段的内容，逻辑是有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工人工作不应该只是为了和工人拉家常解决生活琐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和工人拉家常解决生活琐事，把工人组织起来是目的，而拉家常是实现这个方法之一，为什么要为了实现目的而绝对的排斥某一种可行的方法呢？显然离火同志在这里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很好的理解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在这里犯了错误吗？并没有，他们只是把拉家常当作一种了解工人情况，是为之后去更好的灌输工人和组织工人起来运动的一种工作方法罢了，他们并没有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为了拉家常而拉家常，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方法，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平时聊天，不能仅仅是扯淡，要形成以我为主的氛围。我们虽然不再机械地灌输，但是我们常常会讲些东西引导话题，潜移默化地灌输。”从这里也能看出，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也并没有放弃或者缩小政治灌输，只是结合现实情况改变了方法，后来客观分析了厂内的阶级矛盾情况，运用法律知识，成功的在和厂方的斗争中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使工人达到运动目的、维护了

自己的利益，并且也发展出了新的革命工人，这难道不是值得受到我们尊敬和鼓舞我们的成功吗？这里何来经济主义、工联主义之说？离火同志在文章中还提到了工人运动路线的问题：

“当下，对于渴望实践但是却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做的知识分子们，有这样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

我想要提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刚开始时的政治灌输和理论学习一定要符合所接触的工人的情况，要与他们本身的被压迫的地位，现实的各种矛盾相联系，少列些晦涩的数据，多讲些通俗的比喻；少说些死板的教条，多讲些生动的理论；少说些之乎者也，多讲些是啥为啥怎么办。而实现以上这三条要依赖于对工人们的一切生产生活、政治观点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

离火同志这个路线自然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也值得大写特写，我们会有其他同志的文章负责专门指出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这样的分类和作者的说法有失偏颇，作者表达的含义应该归结为，第一种是经济斗争的思路，第二种是政治灌输的思路。但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并不冲突，在革命者领导的实际的工人斗争中，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甚至在目前工人阶级意识尚未觉醒的时期，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配合比纯粹的政治灌输更能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在和厂主的斗争中，必然会意识到工人的阶级地位以及政府在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我国工人阶级暂时做不到政治斗争的时候，去领导他们更好的完成经济斗争，并在经济斗争中和经济斗争之前和之后也不停的对工人作政治灌输呢？为什么不能让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和我们长期的政治灌输中迅速的把自己的斗争发展和转变为政治斗争呢？正如列宁所说，“警察、警察局长和宪兵作威作福，在同工厂主发生任何冲突时，他们必然为工厂主撑腰，还有所有当权人物对罢工持什么态度，这一切都会迅速地表明，他们是站在哪一边的。”，离火同志文章中还有说到：

“那么是否应该从经济斗争开始，和工人先交朋友，不谈政治灌输或者少谈政治灌输，等到筛选完人以后再着手谈政治灌输呢？我们需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进行灌输和启发，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经济斗争固定成一个阶段，固定成政治灌输的前置流程，并不意味着没有经历过经济斗争的工人就不能进行政治灌输。”

前一部分不知是否是针对到工人中去的同志而言，很显然，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并没有犯“不谈政治灌输或者少谈政治灌输”这样的错误，至于“等到筛选完人以后再着手谈政治灌输”，当然要筛选一下的，如果一些工人的思想太过落后，哪怕你谈一些非常浅显温和的政治问题，他都不愿和你谈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花大量的力气去发展他而不是其他条件更好的

工人呢？众所周知，我们目前在工厂里的工作应当是优先培养发掘那些积极斗争的工人同志，而非先抓着那些落后的工人不放，那样只会浪费我们的精力，作者后文也说：

“只要工人对于我们的观点都是比较接受，愿意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就可以立即进行政治灌输了。”

这难道就不是一种筛选吗？不论做工人工作还是其他方面的工作，一定的筛选是必然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做工人工作而言，就要筛选出那些思想进步的、思想较进步的、思想较不进步的、思想落后的等类群体，根据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政治灌输策略，当然主要还是抓那些思想进步的 and 思想较进步的，当我们把进步的工人们发展为革命的工人时，我们就有更好的条件带动剩余那些思想较不进步的 and 思想落后的工人大踏步的前进了。

除了这种比较手工的交朋友方式去了解工人思想状况并进行政治灌输，还有另一种方式，在《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一文中，作者提到了以一种公开的名义把工人聚集在一个圈子的方法，这样发展工人的效率要比一个个交朋友要高的多，并且突破了厂区的限制，可以发展其他厂区的工人同志，并且他们并不止步于公开合法的组织，更进一步的进行筛选，挑选好苗子组织成立了更秘密的组织，这种方法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一文中提到的以个人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发展是左翼同志做工人工作的第一步，那么《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提出的以公开合法组织做工人工作的方法则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效率更高接触工人的圈子更广。至于其他的方法，笔者目前不敢擅言，这两种方法是有左翼同志的工作经验为依托的，经过了革命实践的检验，所以笔者暂时只能讨论这两种方法。

解决了如何了解工人思想状况的问题，那就可以制定政治灌输的策略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制定政治灌输策略的人群，是针对那些工人群众中思想较先进的一部分，就像《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中提出的秘密组织一样，从公开的外围组织中挑选思想较先进的组成秘密核心组织，针对核心组织成员的思想水平制定政治灌输的策略，在阶级斗争的磨练中引导他们成立工人组织，由工人组织带领厂内员工进行斗争，当全国各地或者哪怕是阶级矛盾尖锐的部分地区纷纷成立这样的工人组织，有了这些坚固的革命工人的核心组织和大量受这种核心组织所影响的工人组织，那么我们就距离事实上的建党不远了，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建立，将通过带领工厂中的党组织来带领工人组织，通过工人组织带领厂内全体员工，将以此来带领整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带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掀起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修专制制度，建立社会主义。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脱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各种反动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着我国人民群众。并且还利用各种反动舆论或艺术作品来灌输各种反动思想给我国无产阶级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习惯性的控制社会舆论、歪曲事实，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反动意识形态进而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应该揭穿他们的鬼把戏，唤醒我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部分集中了一些相关文章及评语，供大家参考。

评“九二大起义”的根源及意义

革社（RSF）编辑部

一.“起义”的背景

对于这场激烈的学生运动外界是所知甚少的，甚至我国整个学生群体和革命分子们也对此所知甚少。而发动这次运动的当事学生们，把这场激烈的学生运动称为“九二大起义”。虽然这个用词有一些夸张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学生运动是极有意义的。这场运动是我国目前的整个学生运动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了我国学生运动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极为可喜的，但它也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学生运动中的种种不足，以及我国革命分子工作的种种不足，以至于使这场运动成为一颗飞速消散的流星，完全没有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作用。这种“流星”，还在不断的出现和消失。

这场运动发生在9月2日的河南永城第一高级中学。因校方肆意减少学生休假，引发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开始学生们只是采用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但被校方用报纸遮盖后，最终引发大量学生赶往教学楼聚集抗议，学生们还起草了一份“九二大起义”书。有5000多名学生在教学楼门前聚集抗议、游行，并张贴大字报、演讲、放广播、挥条幅等，还有学生演讲被抓。

今2023年9月2日，我市第一高级中学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大起义，起义原因是我校领导将一周一次的小星期压缩至短暂的50分钟且将两周一次为期一天的大星期改为三星期休息一天，打着为确保学生连续性学习和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来压迫我一高学子。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校学子共同组织了一场起义，在公告栏处贴满了“誓死力争，还我星期”“一高不能没有小星期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像山东不能没有青岛”等字报，但校方却用一张又一张的一高报纸糊住了，糊住的不仅是那些字报，更是上千名一高学子共同的心声。所以很快，学生们开始撕字报，重新贴回了字报，近5000多名一高学子站在公告栏前，花坛中间起义反抗。每每有一张字报贴在公告栏上一高学子便高呼一次，不过几秒钟，公告栏已是满满当当，第2节晚自习下课时，学生们开始在公告栏前聚众游行，表达着对学校、对校领导、对校领导做出的决定表示不满，可历史上有哪次起义成功过，我方还在与校领导积极周旋，事情还在发酵中，未完待续。

-一高学生们所写的“九二大起义”书

在推特等墙外领域可以搜到一些事件的相关视频和照片。有人总结了“永城一中起义事件”一些经过，9月2日晚学生们在学校大厅贴字报并发表演说博得“热烈掌声”，引发“学生们的反抗热情”。“起义”方式则采用了投意见信、张贴大字报、演讲、广播放《常回家看看》、挥条幅等。

而校方在公告栏处安排教师进行震慑并“对起义学生进行摄像”，结果大字报全部被撕，“个别学生被抓”，且“校领导恼羞成怒”，要求对部分起义学生“调监控排查”，把借读生赶走，处分本校生。有学生总结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有两个校区近 13000 名学生的永城一高，在一天之内就有 5000 学生参与了这场斗争，可见运动的根源之深。运动的整个过程虽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但它也造成了极其进步的意义。虽然许多学生被打击，但学校企图削减学生们的休假的行为遭到了阻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此校领导都不会再做进一步的挑衅。

这所学校给予学生的恶劣条件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可以从过去一些该校学生的网络留言中就可以找出许多。

原来我一天可以 16 个小时待在学校（惊讶）

原来我可以 4 周才有一个休息日

原来美术课是用来看电影的，而且是未完待续

原来中国的高中生是这样生活的！

原来手纸在教室里是这么的抢手

最后 永城一高你欠我一套校服

-永城一高帖子下的留言

2016. 12. 10

在 2021 年的 11 月 29 日，永城一高就有一名学生跳楼自杀的案例。这名学生正就读高二年级并分到“加强班”，他选择走读，但每天晚上在家做作业要做到深夜 12 点左右才睡觉，早上 5 点 30 分就要起床。这名学生的去世自然在给其家人带来深刻的不幸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学生学习条件是极其糟糕的，每天的睡眠大约只有五个小时。虽然学校和家人没有说明或者说他们也无法确定这个学习较好的学生的自杀原因是什么，但我们相信这个学生的学习条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几年前这个地区的也发生过一场斗争较为激烈的学生运动。

中国网络资讯台河南永城 5 月 15 日电，5 月 14 日晚上，河南省永城市实验高级中学部分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在用晚餐时与食堂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争执过程中，掀翻桌椅，损坏了门窗。永城市公安局迅速出警，积极处置，出警过程中一辆警车受损。事情发生后，永城市相关领导迅速到达现场，及时控制事态。

-2015 年 5 月 15 日

这场事件具体的直接原因是该校食堂经理殴打卖学生鸡蛋的老人，校方不给予回复，食堂经理失踪。学生强烈抗议，打砸食堂。特警前来维持秩序，乘坐的警车也被学生掀翻

砸烂。常年积压的饮食问题的矛盾（长期克扣学生饮食，并不准学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在校用餐），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个矛盾也是我国校园中的万千阶级矛盾的一种。

总之，日常休息时间的不足、极大的学习压力、不足的饮食条件、被克扣无几的休息日。可见在这样残酷剥削、压迫学生的地方，爆发激烈的学生运动难道是什么意外吗？学生除了以斗争来维护自身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二.起义的经济、政治根源

日本宪法学界有句话，“工厂大门一关，宪法就进不来了。”这个现象不仅只出现在日本，在一切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无产阶级那都是这样，这反映的是无产阶级被压迫的社会地位，当在资产阶级具体的统治无产阶级的地方，法律（包括宪法）对无产阶级的一切保护作用就开始失效了（虽然这种保护本来就是很局限的，是对奴隶利益的保护）。而一当无产阶级开始反抗，特别是非法斗争的时候，法律就又成为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因为法律的性质从来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是服务统治阶级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学校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简单概括一下便是：“校门一关，法律就进不来了。”我国广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是和我国无产阶级的遭遇是相似的。削减假期、饮食问题、学习强度高、住宿问题、各种经济上的剥削，以及其他的各种压迫现象。这些都使得学生得到不到应有的尊重，哪怕是法律范围内的基本权利也时常被学校侵犯，学校的制度和学校领导的行为经常性的违反法律，虽然这种法律本来也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任何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无上限的，他们为了追求利润和社会地位的稳定和发展就必要经常性的违背他们自己的法律，以及把这种法律的内容变得更加的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冲突。

并且，我国教育还有其他特别的特征。我国教育在经济和政治的本质都是高度资本主义化了的教育，当然这种高度资本主义化不是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一般的高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生是教育部门的主要商品然后交换给社会其他工商业部门，这种商品是现代劳动力的重要构成部门。“校门一关，法律就进不来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教育部门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无计划性在教育部门表现为盲目加大所谓的学习量、整体无计划的继续追求扩大对“优秀学生”的生产（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标准下的“优秀学生”），各个学校为了扩大利润和使学校领导获得政治利益都在盲目的扩大生产，加剧对学生的摧残；除此之外，也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的商品供需的现象，“优秀学生”的供给大于社会上各资产阶级的总需求，导致的商品价格严重下滑乃至生产费用以下，普遍的失业、过低的和难以回报过去家庭对教育的支出的劳动报酬将是这些学生未来将要遭遇的普遍现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没有减少教育部门对我国学生的催产，反而更加剧了这一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所必要的政治需求，特别对教育的阶级再生产作用的需求变得愈来愈大，越来越多反映官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纳入了一般学生的教材和必学课程中，越来越多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成为了考核学生的标准之一，比凯恩斯主义还要强大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干涉越来越多反映在学校和各级官僚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学习中的各种剥削、压迫的强迫行为中，因此不得不在教育部门催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阶级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教育部门的阶级在生产作用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会促使他们更多的考虑政治上的利益而非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产阶级教育供需关系平

衡的经济利益，所以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我国现在教育部门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供需关系的极不平衡只会继续的扩大，教育部门的阶级斗争只会愈发严重。想体验最彻底的垄断资本主义教育吗？想体验最彻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教育吗？就来我国现在的学校学习吧。

三.起义的意义

这场永城一高学生们的“九二大起义”，虽然以严格的历史标准来看他还达不到政治上、军事上的起义的程度，它仍然是一场经济斗争，是教育部门范围内的经济斗争。起义主要的目的是要求学生们的经济利益，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要求减少学生的受压迫、受剥削程度的利益，而且这种减少还只是对于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进攻的反击，而不是追求恢复到更高的程度。但从社会意义的方面上来看，特别是从对教育部门的意义方面来看，称为“起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场运动试图更激烈的撼动一潭死水的教育部门（当然，还只是一次撼动），斗争的激烈程度是近年来少有的。它再一次的证明了我国学生的也是阶级斗争的进步力量，这里的斗争可以培养起许多的能在未来进一步推动社会革命的群体来。

而这个起义，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色彩，他们以大字报的形式和一些带有革命色彩的口号来进行这场本质目的为经济利益的斗争。这就和之前河南储户事件中的受害群众在没有任何团体干涉和帮助下他们就自发的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斗争一样，我国许多领域的自发的阶级斗争也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自然，永城一高学生们的这次斗争也和我国其他绝大多数阶级斗争一样，从经济斗争阶段就已经和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联系。这是我国特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特殊性造成的必然现象（他们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特殊的统治意识形态），也是我国过去的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部分社会遗产，它使我们今天的一切经济斗争都不可避免的和社会主义革命扯上联系。我国的被剥削群体从他们过去的全部生活和今天存续下来的一切革命历史的传统（他们学习的课本上）教会了他们仇恨一切资产阶级和官员们，很多时候甚至还教会了他们必须要利用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必须要革命，但怎么斗争、怎么革命就没人去教会他们了。今天，学生们的经济斗争也必不可免的牵扯上了这样的联系，这证明着学生们的斗争在未来也必然能够发展为构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

对于现在我国的整体的群众运动来说，学生们的这次起义完全证明的他们的进步性。说明我国其他的各种阶级斗争群体、其他的阶级的斗争在斗争所需要的时候也完全可以逐渐的和学生们的斗争联合起来，形成跨社会群体的更广泛的斗争。斗争之间可以形成联合，各个群体之间也应该互帮互助、互相宣传，这只会扩大我们的力量，不仅更有利于进行和完成各自经济斗争，更能够造成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乃至于革命的条件。

对于学生运动来说，这次起义也树立了一个标杆，学生们用最广范围内团结的游行示威、集体诉求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学生们所遭受的各种剥削、压迫的现象，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由于学生们也经常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现象（比如必要违背法律的现象等），所以也可以经常的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来更好的进行这种斗争。一整个学校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学生们的集体斗争在过去许多年内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只需要看看我国教育部门每天所产生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压迫现象，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

“起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国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学生们的各类组织都应该积极团结更广大的同学以准备时刻进行这样斗争来维护大家的利益。

这场“起义”是我国目前全部学生运动和学生们的榜样，这标志着我国学生运动下一个发展阶段。既普遍的、广泛的和社会主义运动扯上必然联系的经济斗争范畴的“起义”。当这样的起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有条件进行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运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国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应该成为这个斗争的带领者。

四.“起义”所揭示的不足

如果我国革命分子、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和学生群体们的宣传工作足够强大，而做到这样程度，以至于能把关于此次运动正面宣传在全国范围的学生团体里普及开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学生们的整体进步并酝酿更大范围的、更深刻的学生运动，并也更能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关注和可能的团结。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次运动的声浪也像过去的绝大多数运动的结果一样，被迅速的抹杀、被迅速的歪曲，以至于绝大部分社会群众、学生群众都不知道这件事，就算有少数知道的也是知道的不多或者只知道一些被歪曲了的情况，除了对于事件的参与者和直接关联着们，这场运动简直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场运动被抹杀之快、之彻底，对于哪怕是一些较为进步的革命分子来说，哪怕是那些会专门关注国内阶级斗争运动得进步人士来说，也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这场运动。

在宣传方面来说，我国革命分子和其他进步人士们还不够擅长全面的观察我国正在发生的各种阶级运动，乃至让一些运动漏了过去。并且对于已有的工作来说，许多同志对我国许多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事件了解程度还不够深，很多同志仅限于表面，对于许多运动只知道一定是被资产阶级歪曲和抹杀的运动之一，而对于运动的具体发展情况，乃至运动意义和问题，运动的阶级根源乃至政治、经济根源则了解更少。走马看花的习惯还很多的存在于一般革命分子那，这种习惯阻碍我们去了解现在斗争的发展情况，运动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各种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于运动本身的方面来说，这次永城一高学生们的这次“起义”也揭示了许多方面的不足。学生们斗争是经济斗争的诉求，许多要求都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但没有足够的利用法律来帮助自己的斗争，也就无法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解决本次经济斗争中的个别斗争的具体阶级矛盾，也就容易引起需要面对更多敌人联合起来的打击。法律是完全可以利用起来服务学生们的斗争的，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严禁学校以各种名义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和课余时间组织任何年级学生补课或有偿补课”。而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

第三条 严格控制学生作息时间。走读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和文体活动）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7小时、高中不超过8小时；早上到校时间冬季不早于7:50，夏季不早于7:30；放学时间冬季不晚于17:30（小学不晚于17:00），夏季不晚于18:00（小学不晚于17:30）；晚上不上晚自习。寄宿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9小时，高中不超过10小时；小学不上晚自习，晚自习时

间初中不超过2课时，高中不超过3课时；晚自习结束时间初中不晚于21点，高中不晚于22点。上课不提前，下课不拖堂。国家法定节假日，学校必须放假；寄宿制学校可视情况实行月假制度，但必须补足法定节假日时间。

- 《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的规定》

除了各种法律条文以外，还有更多可以利用起来更好的完成这场斗争的合法工具。

而本次学生们则在“起义”中采用了“投意见信、张贴大字报、演讲、广播放《常回家看看》、挥条幅”等方式，这些方式目前看来还是很不足的。因为单用这些方式虽然看似采用了一些合法的行为，但实际上又完全没有真正利用到合法斗争的工具，法律等各种对具体资产阶级有名义上的强制力的合法斗争工具又完全没有利用起来，所以这些行为在资产阶级看来还是力度不足的。虽然我们知道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学校中，总会经常出现个别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违背法律进一步扩大生产以剥削、压迫学生的现象。但这也是我们可以经常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自己的总的法律和其他总的合法工具利用起来和个别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之一，也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就经济斗争范围来说，这个工具是特别重要的，他能减少我们每一个具体斗争的敌人，并扩大我们每一个具体斗争所能团结起来的力量和每一个具体斗争所能影响的范围。从这一点看，这次“起义”还是不够成熟的。并且利用这些工具进行合法斗争也有利于我们在目前这种革命运动还处于萌芽的阶段、群众的阶级意识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影响和团结起更广范围内的群众。

除此之外，斗争所必要的组织工作仍然是不足的。斗争依然很大程度的要靠运动自发的所产生一些有组织的现象，临时选出几个代表等等。但斗争本身是缺乏计划性的，是对斗争可能遇到的情况所准备不足的，斗争进行了许多不必要精力的浪费，而对关键敌人又缺乏了打击。更重要的是，这次斗争没有留下有继承性的可以用作未来继续维护利益和进行下一次斗争的组织，不管是群众组织、革命组织一律是没有留下的。之后如果这里还要进行斗争就必然也要从零开始了，这就使得这次斗争的变得特别局限，不仅对外影响局限，而且对于本身所在学校和地区的影响也变得局限。为了经济利益而自然的进行临时的组织、临时的斗争，斗争结束后又放弃组织，这只能使得面对侵犯时学生们的每一次的利益都得不到更好的保障，斗争每一次都很难达到更高的程度，敌人在侵犯学生利益前可以一次比一次准备的更完备来对付总是准备不足的学生们。所以我们呼吁学生们要组织起来，要有服务于自己利益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以使得我们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且这个组织要有继承性，以便长期的维护自身利益来和一切剥削、压迫做斗争，并能把斗争发展到更高的程度来更彻底的维护我们的利益。

简评《治安管理处罚（修订草案）》引发的舆论热点事件

革社（RSF）新闻部

一. 事件起因

9月1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一条款很快成为了热点新闻，就是新增的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穿着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论”将被处以罚款和拘留。公示将在9月30日结束。

这条法规将赋予警察更宽泛的执法权，理论上来说，任何在日常或敏感时间点吃日式食物，穿着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动漫角色，喜欢日本文化，针对核废水发表不同看法，以及未来可见的和西方文化生活等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视为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和有损中华民族的精神。

二. 网友热议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担忧，然而观察者网发起了是否赞成修改《治安管理条例》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者占压倒性优势。

到了9月8日，中国人大网《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已经征集了60000人参与发表的70000余条意见。

然而在9月7日，“冒犯民族感情该不该入罪入罚”话题已被微博封禁。网易新闻发布了文章“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媒体的沉默震耳欲聋”，列出了国内十余家主流新闻媒体对此不发一言的现象。

很显然，如果没有官方的威胁或是强制命令，没有哪个媒体愿意错失这样一个大的新闻热点。对于一部法律的修订，官方不允许媒体发声、不允许人民群众评论，说明这个国家的法律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是为法律的制定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观察者网的投票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蛊惑，坚定地站在了统治阶级的立场上。

三. 一些知名人士的评论

1. 胡锡进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禁止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一事在微博发表评论，他称有必要将“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内容做一些具体化。

胡锡进虽然作为统治阶级的喉舌，但他所指出的问题也确实确实是广大网友争议的焦点，所谓民族精神、民族感情都是主观概念，不能作为用来判断是否违法的标准，而胡锡进对此给出的建议是将其具体化，看起来是想解决广大群众所质疑的问题，然而要把“精神”“感情”具体化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2. 多位法学教授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某位教授称第 100 条增加公安机关强制公民人身检查等职权是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非刑事侦查不得采用。

清华大学刑法学的劳东燕教授建议删除第 34 条第 2、3 款，并给出了 4 点理由，一是“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内涵极其模糊，容易造成任意扩张处罚范围。二是由此容易滋生选择性执法导致腐败，激化警民矛盾，给稳定带来新的风险。三是国家权力干预公民个人日常穿着有过度干预之嫌。四是会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肆意蔓延，加剧与一些国家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

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的童之伟教授则抛出了四个法学难题，“中华民族精神”由谁确认？按什么程序确认？“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由谁体认？按什么程序体认？他说这些都是极大的、无法遵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一旦通过势必造成按长官意志抓人定罪后果，会贻害无穷。

这些法学教授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此次治安处罚法修订草案的问题，可以看到，把“民族精神、感情”纳入到法律体系中的做法甚至超出了资本主义法律架构的常规，对于社会稳定、国际关系都会产生恶劣影响。

3. 古原评论：请问，“损精神、伤感情”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我使用苹果手机算吗？我穿一件西装算吗？我打一个领结算吗？某个姑娘穿个和服拍个艺术照算吗？

他称这是一种完全基于主观判断、千人千面的，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判断。而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法律的边界还要随着外交情况而反复变化。

而治安处罚是由基层民警就能决定的，而全国民警的主观标准如果不能统一就会造成法律如同儿戏的现象。另外也会加剧舆论上的混乱分裂，对于持有不同主观认识的人互相举报该如何处理？还有在华外国人也要遵守中国法律，这将进一步将外国人拒之门外。

古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这个修订草案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可以说，这部法律草案的荒唐显而易见，让人不禁联想起文字狱，在过去的一些影视剧中曾经演绎过那个封建王朝的最黑暗时期，凡是疑似伤害到清王朝皇帝感情的通通治罪，沿街商铺牌匾上贴满了遮羞布用来掩盖违禁字眼，百姓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甚至用肢体动作和哑语，有人只说了一句明几个要去哪就被抓进牢中严刑拷打。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荒谬到极致的法条如今却又要被统治阶级付诸实施。

四. 官方行动

9 月 7 日上午，山西省司法厅通知辖内律师不得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随意发表评论。

9 月 11 日，片区派出所在其工作联络群中，要求辖区企业对公众号“也评”文章《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动了谁的蛋糕，谁又破防了？》进行投票和点赞，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报。而两个投票选项为“旗帜鲜明地支持第 34 条第 2、3 款”和“差点被所谓专家带了节奏”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网友判断，此举可能是在为强推该法开始进行舆论造势。

据悉，这种官方账号假装为个人账号，号召系统内全体转发或者要求动员企业转发或者投票的行为并不罕见。一来起到宣传作用，可以蛊惑一部分群众。二来可以向上提供民意数据，为上级领导的意志凭空捏造出民众支持的假象。三来，通过行政权力强行制造的大量流量和点击可以合理地平台获得巨量广告流量收益，是一种创收的绝佳手段。

随后又有网友称体制内再次要求转发公众号“也评”的文章，并要求投票旗帜鲜明地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34条的第二和第三款立法。

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讨论，政府将所有表达过反对意见的大V被全部统计成表格“拉清单”，下发全国各地网警部门，要求组织动员体制内人员前往它们的评论区进行控评（如图4）。

也就是说，我们在热门社会话题下方所看到的很多正向评论，其实是全国网警一起努力的结果。

官方使用强制手段禁止人民群众和法律从业者对法律修改发表不同意见，并且扶持虚假账号为新法摇旗呐喊，将其反人民的本质暴露无遗。

五. 被争议所忽视的地方

法学教授指出了此修订草案中除了争议焦点的民族精神和感情外，在其他条款中还存在侵犯基本人权的问题。

网友经过对比发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不仅仅只有第34条“伤害民族感情”那么简单，草案里很多条都扩大或者下放了执法权。

例如第31条将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的改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或无线频率。第59条将原本的罚款数额从200元以下提高到5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从500元以下提高到1000元以下，还增加了具体情形表述“以侮辱、谩骂、威胁、围堵、拦截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第100条允许人民警察强制检查人身、提取采集肖像、指纹、血液等生物样本，第122条新增可以在异地执行拘留。

统治阶级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抛出一个饱受争议的民族精神问题吸引眼球，由于群众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抱持着民族主义情感，因此这个话题能够有效地将广大群众的目光聚焦于此。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暗中瞒天过海妄图神不知鬼不觉地急剧扩大公安机关的权力，大规模加强对于人民群众的管控和镇压力度。即使第34条的2、3款最终通不过或者再作修改，他们也成功地为其他更恶劣的条款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而我国统治阶级的权力集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用来吸引火力的第34条2、3款甚至也有可能被他们凭借强权而强行通过，那就是对人民群众尊严和权利的严重践踏。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这部治安处罚法修订草案，团结起来扩大影响力，首先要依靠广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法律，然后我们也需要联合那些仍有一定良知的法律学者，共同努力阻止这种法律的通过。

不过在这个修订草案还没通过的现在，公安机关滥用职权的现象也早已普遍存在，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究竟有没有违法还是由他们内部及其他司法机关来认定的，人民群众是没有权力监督他们的，这是因为公安机关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个修订草案如果通过只是给他们披上了一层更有说服力的合法外衣罢了，如果没通过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于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伤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坐以待毙，要勇敢地发声，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迫使统治阶级作出让步。

2023年8月中上旬到9月中上旬工人运动的趋势

革社（RSF）新闻部

由于读者朋友们反映每一起工人运动的具体信息都列出来意义不大，因此我们这期只给出统计数据。

从2023年8月13日至2023年9月12日期间，我们总共收集到了194起全国各地欠薪、讨薪、劳动者维权、纠纷等相关事件，平均每天发生6起以上工人运动！数量比上月多出了一倍多，其中参与人数超过了100人的多达39起，这说明从8月中旬开始我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一波新高潮。

地区分布如下：广东72，陕西18，河南14，湖南8，山东8，四川8，湖北7，浙江7，河北6，重庆6，吉林5，福建5，辽宁4，江苏4，上海4，云南3，山西3，黑龙江3，贵州2，北京2，天津2，广西1，内蒙古1，甘肃1。其中广东仍然占据总数的36%，仍然是工人运动第一大省。

行业分布为：建筑业119，制造业48，服务业15，交通物运输9，教育业2，采矿业1。可以看到，这个月的建筑业工人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与过去数据相比，制造业的工人运动数量在几个月前与建筑业水平相当，而如今建筑业的数量已经超出了制造业的一倍多，说明近期建筑业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

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发生了111起，国企有61，外资7，港澳台7，事业单位7，中外合资1。民营企业仍然是阶级矛盾爆发的主要领域，而国企工人运动的数量相比上月也有了显著增多，占比已经超过了30%。

这一个月以来工人群众采取的主要行动仍然是抗议或游行，而其中罢工的有60起，静坐的有21起，威胁跳楼的有7起，阻塞交通的有3起。另外，要求劳动司法机关介入的有34起，联系媒体的有20起，上访的有19起，申请仲裁的有2起，这说明工人群众有意识地寻求扩大影响力的方法，争取通过媒体或自媒体平台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并且能够利用统治阶级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歧来争取维护自身利益。而官方对此作出的反应，组织集体协商谈判的有30起，政府介入事件的有28起，警察出动的有23起，工人被打的有1起，工人被捕的有1起，工会介入的有1起，政府不作为的有1起。工会作为本应维护工人利益的机构，在将近200起工人利益遭到侵害的事件时仅仅出面了一次，而更多的情况是警察出动帮助资本家残酷镇压工人，这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些工人运动中，工人的诉求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其中要求解决欠薪问题的有 182 起，迁厂或关厂问题的有 21 起，要求经济补偿金的有 15 起，要求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的有 8 起，要求加薪的有 6 起，要求解决社保问题的有 6 起，要求管理层监督的有 2 起，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的有 2 起。

过去工人斗争的历史表明，在自发斗争的情况下，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为了扩大生产，劳动力会出现一定的供不应求现象，工人的斗争因此会有所增强，一般会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而这个月出现了 6 起要求加薪和 2 起改善工作条件的工人运动，在加上 8 月社融数据相比 7 月的强劲恢复（7 月社会融资数据为 5282 亿元），和上月、去年同月相比，都反映出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复苏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月实体经济（第一二产业）的贷款发放的增量却同比下滑了。

中新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中国央行 11 日公布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8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3.12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同期多 6316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34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2 亿元。

此外，8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68.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30.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 《中国新闻网》

虽然这个月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但这些运动仍然是主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依然没有任何政治斗争，这些工人斗争也没有广泛地建立联系，在取得资产阶级的一些让步后就会消退。经济斗争目前还是我国工人斗争主旋律，不自觉的经济斗争（没有计划性、组织性的）是我国工人现在进行的经济斗争的一般水平。没有足够的用作一切工人斗争的组织，没有革命分子扎根的工人组织工作，没有革命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广泛联系，所以也就无法的有力的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无法对无产阶级进行系统性的政治灌输，这些问题仍然是阻碍我国群众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希望我国有条件的革命分子能够扎根进工厂作组织工作，其他无参与此种工作条件的革命分子以应该积极的宣传扎根工厂的组织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革命思想工作。

第四部分 国际文章

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的事业。我们把这一部分用来整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文章，主要是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或革命组织的文章。用来丰富我国革命者的国际视野。

对贡萨罗主义的批判性评价

作者：美国毛主义共产主义联盟

Author: Maoist Communist Union (USA)

翻译:RSF 编辑部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不同思潮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关于贡萨罗主义的争论已成为焦点，许多政党和组织发表了各种对贡萨罗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不同评价。在之前的《赤文》杂志中，我们讨论了其中一些问题，包括全面分析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革命策略¹，以及评价巴西共产党-红线（以下简称为巴共红）²和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对贡萨罗主义评价之间争论。³

最近，巴共红和秘鲁共产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总结他们认为是贡萨罗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这些团体和其他团体最近还成立了一个叫“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新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该联盟大部分由贡派组织组成，但不是全部。在其成立声明中，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坚持许多贡派核心原则，包括所谓的“人民战争的普世性”。他们还声称贡萨罗“以完整科学的方式定义了毛主义”。该联盟现在自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旨在在其旗帜和纲领下团结所有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同时要求加入者服从联盟的民主集中制控制。该组织的统一建立在遵循贡派理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理论并没有被国际上主要的毛主义政党所坚持。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理论上和历史全面地批判贡萨罗主义的主要特点，以推进对此问题的清晰认识。我们希望这一分析能帮助揭露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正在玩弄的骗术花招，他们企图歪曲过去和当下毛主义革命斗争的光荣范例，并用庸俗的口号和半真半假的理论来掩盖我们运动的实质。

巴共红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中的领导组织之一，声称不坚持贡萨罗思想（他们称之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即“MLM-PM”）的人都是修正主义者。例如，在他们的文件《列宁和军事化共产党》中，巴共红提出以下说法：

新修正主义关于党和建设路线的本质在于否认军事化共产党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圆建设的必要性。他们通过否认党的同心圆建设的性质，就否定了共产党对另外两大革命基本工具的绝对领导权这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由此否定了通过人民战争建立新政权，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这隐藏在他们“具有很大弹性的坚固核心”和“多党竞争”的公式中。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和重建过程中，军事化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圆建设是决定性因素，这为发动人民战争的伟大飞跃奠定了基础，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虽然他们正确地认定阿瓦基安主义（“具有很大弹性的坚固核心”）和普拉昌达道路（“多党竞争”）是修正主义的形式，但这篇文章的其他表述显示，贡派认为每个不坚持“军事化共产党”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圆建设”的政党，事实上都是在推行新修正主义。他们甚至明确指出，这两种方法是“决定性因素”，为发动人民战争和建立共产党“奠定基础”。所有这些说法令人困惑，甚至荒谬至极，因为当今世界上两大人民战争的领导力量——菲律宾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都不坚持党的同心圆建设和军事化共产党的路线。

因此，从巴共红的表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一、 这些政党根本不是毛主义的，而是修正主义的。

- 二、 这些政党并没有真正发动人民战争，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发动人民战争的基本前提。（即没有使自己的党军事化，也没有实行“三大工具的同心圆建设”）
- 三、 唯有当这些党坚持“军事化共产党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圆建设的必要性”时，它们才会停止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并构成为（或重建为？）真正的共产党。

巴共红及其相关的贡派政党发布了各种团结声明并进行了各种努力以支持印共毛和菲共，但是现在，他们对何为修正主义的分析却又说明这两个领先的党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尽管巴共红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这却是其政治路线的逻辑指向。这令人关切，特别是在他们正把自己定位为最新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内部的一个国际中心的时候。尽管事态还没有恶化，但同志们在美国和国际上都需要认真评估这些发展态势，并从这一重要的争论中吸取经验教训。

鉴于一众组织已团结起来辩称是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完整科学地定义了毛主义”，因此亟需对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进行冷静评估。这尤其重要，因为贡萨罗和秘共提出的许多立场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立场直接对立。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声称贡萨罗“完整科学地定义了毛主义”是错误的。事实上，尽管贡萨罗反对秘鲁和国际上的某些形式的修正主义，但他也以所谓“总结”毛主义的名义“修正”（因此否定）了毛主义的关键内容。为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们必须理解毛主义的基本经验教训，特别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般来说，今天的贡派在这些问题上是非常无知和困惑的。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少得可怜的东西通常是以极其公式化的方式反复背诵的，并将其机械地移植到不同的环境中，或选择性地引用以证明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总结的阶级斗争经验教训根本不同（贡派的）的结论。因此，当他们声称贡萨罗在创造他们通常称之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无论他们使用“总结”还是“定义”这个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时，他们只是揭示了自己与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的分歧。

在此，我们旨在概述和批判 1988 年后秘鲁共产党推广的贡萨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并解释这些如何与秘共在人民战争中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有关。特别是，我们分析 1988 年的《政治总路线》，以展示至少在那个时候，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已经抛弃了马列毛主义转向一种修正主义政治，这与林彪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是国际共运中更大的必要努力的一部分，以总结秘鲁共产党的成功和失败，以及贡萨罗的理论贡献和错误。我们希望这一努力会丰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围绕这些重要问题的争论。

简评

这份文件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秘共成败的全面总结。我们知道一些向这个方向前进的努力，但无疑还有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期待阅读和批判性地参与这些努力的成果。

目前，来自秘鲁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共运声音，对秘共历史提出了极其简化和教条的分析。这些说法普遍拒绝对贡萨罗的领导作出批判性评价，倾向于重复秘共在 1980 年到 1992 年之间的各种机械的（甚至近乎宗教性的）口号，以此来为这种做法辩护。这些力量对秘共历史和贡萨罗领导的任何批判反思所表现出的极度攻击性态度，成为国际共运内部对秘鲁阶级斗争真实历史达成清晰共识的重大障碍。

此外，这种狭隘而又聒噪的教条主义——有时甚至坚持不仅秘共从未犯过任何错误，还认为秘共代表了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顶峰，这正中反共各方之下怀，他们企图完全抹黑秘共领导下的秘鲁人民在人民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当各种资产阶级和反共评论家是唯一批评秘共各种缺点的人时，尽管他们的批评往往以夸张的方式进行，目的是完全抹黑革命斗争，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至少会被这些叙述部分说服。只要真正的共产主义力量无法对贡萨罗领导下的秘鲁革命斗争提供足够清晰和客观的唯物主义分析，情况就会是这样。我们希望，尽管我们自己能力有限，但我们可以以谦虚的方式为提供客观和唯物主义的分析做出贡献。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由于公开可获得的秘共内战时期文件的极度匮乏使它更加困难。例如，跨1968-1992年的《秘鲁共产党文集》三卷中，缺少了这一关键时期的许多文件。甚至贡萨罗和秘共撰写、发表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出版物《赢得世界》上的一些文件，也没有收入这些“文集”。由于《赢得世界》可在线公开获得，研究这些文件不是问题。然而，我们无法找到许多其他我们知道确实存在的文件的副本。例如，《文集》中没有1983年或1984年的任何一个文件，而这两年是武装斗争的关键年份；它也缺少党1982年关键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文件。许多其他重要文件，如贡萨罗的《党的军事思想》和《伟大计划：夺取基地》等，也没有收录，我们也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它们的副本。同样，我们找不到（电子或实体的）秘共理论刊物《新民主》的任何副本。

关键文件的获得有限必然使我们无法对秘共这一时期的成败或其政治路线的发展进行全面的分析。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在本文件中，我们旨在批判分析贡萨罗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尤其是秘共198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并在当年的《政治总路线》中阐述的原则），明确指出它们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巴黎公社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相矛盾；从而表明，在秘共的“总结”里，优秀成果并无新意，新的东西则毫无优点。虽然无法获得关键材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无可避免会有缺陷，但鉴于贡派目前在国际共运中的负面作用，我们仍必须努力分析和批评贡萨罗主义的关键教条。

话虽如此，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秘共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推行修正主义的和任何折衷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贡萨罗和其他人成功地与秘共老修正主义决裂，走上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他们受到了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启发，也受到荷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影响，后者在1928年创立了秘共，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秘鲁条件上的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努力发动武装斗争，并摆脱了当时秘鲁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趋势。

这是一场英勇的革命努力，当时的秘共是一个存在一些重要但次要的困惑和缺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或组织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存在这样的困惑和缺陷并不惊奇，也并不独特。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查鲁·马宗达领导了与修正主义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决裂的努力，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引发了1967年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印度成千上万个村庄的起义。查鲁和他的战友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但也有一些关键的困惑。在他著名的《八大文件》中，查鲁提出了许多错误路线，包括反对群众组织的必要性，提出“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的口号，并认为“未曾以自己的手染红阶级敌人的血的人，是不能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

每个政党都需要自己的主席，中国党的主席不能同时担任印度党的主席。同样，并非所有斗争都是暴力的，许多共产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革命暴力，尽管这种暴力是推翻统治阶级所必要的。同样，为了领导成功的革命，共产党必须创建和支持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由党领导，但它们是具有自己内部民主的独立组织。在印度，由这些错误路线带来的困难导致了运动中严重的挫折。然而，印度的同志能够总结这些错误，对它们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并制定新的前进方针。这使得纳萨尔运动能够坚持革命道路，克服这些挫折，并最终在2004年组建了印共毛。

革命组织因两条路线斗争而分化，因此除了纠正错误的可能性之外，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也有可能围绕负面的思想和结论而固化。不幸的是，在秘鲁，秘共无法总结他们的错误，甚至也无法认识到其中许多都是错误。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固化了许多不正确的立场。至少在1988年，这些错误思想已经在该党中占了主导地位；它们被综合在秘共的《政治总路线》中，并被明确提倡为贡萨罗思想。这无疑导致了该党遭受挫折，包括1992年贡萨罗和大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捕，以及在接下来几年中革命运动遭受的失败。

当代贡派团体，特别是巴共红和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中的许多盟友政党，将贡萨罗主义宣传为毛主义。因此，有必要具体处理秘共本身最终推行的政策，详细揭露他们在《政治总路线》中提出的观点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教训和结论存在的根本修正，这些修正与林彪的许多观点一致，属于显著的“左”倾路线偏差。这些观点包括一种与民主集中制格格不入的命令主义

领导方式（尽管秘共声称坚持民主集中制）；一种围绕贡萨罗个人保证革命胜利并将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宗教式先验主义；提倡一种符合托洛茨基幻想的将社会军事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等等。同时，否认秘共的成功或他们对国际共运的贡献也是不正确的。然而，需要进行冷静分析，以适当总结贡萨罗思想及其与马列毛主义的差异，特别是在贡派政党和组织声称只有坚持他们对毛主义的歪曲解释才能避免修正主义的背景下。

在本文中，我们将逐一审视秘共在其《政治总路线》中提出的一些修正主义和“左”倾偏差观点，并与马列毛主义的教训进行对比。我们还概括秘共犯下的各种错误示例，并对这些错误如何与贡萨罗思想的一些核心修正主义教条有关的进行分析。我们从简要概述秘共对秘鲁阶级分析的一些缺陷开始，特别是他们对农民阶级各种矛盾阶级力量的有限分析及其相关的左倾立场。这些缺陷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失败。

从那里，我们将深入探讨更多贡萨罗主义的核心理论教条，从“同心圆”党的建设方式开始。我们将其与中国和俄国所采取的方式进行对比，解释贡萨罗主义观点如何与唯心主义的“首脑制”政策以及所谓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联系在一起，并说明这些观点如何导致秘共遭遇挫折。特别是，我们将展示他们关于绝对领导权的表述如何反映出一种唯心主义幻想，认为由于领导的正确性，可以消除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我们还将解释这种唯心主义如何把中间力量推向反动的怀抱。在这一部分，我们还讨论了秘共推行的各种先验主义，包括荒谬的声称贡萨罗不仅能保证秘鲁革命的胜利，还能带领他们一直走向共产主义。我们注意到这样夸夸其谈的宣言与林彪反动的“天才论”以及杜林的唯心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

接着我们分析秘共在其《政治总路线》中提供的解释为什么所有共产党必须实现军事化（以及他们对党的军事化的确切含义）的三大理由，这些理由揭示了秘共对暴力作为永恒主线的深刻迷恋，这种情绪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者中很常见，但与马列毛主义格格不入。我们将详细阐明，他们强调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现军事化的观点（据称这是防止反革命的唯一途径）是基于一个荒谬的想法，即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化行动”，以及相关的幻想，即暴力是消除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剥削的关键。我们将其与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采取的方法进行对比。我们还注意到贡萨罗主义关于“世界人民战争”的幻想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相似处。秘共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止于此。我们还将证明，他们将社会主义视为军事化社会以及他们提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观点，基本上是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俄国内战结束时所主张的立场的复刻，而这些立场遭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强烈反对。

秘共和贡萨罗在1988年的《政治总路线》中宣称的关于毛主义的总结，其核心反映了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实践和教训相当缺乏历史知识。这与当年中国革命和当代领先的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清晰认识相比，这是巨大的倒退。时至今日，贡萨罗主义意识形态仍对国际共运产生着负面影响，现在贡派正竭力宣称自己是毛主义的旗手，并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即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因此，是时候让真正的毛主义力量与这种畸形意识形态作斗争，以揭露他们许多立场中所蕴含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本质。

对秘共阶级分析及其低估敌人的简评

秘共的《政治总路线》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该文件一方面声称捍卫毛主义，一方面对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批评，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毛主义作品。相反，它将各种林彪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综合为“左”倾错误。这一点可能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文件对秘鲁社会阶级的简化分析上。尽管对秘鲁社会阶级性质做出了一些基本和正确的结论（例如它是半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的），但这与全面的阶级分析并不相同。

秘共对秘鲁社会的基本理解的局限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即他们没有区分农民阶级内部除了贫农、中农和富农之外的不同阶层。事实上，在《政治总路线》中，中农只被提到了两次，农业工人则完全没有被提到，这些局限性是该文件整体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理解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和农民内部不同阶层（包括这些差异在不同地区的变化）的各种层次的分化，对于发展正确的政治路线至关重要。秘共在这方面完全失败了。

总体来说，秘共的阶级分析等于对农村和秘鲁社会整体的基本阶级现实的无知。为了发展正确的路线，一个党必须对国内的基本阶级动态进行客观分析。这不仅仅需要简单地注意各个阶类的存在。相反，该党必须擅于对复杂而矛盾的阶级力量及其区域变化进行详细分析。在实践中，秘共简化的阶级分析导致了种种困难，例如由于他们对贫农的极“左”侧重，使其未能赢得中农持续支持革命。这并不是说贫农不是革命的一个关键力量，而是说如何团结他们和其他进步阶级是发展正确路线和为革命描绘前进方向的关键。在其《政治总路线》中，秘共没有处理好这个任务。

毛主席在他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中指出，在苏联，对中农的性质和这一阶层内各种层化的理解存在许多困惑。他还指出了对中农过于简化理解所必然带来的问题：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之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些。历次运动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份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 50% 完全拥护公社，没有动摇；35% 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 15% 的队或者反对，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发生严重动摇和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队的领导权被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

毛主席的评论启示性极强，也有助于澄清秘共 1988 年政治路线综合中的一个明显弱点。没有对农民之间以及特别是中农内部各种矛盾的清晰阶级分析，就不可能维持农村领导权和继续革命发展方向。这种对秘鲁社会基本方面的困惑——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对毛泽东提倡的阶级分析基本方法的无知或不赞同造成的——明显导致了秘共在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在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最终挫折，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前进式地撤退”到城市。

在这一时期，在党的游击区和根据地的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中农，开始围绕地主、富农和国家资助的反对秘共的努力集结。“农民团练”，由军方资助、地主和富农领导的武装农民巡逻队，在全国农村滋生并与军队密切合作反对秘共。到 1990 年，团练已经在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万卡韦利卡和胡宁省的 3500 多个村庄建立，其中包括许多以前是秘共据点的地区。一部分农民会与国家和武装力量合作并不奇怪，也不一定表示党犯了错误。然而，团练在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的迅速泛滥——特别是在党组织多年的地区——表明秘共犯了严重错误。到 1990 年，这些省份的成千上万个村庄组建了团练，这使秘共在农村处于不利地位，并被迫从其原有据点撤退。

尽管统治阶级在一些农民团练的组建中使用了强制手段，但农民中也明显存在对团练的真正支持基础。秘共无法击败这种动员农民团练的运动，与印共毛成功击败国家资助的萨尔瓦犹太运动（Salwa Judum）形成对比，后者大量征召阿迪瓦西人作为特别警察。虽然一些无产者和游民分子确实乐于与准军事部队合作，但国家无法培养起大规模的群众基础来反对革命斗争，印共毛在几年时间内就能够击败萨尔瓦犹太运动。

秘共无法克服这场运动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从根本上误解了统治阶级在这一时期采用的基本策略，因此在战略上低估了反动力量。例如，贡萨罗和秘共反复称武装部队为“失败专家”，指出武装部队在 1983-1984 年进攻中无法粉碎革命。在这场统治阶级的进攻中，尽管犯了各种错误，但秘共仍能击退武装部队，并承受住他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镇压。在军队对群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和镇压的背景下，秘共能赢得许多中立力量。然而，他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认为武装部队和统治阶级更广泛地不会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调整其反革命进攻的策略和战术。

这些假设与党提倡的各种唯心主义形式有关，包括他们被“注定胜利”。例如，他们声称“难道我们的党没有教导过我们注定胜利吗？这是一个美好的断语。这在今天比昨天更有效，而在明天则会更有效。”这种认为反动力量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制定新的策略以击败人民战争的想法被编入秘共的《政治总路线》：“反动派梦想着制定比人民战争‘更优越的战略’，但这是违背历史，因此他们注定要失败。在接近八年的斗争之后，我们的人民战争闪耀着胜利的光芒，证明着人民战争是战无不胜的。”认为反动派无法打败人民战争，因为“这是违背历史”是对基本现实的唯心主义歪曲。20世纪各地的人民战争都被打败过。

认为抽象的历史力量保证给定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放弃唯物主义原则。这是对外部力量据称决定事件过程的唯心主义幻想。一个确定革命胜利的唯一事情是领导该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党内必须始终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使其保持在革命道路上，使其路线不会堕落为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甚至修正主义。这种唯心主义表述在秘共文件中很常见，至少到1988年它们已经不是一个次要趋势，而是秘共路线的基石。我们在本文件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分析了构成贡萨罗主义核心的一些从根本上说唯心主义的原则。

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反动武装力量在继续进行各种大规模屠杀和野蛮镇压的同时，改变了其反革命的总体策略。他们放弃了此前对群众的全面镇压和大规模强迫农民迁入集中营的政策，而是专注于在村庄层面培养农民团练和其他反革命力量，与富农、地主和其他当地反动分子密切合作。他们关注农民对秘共错误的各种不满，特别是各种“左”倾政策（包括切断农民与农村市场的联系，我们将在下面更多地讨论）其伤害中农的方式。这一策略使反动势力能够在富农的领导下团结中农，甚至一些贫农。因此，武装部队不仅注意到1983到1984年运动失败的一些原因，而且还理解秘共的一些错误和不足。特别是，他们意识到了秘共对秘鲁社会阶级分析的错误如何导致其疏远了许多农民。

秘共未能认识到军队策略的这一变化，并继续坚持军队正在实行“偷光、烧光、杀光”的政策。这个引语来自秘共对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入侵和占领中国期间最终采取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的引用。虽然这一政策与秘鲁武装部队在这一时期的政策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事实是军队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之截然不同。然而，秘共的唯心主义信条阻止他们对此进行总结，也未能意识到统治阶级正在侵蚀他们的群众基础的成功。例如，直到1990年，秘共还坚持军队仍在采取与过去相同的策略：

他们今天再次复活同样的卖国谎言，试图破坏人民战争，并掩盖他们对农民的强制核心化，在农村创建准军事部队，重复过去已经被奴隶群众自己的融合和游击队行动粉碎的陈旧模式。很明显，随着军队创建的准军事部队数量的增加，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的频率更高，他们的目的是重演1983年和1984年种族灭绝式的血腥屠杀。

这些及秘共的其他声明表明，在该党的评估中，农民团练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击溃，军队不久将被迫退回到采用更极端的公开镇压和大规模屠杀。只有在1991年，秘共才开始意识到统治阶级在动员农民反对革命方面取得的大范围、成规模的成功。

统治阶级能够在地主和富农的领导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反革命动员，这表明当时秘共正在犯下的错误的显著性和规模性。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已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中农，乃至贫农和农业工人都在地主和富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反对该党。这些错误包括大规模关闭农村市场和集市，这是秘共切断农村对城市供应商品的努力的一部分。该党希望这一政策将有助于加剧城市日益增长的危机，剥夺城市食物和其他必要的农产品，从而为夺取城市控制权和应对政府的反革命进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种做法反映了秘共对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和革命策略的深刻误解。农民高度依赖从城市流入的成品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经济需求。没有工具、衣服、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水平将会急剧下降。这就是在秘鲁许多村庄发生的情况，它严重破坏了该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秘共清楚地知道，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是革命斗争的核心，但在粉碎大地主半封建所有制和一些相关的成功将偷牛贼和其他流氓无产者绳之以法之外，他们在继续推进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方面较难取得进展。他们确实开展了某些集体化和合作化农业，但未

能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农村市场在允许农民出售农产品剩余和购买关键成品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禁止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也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疏远，这也是秘共即使在重大革命危机中也无法赢得这个阶级的任何重要成分支持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印共（毛）反对印度国家关闭他们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各种集市和市场的努力。正如该党前总书记贾纳帕蒂所指出的：

我们允许中小资产阶级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以防止他们变成反人民力量，并控制黑市交易、囤积和投机。我们只限制大资本、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外资。例如，1998-99年政府停止小贩卖卖林产品，当地商人（Khirjas）抗议，我们为他们进行了斗争，尽管我们制止了高利贷和无节制的剥削，但并未停止外来产品进入。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但我们对其进行控制。它对发展人民经济是必需的。如果商人不合作，我们怎么可能生存？在人民政府下，贸易和工业部门正在处理小商贩，以防止外部资本得利。

并且：

如果我们能完全正确地利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形势，哪怕目前只能在基本水平上制定和实施统筹需求、生产、消费、市场和资本的计划，我们就在经济领域实现飞跃。这种飞跃肯定会巩固人民政权。为了夺取地区权力和进行人民战争，经济领域的这些努力非常重要。在经济事务中政治动员人民，增强他们的参与和积极作用，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些评论有助于澄清毛主义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它们反映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理解。在那里，中共与蒋介石封锁他们根据地的经济的企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贾纳帕蒂的评论强调了人民战争中革命党在经济领域面临的复杂而相互关联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打碎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这些错误没有被正确分析和纠正，相反，该党却对此加倍下注。这条路线酝酿多年，但最终在秘鲁共产党1988年的《政治总路线》中得到体系化。正是秘共所提倡的这条及其他落后路线被当作对毛主义的总结和其在秘鲁的延伸和实践，被当代贡派称为贡萨罗思想。

秘共对农民极为有限的阶级分析并非孤例，而是其对秘鲁社会整体浅层次理解的典例。在《政治总路线》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中，尽管秘共活跃的许多地区存在大量贩毒分子，利马及其他城市周围也有大量贫民窟，但党对流氓无产者没有任何分析。尽管这些贫民窟中存在许多工人阶级成员，也存在大量底层和反社会成分，但该党没能在《政治总路线》中对这些力量进行任何分析。

同样，该文件中没有讨论秘鲁的各种原住民群体。20世纪60年代，秘共参考了马利亚特吉在20世纪20年代对“印第安问题”的分析，但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或考虑自那时以来的各种发展变化。在他们的《政治总路线》中，对这一问题的唯一提及是，人民战争“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摧毁地主官僚国家和维持它的骨干力量——反动军队”的方案。当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社会政治全面彻底的革命，是解决群众在现有秩序下面临的无数问题的唯一真正解决方案。然而，正如人们常说，魔鬼藏在细节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来处理各种矛盾（包括民族问题），就不可能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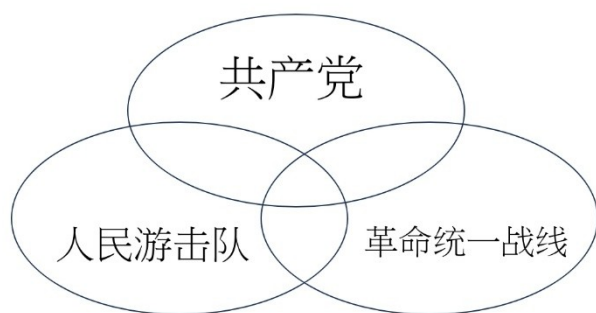
这只是秘共在其《政治总路线》中提出的有缺陷的阶级分析的几个进阶例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这些对秘鲁基本阶级现实的错误理解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后果，并促成了革命的失败。秘共在此文件中提出的阶级分析绝不是值得效仿的榜样；它只能作为反面教员。它终究是对毛主义阶级分析的教条式模仿。

令人头晕目眩的同心圆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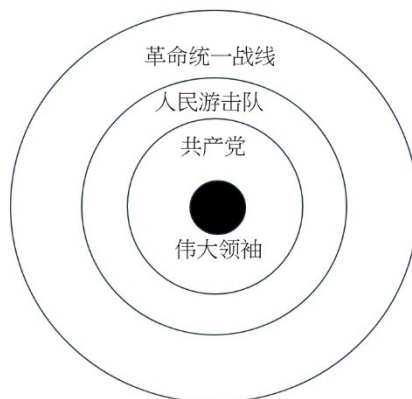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今天的贡派追随着秘共的脚步（在他们的视角中可能是在“改进”甚至“总结”贡萨罗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党和所谓需要使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的表述。鉴于巴共红和其他人坚持认为这些问题构成了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歧，所以这些形式化的

表述为考察贡萨罗思想的基本政治立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正如它在《政治总路线》中被系统化的那样，以及它与毛主义有何不同。他们的论断背后的逻辑是相当循环论证的。但首先，我们将围绕这些同心圆，看看这种政治方法实际上毫无进展。

同心圆是嵌套在一起的圆圈（与部分重叠的韦恩图不同）。在秘共看来，这就是模型：“伟大领导”亦称“首领”位于一切的中心。然后党是中心圆环；围绕它的是军队（党的每个成员也都是军队的一部分），然后是统一战线。巴共红在其文件《列宁和军事化共产党》中提供了对比的图像，这些图像很具说明意义。应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这一定是修正主义的！）和左图一致，布尔什维克亦是如此。



非军事化共产党及非同圆心建设



军事化共产党及同心圆建设

贡萨罗主义党的建设方法所固有的基本思想是，党对一切都要有“绝对领导”。这种绝对领导权通过让每一党员都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和一个（未阐明的）“伟大领导”来确保。下面，我们将检验这个“首领”概念的具体内涵。我们将首先解释为何认为党可以对统一战线进行绝对领导纯属主观幻想，其次，解释为什么这是小资产阶级盲动性所产生的修正主义幻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秘鲁无产阶级政权的破灭。

在进入这些具体要点之前，有一点很重要（这对于熟悉毛主义和中国革命史的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很明显），即认为军事化共产党与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构成的“同心圆”的概念，与毛提倡的基本策略不一致，也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实践不一致。这至少应该使贡派在宣称自己是毛主义者时稍作停顿，但是这些和其他的矛盾却被各种形式的辩解、逻辑飞跃、文字游戏和仪式般的咒语所驳回。毕竟，根据我们的贡萨罗主义者所说，毛主席没有“总结毛主义”，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握所谓无产阶级“军事战略”（又称人民战争）的普世性，也没有把握“毛主义”建党方式……我们需要等待贡萨罗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如果这些思维体操让读者头晕目眩的话，那我们必须道歉。为了理解巴共红和其他贡派提出的基本政治立场，我们将不得不深入他们循环论证逻辑的迷宫，这是一个可能造成头晕的任务，但却对揭露他们那些基本观点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必要的。

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毛主义者，就必须放弃马克思、列宁和毛所倡导的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当然，不同国家的特点需要战术和策略相应地有所调整，但是根据具体条件调整战术和策略，与在基本组织问题和原则的采取根本上不同的路径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政党的问题上。所有这些也涉及党的纪律问题、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等等。正如我们所见，主张通过围绕一个所谓的“伟大领导”建党，并使该党对统一战线拥有绝对领导权的贡派正在推广一种个人独裁形式，这与马列毛主义

的核心，即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等同于主张放弃马克思、列宁和毛在阶级斗争中好不容易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这正是关于贡派争论的真正焦点，即“何为毛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贡派的主张是如此不切实际和荒谬，所以有必要重申，根据他们的政党和组织的说法，毛主义在党的组织问题（和基本上其他一切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不是由毛主席概括总结的那些原则，而是实际上由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总结出的那些完全不同的原则所构成。（其中许多与毛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直接相矛盾）

绝对领导、唯心主义和阶级矛盾

如上所述，“同心圆”理论和秘共坚持认为的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第一期《赤文》杂志中，我们批判了这种巴共红和其他组织在五·一声明中提出的贡派观点。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全国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所有和革命利益相关的各阶级的广泛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可能推行绝对领导。也不可能用军事纪律来组织统一战线。相反，党必须与各种阶级力量斗争，在统一战线内推动无产阶级的领导。

正因如此，列宁在阐述统一战线时写道：“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在那时，列宁是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联盟，这些人实际上是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特定的统一战线努力推动了普及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对揭露民粹派（俄国一个小资产阶级“左”倾冒险主义势力）至关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帮助人民群众清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在这一临时联盟期间，布党并没有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因此，随着形势的变化，沙皇审查机构开始禁止马克思主义文献，“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更为妥协的态度。这一临时联盟被解散了。根据列宁对俄国形势的分析，他和其他人意识到，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暂时联盟在当时对党的工作是可能的和有利的。然而，如果他们试图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施加党的绝对领导权，这样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建立！这一统一战线是一个斗争前线，在这个前线上，党必须斗争以确保革命政治掌控局势，当情况不再如此时，他们就终止了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盟。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例子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建立，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分化国民党阵营，包括说服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帮助他们绑架蒋介石。即便在这之后，中共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来维持统一战线，包括重命名红军并在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在1941年皖南事件中，国民党军队仍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攻击了共产党。尽管遭到这次攻击和国民党的其他挑衅，中国共产党仍能维持统一战线，从而避免了同时与国民党和日本作战。如果他们抱有党需要对统一战线进行“绝对领导”的幻想，那么这根本不可能做到。

然而，五一声明的作者及广大贡萨罗思想的追随者难以领会这个基本经验。相反，基于对领导的简单理解，特别是对个人领袖作用的夸大，他们提倡源于个人领袖所谓的绝对正确性，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的修正主义观念。这终将导致党放弃搜集和总结群众正确思想的必要性。

秘共在主张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时，不仅与毛主义的经验教训相矛盾，而且对群众组织推行了一种命令主义的方式，群众的角色主要是“听候”所谓正确领导，这同时也揭示了他们深刻依赖对阶级矛盾的唯心主义理解。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党能消除统一战线内的阶级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阶级力量的对抗），更不用说军队内乃至党内了。这些阶级矛盾不到共产主义是绝不会消失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任何办法都无法消除这一我们生活的阶级社会所导致的基本客观实际。毛主义的一个基本经验教训是，即使在革命胜利之

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将继续存在，并在社会中发挥强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并继续走向共产主义，各党必须分析它们并制定路线来解决它们。“绝对”领导的幻想否定了阶级社会的唯物主义分析，用一种魔幻思维取而代之，表达了一个根本的信条，即阶级矛盾可以立即消除。不幸的是，到《政治总路线》出版之时，秘鲁共产党已经在这些话题上巩固了其唯心主义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作为他们实践努力的核心。

在实践中，党的“同心圆”建设方式及相关的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的唯心主义幻想，导致秘鲁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特别是“左”倾命令主义倾向。在早期，尽管秘鲁共产党的路线存在各种缺陷，但该党还是取得了将广大民众反对政府新的镇压措施的斗争统一起来的一些重大成就。例如，1981年人民战争刚刚开启后不久，费尔南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反恐法”，即046号法令，赋予政府广泛权力以镇压人民斗争，包括可以将宣传“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和记者监禁长达5年。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工会领袖、天主教神父，甚至修正主义政党都反对这项法律，担心它标志着1980年正式结束的军事独裁的回归。秘鲁共产党没有创造这种广泛的民众反抗斗争运动，但它能够参与反对这项法律的运动，帮助争取一些政治犯的自由，并为武装斗争赢取支持（当时武装斗争仍处于较低水平）。他们因其努力而被回报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议会左翼政党和进步知识分子都认为，秘共对电站、电塔等基础设施的袭击实际上是右翼准军事部队进行的“假旗行动”，以为新的镇压法律辩护。因此，虽然共产党能够利用这种相对有利的形势，但这主要不是由于人民对他们的破坏行动的支持。

秘共早期统一战线工作成果的一个例子可以看1981年5月26日库斯科省被警察抓捕的党员埃德蒙多·考克斯·伯泽维尔（Edmundo Cox Beuzeville）的运动。在遭受严重酷刑后，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并透露了炸药藏匿点的位置。他认罪的视频被泄露给媒体，在利马的电视上播出；他的外表明显显示出他遭受了极端酷刑。这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抗议，甚至连天主教会社会行动主教委员会都发表声明为他辩护，要求政府“保证被拘留者的身心完整”。由于这些努力，考克斯最终被释放，他后来在党的城市委员会中发挥重要作用，领导了利马的活动。

在这个时期，全国各地被逮捕的秘共干部和支持者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以争取自由。1981年4月，普诺省有3人被控属于共产党和炸毁电视发射塔。各种宗教领袖（许多信奉解放神学）以及工会和议会左翼（在那里领导农民组织，最近赢得该省长选举）动员争取释放被囚禁者，并使三者中两人获得自由。

这些早期与其他组织开展广泛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显示了当时秘鲁共产党具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他们能够抓住机会释放干部，参与反对新的镇压法律的民众反抗运动，等等。但是到1988年，秘共已经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党必须对统一战线拥有绝对领导权，并且明确将统一战线与新政权的建设等同起来。事实上，在《政治总路线》第五节“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中，统一战线不再被提及为这些工具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国家，这显示秘共如何将两者等同起来。

秘共将统一战线简化为其在根据地建立的新国家的观点，与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是直接矛盾的。例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战术性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日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在需要抵抗日本侵略者方面具有战术统一，但在中国未来的战略方向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着非常不同的目标。尽管共产党正在农村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他们却并没有将统一战线局限于这些努力。在打败日本法西斯后，确实有必要同国民党展开内战，延续土地革命。然而在这一时期，他们能够部分因为之前的战术性统一战线，建立和领导一个全国性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策略的统一战线。

这种精密巧妙的统一战线方法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唯物分析，以及理解联合各种不可靠和不稳定的盟友的必要性。这不仅包括国民党，还包括一众不同力量，如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爱国地主。即使这些力量不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也不属于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新政权的一部分，党仍愿意与他们合作。这与秘共的做法是直接矛盾的。如果

中共主张统一战线可以简化为“新的国家”，他们与国民党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术联盟就不可能实现。相反，他们将被迫同时对抗这两股反动力量，这将危及革命的胜利。

为更好地理解毛主义的统一战线方法，参考贾纳帕蒂的相关评论会有所帮助：

为达成最广泛的团结，我们不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采取教条主义作风。目前，许多力量站在敌人的对立面。我们必须让他们也得以发展。在统一战线中的某些问题上，也会有压迫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这还离得远。现在我们需要坚定地坚持我们的战略目标，为此在战术上我们需要保持灵活。

更明确地说，有两种不同的统一战线。一种是人民之间的，另一种是人民与敌人（来自敌人阶级的某部分/团体/个人）之间的，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党必须这样做。在某些问题上，这种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我们称之为革命的间接后备力量，可以谨慎利用。如果我们清楚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阶级盟友，则不会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我们需要这种统一战线来确保革命的成功。印度左翼，如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多流于资产阶级思想并堕落腐化。

最后一个方面是，每个阶级都有其独特的阶级利益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战线也是一条斗争战线。但总的来说，如果斗争是针对主要敌人的，那么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就变成次要的，而团结则成为首要的。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平衡这种斗争与团结，并有效利用它们。敌对阶级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应该同时继续。为此，专注于进行群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争取那些部分站到我们这一边，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些政党下也有在腐朽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如果我们能通过政治思想斗争赢得人民，我们就能赢得他们广大基层群众。革命的突破与这个过程密切相关。中国党和尼泊尔党通过同样的做法获得了飞跃发展。干部力量和军队都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式扩大。如果能谨慎处理统一战线与政治思想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将成功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并孤立主要敌人。

早期，秘鲁共产党采取了与此相当类似的办法；然而，到了1988年，他们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变得狭隘和教条，这反映出他们对绝对领导的幻想。几个实际例子可以帮助澄清这一点。

秘共1987年在普诺这个六年前它曾成功推进反新镇压法统一战线的地方开始了对该地区的许多议会左翼领导人进行“选择性消灭”（暗杀），甚至还暗杀了许多农民和教师工会领导人。例如，1987年4月，他们进入圣胡安德萨利纳斯市（the town of San Juan de Salinas），抓捕了议会左翼市长海尔萨亚（Zenobio Hiasaya），并对他进行了审判。尽管民众反对杀害他，但秘共仍以他是人民公敌为理由处决了他，只因他当选了反动国家的官员。这是秘共通过暗杀各种市长和当选官员来制造“权力真空”的策略的一部分；为证明这些袭击是正当的，他们辩称“打击或斩首任何级别的国家当局或官僚都会阻碍国家的运转，甚至更能产生权力真空。”为正当化对海尔萨亚和其他议会左翼成员的暗杀，秘共辩称，“虽然他们有农民的外表和样子，但他们为剥削者服务，背叛自己的阶级；他们在殖民时代这样做，如今在共和国时代也这样做。”

海尔萨亚隶属于一个小资产阶级伪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马利亚特吉党（PUM）；然而，就在几年前，他还同情秘共，并参与了许多运动以支持释放被捕的干部和支持者。对瓦尔萨亚和其他人的暗杀，以及对PUM改良主义农业计划的袭击，在普诺和全国各地引发了民众对秘共的广泛愤怒。当秘共炸毁PUM和教会在普诺为农民组织开会用的各种建筑时，这种愤怒加剧了。许多以前同情革命的群众都对此感到愤怒。

在普诺，P并非一个边缘性组织。在它们以前的名字先锋革命党（VR）下，它们是秘鲁农民联合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在七十年代在普诺等地领导没收土地的农民组织，到1978年已有大约25万名成员。它们还在军UM事独裁政权下以及之后领导了全省性的大规模罢工。PUM也是普诺农民联合会（FDCP）的领导力量之一，后者领导了对国家资助的半封建

“合作社”农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半资本主义路线重新组织旧封建地主财产）34万公顷土地的大规模没收。它们在该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倾向解放神学的牧师和主教中享有广泛支持。

事实上，PUM整体上有些同情秘共。1984年，他们作为一个新的政党组建，并认为在建立一系列群众组织后有必要“发动战争”；他们拒绝了其他议会左翼政党放弃武装斗争需求的做法。总体上，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倾向，不是议会迷。也就是说，鉴于PUM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无法为群众赢得持久的胜利，因为他们的努力不断因对国家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幻想而搁浅，然而，他们在该地区的农民、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想要快速改变这一点并向群众揭示PUM政治方向的局限性并不容易。

而且，鉴于PUM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尖锐冲突，秘共可能与他们进行战术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中央政府不履行向农民分配土地的承诺。反过来，这可能有助于赢得PUM继续反对向普诺派遣军队对付秘共。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中，秘共将能够与PUM争夺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或者，如果这不可行，秘共至少可以利用PUM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无论哪种方式，正如上述引文中贾纳帕提所指出的，有必要赢得那些追随各种腐败机会主义政党落后领导的群众。

然而，在无法迅速从PUM（尽管PUM有许多局限性和落后的政策）手中夺取农民斗争的领导权后，秘共开始选择性地消灭PUM政治人物和领导人，以及与PUM站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这种做法不仅切断了与PUM进行任何统一战线的可能，而且将秘共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尤其是普诺的农民。这反映了极端的盲动性，试图跳过争取群众在实践中认识PUM和其他修正主义政党局限性的必要斗争。简而言之，秘共对统一战线的狭隘理解和对绝对领导权的幻想导致他们组织工作的破灭，将PUM推向中央政府，并与广大农民和进步小资产阶级疏远。

通过考察当时PUM的内部矛盾，可以进一步阐明秘共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极其落后的做法。当时PUM分为两个主要派别，libios和zorros。前者代表该多数派，相当同情秘共，并认为PUM应在短期内发动武装斗争。后者更为保守，认为秘共是“反动力量”。在1988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libios在该党内赢得多数，zorros分裂离开，PUM开始准备发动自己的武装斗争，他们将在1989年和1990年先后两次失败地试图发动。但是到1991年，秘共继续暗杀PUM成员和各种相关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导致该党再次分裂，这次是在那些只想依靠团练对抗秘共和那些也想与军队合作的人之间的分裂。到那时，PUM已经坚定了强烈反对秘共的立场，问题只于是如何最有效的这么做。

这段叙述的重点不是说PUM是一个彻底革命的力量，他们显然并非如此。但他们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该党内右翼和左翼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左翼相当同情秘共。如果秘共没有采取如此狭隘教条的统一战线方式，它本可以赢得PUM重要派别对人民战争的支持，并像布尔什维克从社会革命党手中夺取各种群众斗争的领导权一样。然而，贡萨罗曾宣称PUM是“革命之敌人”，而没有区分该组织内部不同矛盾倾向。

为进一步阐明秘共采取的极其落后的做法，将其与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之后所采取的那些揭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局限性的政策进行对比将有所帮助。1917年6月，当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只是相对少数：1090名代表中只有105名是布尔什维克。但到了10月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布党已经成为多数。他们没有通过暗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或与这些其他政党站在一起的代议员和苏维埃代表（通常是工会和农民领导人）来实现这一点。相反，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委员会、士兵中和农民中不知疲倦的进行组织工作，以揭露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特别是它们愿意让俄罗斯重新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意愿。因此，尽管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没有进行任何“选择性的消灭”那些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能够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使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从其政党中分裂出来，并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赢得他们的支持。

相比之下，秘共的行动导致他们迅速与广大群众隔离。在农民中，支持组建团练驱逐秘共的呼声越来越高，PUM和教会中的各种自由主义力量也是如此。到1992年藤森政变时，普诺的议会左翼对秘共已如此敌视，以至于甚至没有发表反对政变的声明。一方面，这显示了当时这些议会力量的政治破产和软弱。然而，它也表明秘共要求绝对领导统一战线的路线把动摇的力量推向了反动一方。最终，秘共无法利用不同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派别以及议会政党之间的基本矛盾，并利用这些矛盾建立不同的统一战线。

首脑制，形而上学的保证和唯心主义先验论

在秘鲁，这些关于“绝对领导权”的唯心主义幻想与极端落后的观念纠缠在一起，比如贡萨罗是“保证革命胜利的人，他将带领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党员向贡萨罗宣誓忠诚，以及中央委员会“有意识地、无条件地服从贡萨罗的唯一领导”等等。

这些表述不仅超越了简化的阶级分析和唯心主义幻想，甚至墮落到了宗教思维的田地。不幸的是，这种思维是“首脑制”和党的“同心圆”建设方式的核心。

认为贡萨罗的“首脑制”是胜利的保证，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该党用它取代了革命马克思主义。1988年，在党的《政治总路线》中确立这些先验论，表明该党已经固化了修正主义思想。没有任何人的领导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如此断言类似于杜林的自吹。他宣称他的个人天才摆脱了任何“主观有限的世界观”，并宣称已经发现了“终极至理”。这种相似性在秘共声称贡萨罗不仅保证革命胜利，而且还将“带领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救世主式言论中得以进一步体现。这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用一种深刻的宗教式唯心主义替代它，使人民大众丧失斗志。

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条路线的错误，但即使在贡萨罗被捕之前，那些断言就已经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了。推行这种表述加速了各种非无产阶级阶级倾向在党内和革命运动中的增长，特别是资产阶级命令主义。这些问题在1992年贡萨罗被捕，革命进入急剧退缩，并在2000年左右基本上被击败之后彻底暴露。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强调了社会实践在验证知识正确性中的核心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秘鲁共产党关于贡萨罗“保证胜利”的口号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使在秘鲁遭遇挫折之前，这样声称个人能“保证胜利”秘共本该意识到声称个人可以保证胜利是相当落后的。这样的说法不仅是极端个人主义，也散发着形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对“保证”正确性或胜利的渴望的恶臭。它们也极大地抑制了党内路线斗争。这样的口号与马列毛主义背道而驰，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借助形而上学的力量，宗教式地宣称领袖“保证胜利”，而是依靠对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关系的清晰理解。这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中有详细阐述：

加强集体领导是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前提，是巩固党的集中领导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是行使集中领导的领导机关，但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专断的领导。只有自觉地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才能在党内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各级党委才能充分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完成一切任务。一般说，个人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是有限的，重大问题由个人单独作决定，主观片面性比较大。只有实行集体领导，党委成员能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各

个方面，问题能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讨论，才能集思广益，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定，减少或避免错误的危险。这就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秘鲁共产党内关于贡萨罗个人“保证胜利”的看法，破坏了该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他们队伍中助长了主观主义，抑制了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运作。如果一个领袖被宣称为绝对正确，并视其个人不仅能保证革命胜利，还能保证所有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这种情况下党内还能存在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呢？这种观点是纯粹的唯心主义。

每个人都有主观的局限性；我们都是正确与错误思想的混合。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嘲笑杜林声称他的哲学摆脱了“任何‘主观有限的世界观’”。但是，在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身上，我们发现他们抛弃了恩格斯，拥抱了杜林。诚然，这种先验主义伪装于新的外衣，修饰于新的词藻之下，但其唯心主义本质与可怜的杜林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它对无产阶级事业毫无价值。

秘鲁共产党所推崇的对贡萨罗个人的这种宗教式的忠诚极大地损害了斗争。在贡萨罗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加剧了这种崇拜倾向，声称“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申自己对贡萨罗主席唯一领导明确地、自觉地和无条件地服从，以及对全党领导系统的服从。”没有任何党员应该对任何人作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任何机关也不应如此。是否遵循任何个人和党的领导都应该有条件的，即其是否在既定问题上和总体上推进了无产阶级路线。如果一个党内关键领导人确实采取了非无产阶级路线，那么就必须与之斗争！如果整个党采取了这样的路线，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党的路线。

假如秘共仍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话，那么持少数意见的人即使在党保持行动统一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党内进行斗争。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实践，可以厘清某一做法是否正确。同样，如果一个关键的党领导人犯了一些关键但次要的错误（这并不罕见），那么也可以在团结-斗争-团结的精神下进行斗争。如果贡萨罗“保证”了党的胜利，那么党的任何成员如何（又为何）反对他提出的任何主张呢？根据这种观点，这样做就等于反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保证，可能也就等于反对革命本身。

与这种观点形成对比，参考毛泽东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看法会有帮助：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

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与秘共崇尚贡萨罗个人领导这一唯心主义幻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强调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他经常在自己是少数派的情况下，默认多数派的意见，并将这一情况与一些党委的情况进行对比，而在那些党委中，“第一书记说了算”。他描述后一种情况为“这是很错误的”，并指出“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然而，这最终成为了秘共在其《政治总路线》中所确立的观点。通过推崇关于贡萨罗的这些唯心主义幻想，秘共最终实行了一种个人独裁，类似于林彪的“天才论”，而非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的自我评价和秘共的林彪主义

秘共对贡萨罗的夸大宣称也得到了贡萨罗本人的认可和推广，这应当与毛泽东对自己优缺点进行谦逊和辩证的分析形成鲜明对比。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他在1966年7月文革开始时给江青的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许多触动人心的评论，包括阐明了他对林彪推广关于毛的理想主义观点的担忧。虽然引用如此长的引文有些累赘，但有必要全面引用这份文件：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966)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

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

毛泽东对 1966 年的政治形势进行的深刻分析及其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尤其相关的是他如何反对林彪推行的对他个人的宗教式膜拜。在文革初期，与林彪合作是必要的，以打倒刘邓集团并确保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文革，但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有着深刻的保留意见。毛泽东担心林彪通过推行对他个人的崇拜运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这种担心也应验了，林彪后来发动政变）。毛泽东也担心这种个人崇拜对党和群众的影响。与毛泽东对林彪的顾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毫无顾忌地采用了林彪主义的做法。

例如，他们反复宣传贡萨罗是“当今世界上在世的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这不仅是贡萨罗被捕后他们才使用的词语，而是早在 1988 年的《政治总路线》中就已确立。在 1991 年的《关于“两座大山”》文件中，他们更是公然将党的一切成就归因于贡萨罗个人。这里不再有创造历史的群众，取而代之的是“领袖”，这实际上就是另一种“英雄”史观：

“是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其提高到你们无法想象的高度，对当今世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是谁确立了社会、国家、党、革命、人民战争、军队和新政权的所有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贡萨罗主席完成的，他是当今世界上在世的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谁能证伪吗？”

这是林彪主义，而绝非毛主义。毛主席本人反复反对林彪和其他人推行这样的个人崇拜。秘鲁共产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林彪在文革初推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秘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不仅源于对这一时期历史知识的缺乏，也反映了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领导观。

在文革初期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和左派不得不较少公开批评林彪荒谬的表述，以免浇熄正在兴起的群众热情。然而，在打倒刘邓集团之后，就可以有对林彪推行的个人崇拜及相关的对毛泽东形象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狂热膜拜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尽管林彪是为了自己而推广这些做法，这些做法的广泛采用也与中国社会中仍存在的各种落后倾向有关，包括儒家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显著残余。正如毛泽东 1971 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人们很难……克服 3000 年帝王崇拜传统的习惯。”对人们内心的这些观念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克服“四个一切”。这就是林彪发动政变失败后，毛泽东和左派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原因。

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不仅未汲取中国这场斗争的重要教训，反而推广了许多当时遭到批判的同样做法！一个党犯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个党将这些错误确立为其实践的基石，并坚称它们具有普遍价值，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而现在的贡派荒谬地坚称，只有坚持林彪式的表述才能避免修正主义。按照巴共等等的说法，今天要成为毛主义者，就必须遵循林彪的做法（而忽略毛泽东）！什么样荒谬的婴儿病糊涂观点。

中国一个毛派组织最近出版了一份优秀的文件——《共和国历程：革命与复辟的历史与逻辑》，其中提供了关于毛泽东对“他是当时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表述的看法一些重要洞见。

1970 年 4 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 100 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了：“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文革开始前，毛泽东“违心”的接受了林彪搞个人崇拜，为的是能够不打击革命群众的热情，现在个人崇拜也该退潮了。很多人说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

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在纠正个人崇拜的问题。个人崇拜其实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变革，让人们觉得毛泽东很伟大，但是小资产阶级性使得这种伟大被神化了；而另一方面，就来自林彪对革命群众的误导。

毛泽东明确反对给他贴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标签，而秘鲁共产党官方文件正是如此描述贡萨罗的。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说法“无用且引起别人反感”，但秘鲁共产党却推广这些说法。他们可能是依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其他重复这种口号的文章。但是他们并没有理解（或不愿意理解）这些表述是由林彪及其党羽推动的。他们显然仍然对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经验教训一无所知，特别是对“批林批孔”运动一无所知。尽管1976年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存有巨大困惑，因此各国党内对这方面存在各种误解并不罕见，但秘鲁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严重混乱和深刻依赖的林彪主义政策远远超出了一般误解的范畴，这揭示出了他们的道路上的严重偏差。

军事化的“新综合”？

在秘共的《政治总路线》中，他们概述了该党纲领的十二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七条是“党的军事化与革命三大法宝共同建设。”这绝非偶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在他们的路线中是密不可分的。秘鲁共产党概述的使党军事化的想法，不仅仅是指党必须准备进行战争和革命。它还具体指的是如何组织和建立党，即军事化组织。

这在《政治总路线》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并且符合对如何使一个组织军事化的基本理解。例如，他们指出，“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并且“我们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以便激励和发展阶级斗争，以身作则地教育，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他们同样指出：“党的群众工作是通过人民军队来完成的，群众被动员起来，政治化，形成组织，武装起来，成为农村的新力量，成为城市的保卫人民的革命运动（MRDP）的新力量。”

总之，秘共对党的军事化的理解明显超出了为革命和战争做准备的需要，而是要把党建成一个军事化的组织，这揭示了其路线上的严重偏差。对于这种“行动宣传”的革命方式，印共的党员干部注意到，实际上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所做的80%的工作都是非军事性质的，在此他们遵循了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脚步。这些包括人民解放游击军参与生产活动（例如帮助开垦荒地、收获森林产品等），以及动员群众、进行教育工作、向被反革命所迫置的群众分发物资等等。在他们访问丹迪卡冉亚期间，高塔姆·纳夫拉卡(Gautam Navlakha)和扬·米达尔(Jan Myrdal)被告知，没有这些活动，军事行动将失去很大的力量，也无法获得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时，同样指出：“虽然党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它反对代替群众做一切事情。事实上，它的具体做法是‘穷人家访贫，问计于民’，识别积极分子，扎根拉拢，巩固核心，传播民怨，并组织阶级队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的目的。”

这是秘鲁共产党没有吸取的教训；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反映了他们对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幼稚理解，并与他们始终痴迷于“军事化行动”的做法有关。秘鲁推行“党的军事化”的路线源于相关的混乱理论，并因此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混乱。在实践中，这不仅意味着过分强调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并低估非军事行动的作用，而且还用军事纪律取代了党的纪律。

毛主义政党必须有党的纪律，但这与革命军队的军事纪律有很大不同。尽管秘共声称在使党军事化的同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事实上，毛提倡的民主集中制与秘共所宣扬的有很大不同。两者使用相同的术语，但内涵非常不同，正如秘共推崇贡萨罗相关的唯心主义的“首脑制”思想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贡萨罗主义者的一个通用模式，他们使用各种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概念，但却对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对贡萨罗主义者来说，毛和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贡萨罗做出了毛主义的新的整合。

在其《政治总路线》中，秘共至少诚实地承认了，这种使党军事化的方法与俄国和中国的实践非常不同：

党的军事化有列宁和毛主席的先例，但这是贡萨罗主席考虑到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必须看到新问题的出现，并通过经验加以解决。这必然意味着新旧之间的斗争进程将进一步发展，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使人们获得能力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靠的是党的军事化。我们认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因此，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进行军事化。

根据秘共的说法，党的军事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这种所谓新的情况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他们“即将进入战争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军事化。”。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都在战争期间处理过革命斗争，而没有使党军事化。仅这一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在秘鲁或其他地方需要军事化（正如秘共公开承认的，这与列宁和毛主席主张的党的组织方法有所不同）。而秘共毫不犹豫地声称，不仅在他们自己的条件下，而且对于“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党的军事化都是“必须的”。

秘鲁共产党声称军事化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党的军事化使我们能够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这一说法值得质疑。军事化真的是发动人民战争的关键环节吗？还是当时党的在政治上的相对清晰和秘鲁非常有利的客观环境才是关键？即使认为军事化是关键环节，从此大跨步地得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以及相关的结论，即“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都必须进行军事化”，也颇为牵强。

这种分析和总结经验的方法并不科学。仅根据秘鲁的经验就断定党的军事化路线具有普遍意义并非问题所在，因为一个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具有普遍意义。但得出这一结论需要仔细考察和分析，以区分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在于，尽管事实明显与之相反，却断定党的军事化这一组织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发动人民战争的必要性，而不考虑布尔什维克（他们没有打过持久人民战争但领导了成功的革命）或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运用它。许多其他成功发动人民战争的党派，包括菲共、印共毛、越南共产党、土共/马列和尼泊尔党等等也没有运用它。

认为发动人民战争需要党的军事化，与基本事实证据也相违背；这类言论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脱离了具体实践，经验主义则把片面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显然，这两者都适用于秘鲁共产党1988年的文件和秘鲁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当今的言论。面对明显与之相反的实践证据，仍坚称军事化是发动人民战争的必要先决条件，这是教条主义的极致。同时，根据对秘共自己经验的片面评价，断言党的军事化、“同心圆”和人民战争战略都是普遍真理，也是极端的经验主义。这种基本方法中同时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偏差，与列宁的观点一致，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当代贡萨罗主义的拥护者将这一点发展到了更远的地步，并断言反对所谓党的军事化和“同心圆”的必要性是“新修正主义的实质”。事实上，拒绝奉行贡派荒谬方法的毛主义力量，并不是在修正马列毛主义，而是在反对所谓贡萨罗主义，后者本身就是对马列毛主义基本经验教训的修正。

在详细分析秘共为所谓的共产党必须进行军事化提供的另外三个主要理由之前，有必要分析上述引文段落中的另一个问题，即秘共声称“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使人们获得能力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并不是毛主义路线，尽管它看似是摘录了毛泽东的言论（给予秘共的教条主义以毛主义的外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写道“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里毛泽东并不是在说战争是

解决一切矛盾的最高形式（这一点即使对于一个小屁孩也是明了的），而是说这适用于某些特定的矛盾，且仅当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这非常基本，并且表明了秘共存在深层次的混乱。战争是否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最高形式？那么汽车没有油与开车上班需求之间的矛盾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又如何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文革中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形式。尽管那个时期发生了暴力事件，但通常是右派挑起的。相比之下，左派主张群众在与走资派进行斗争时“要文斗，不要武斗”。具体矛盾，具体解决。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教条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无法掌握这个基本点：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鉴于秘共认为“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的论点，很明显为什么他们主张党应以“军事化行动”为主——如果所有其他解决矛盾的手段都较低且不太有效，那么党就不应该在这些手段上花费时间。这是对革命斗争的一种非常狭隘和教条式的理解。在任何特定时刻，党将在不同情况下有一系列不同的主要任务。例如，在一个党委，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认真的学习来深化他们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掌握。在另一个村庄，可能因各种封建迷信的普遍存在而造成生产落后，所以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教育运动。等等。只要有了辩证法的初步掌握，这些都非常基础。然而，我们的贡萨罗主义者，以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的方式，试图为复杂的问题找到普适的“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盲动让人想起在中国革命中提出各种荒诞理论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对共产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势必要面对的种种复杂矛盾使用何种方法的思考的简单化。相反，他们声称“军事化行动”是关键环节，是防修的保证。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我们将在稍后的文件中返回这个话题。目前，应该足以说明，显然战争不是解决所有类型矛盾的最高形式。

“战争解决一切”的信念是修正主义团体典型的“灵丹妙药”式政治方法。它与小资产阶级对暴力和盲动的痴迷一致，后者没有耐心处理细节问题，而是寻求简化的公式和口号。不幸的是，这是贡萨罗主义中的一致思路；到1988年，它已经成为秘共实践的奠基石。这是贡萨罗主义的“新综合”，除一些正确的名称外，它与毛主义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确实与林彪主义极为神似。

主观幻想与占卜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现在来谈谈秘共解释和证明为什么所有共产党必须使自己军事化的要点。在《政治总路线》和其他著作中，秘共一再声称他们的军事化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其他政党因此必须效仿他们。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巴共红和其他贡派认为不同意其意见的政党都是修正主义的党。我们对秘共论点的基本分析表明，它基于对国际形势客观状况以及马列毛主义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无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错误估计。有困惑是一回事，但在这些错误结论的基础上构建政治路线势必导致机会主义，并最终导致修正主义。所有这些错误为那些像巴共红这样声称不坚持秘共总路线的政党是“新修正主义者”的人带来了严肃的问题。

在《秘鲁共产党政治总路线》中，秘共提供了使党军事化以及相关的“同心圆”建党方法的三个主要原因：1、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迫在眉睫；2、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军事问题；3、社会主义社会是军事化社会。我们将逐一梳理这些问题。

首先，他们说：

贡萨罗主席阐述了世界共产党应该军事化的观点，原因有三个：

第一，因为我们是在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中，我们生活在未来五十到一百年横扫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者的时代，这是一个以暴力为标志的各种战争发生的时期。我们看到反动派是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军事化，把旧政权和其经济军事化，开展侵略战争，屠杀人民的斗争，并致力于世界大战，但是由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趋势，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革命，发起以人民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世界革命战争，反对世界反革命战争。

这份文件并非秘共唯一一次提出此论点的地方，类似的表述在1980年贡萨罗《我们是发起者》的演讲中就已出现，并在整个秘共的历史中被反复提及。例如，在1985年，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的第三期杂志《赢得整个世界》中声明：“世界形势日益揭示出存在一个不平衡发展和巨变的形势”，以及“主要趋势是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这个最后的表述极为荒谬，因为尽管事实上革命是解决当今世界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但这也无法证明或指向革命是那时的主要趋势。

秘鲁共产党对所谓的战略进攻的幻想似乎源自毛主席1966年对世界形势的评估：那时革命是世界的主要趋势，中国国内外的革命发展形势一片大好。1966年时确实如此，但在1988年辩称存在“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则是纯粹的主观幻想。早在1971年，形势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是驱动中国“对西方开放”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为了争取一些喘息空间，以避免苏修帝国主义的侵略。1976年后，在中国的政变和国际上许多政党的投降之后，世界革命斗争发生了严重衰退。

到1988年，世界革命力量十分衰微。特别是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异常强大，根本不存在任何革命形势。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大规模革命高潮之后，大多数国家的形势已稳定下来，运动也已衰退。在大多数国家，和秘共所宣称的正好相反，情况绝不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

在秘鲁，革命力量相当强大，在尼泊尔革命运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土耳其，运动出现了分裂。在印度，后来在2004年合并为印共毛的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在菲律宾，菲共正在追求过早规范化其力量的政策，这导致了重大挫折。在美国，美国革命共产党已蜕变为一个修正主义政党，等等。我们在关于巴西贡派党和阿富汗毛主义党之间辩论的文件中讨论了这种“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的观点。在文件中，我们说到：

秘鲁共产党声称“在未来五十到一百年，帝国主义和所有剥削者的统治都将被扫除”，这基于他们的观点“历史无法后退”。这种历史以线性方式前进的机械概念导致他们得出结论，世界革命斗争正处于高潮，而客观上，1980年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低谷。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包括1976年中国的反革命政变，越南共产党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进一步巩固和依附，以及印度1972年挫折之后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薄弱。

简而言之，秘鲁共产党用自己的主观幻想代替了现实。他们没有进行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是死守着毛泽东的一句话，没有考虑到那是一个对具体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宗教启示录——并在不考虑更大的客观现实的情况下盲目地复读它。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教条主义表现为对全球无产阶级未来胜利日期的看似任意的预测。例如，他们“计算”“从1871年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首次掌权开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200年”。

当然，他们从未分享这种“计算”背后的数学。尽管有明显的证据与此论点相矛盾，但秘共重复提出这种预言，以此来为其关于世界革命“战略进攻”的观点辩护。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的。

抽象笼统的谈战略进攻

抛开秘共对全球形势分析的问题不谈，即使“战略进攻”的世界革命形势是真的，也不明确为何这会表明共产党军事化是必要的。因此秘共的论点即处于“战略进攻”状态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实行军事化等于没有正当理由和根据的断言。

秘共及其当代追随者们通常将人民战争三个阶段的具体概念化为抽象的概括然后将其应用于全球局势。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这场具体的战争来解释这三个阶段。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与将其应用于一场具体的战争是分不开的，而不能普遍评估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在革命战争中各阶级之间进行着武装斗争。尽管可以在一个模糊的类比意义上谈论世界局势，但这会造成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澄清声称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适用于全球局势是毫无理由的——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没全球性战争的时期！秘共坚持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全球局势的做法被当代的巴共红及其他贡派狂热模仿与他们对暴力的痴迷和把一切矛盾的最高解决方式归为战争的扁平分析有关。鉴于这些非无产阶级倾向他们注定会用军事来看待每种情形。

现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集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解决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即使一个国家的革命成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处于国际战争状态的同时与另一部分资产阶级集团保持和平，甚至战略性联盟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苏联在二战中与许多帝国主义力量站在统一战线。同样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与一个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同时另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可能与同一帝国主义势力达成战术协议，就像中国在越南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其国内反动盟友的时候，同时与美国达成协议。这种战术协议并没有阻止中国继续支持越南革命。所有这些都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等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概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际主义政策一致。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需要对概念保持严谨和科学。概念同时包含一般性和特殊性内容但它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坚持在这种细节上保持模糊作为政治实践的标志会导致各种混乱。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生物学进行类比；他提到新陈代谢和发酵等等。这些类比有益地澄清了许多概念。但马克思总是明确这些是类比。他从未试图根据这些类比来主张我们应该用生物学方法来理解政治经济学。

基于目前无产阶级力量相对于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很弱这一基本事实巴共红声称我们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防御阶段”！我们留给读者自己琢磨一下这个天才般的措辞到底可能是什么意思。

这种模糊混淆——将类比与概念混为一谈以及秘共相关的教条主义与他们在《政治总路线》中声称需要发展“世界革命战争”来反抗反动势力和阻止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发展的主张有关。这是秘共推广的“世界人民战争”的另一个版本，我们也在上面提到的关于阿富汗和巴西党之间辩论的文件中对此进行了批评。从这个类比跳跃到全球人民战争的概念是一个跳变。这不是一个毛主义立场而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它类似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他坚持认为在十月革命之后红军应该入侵德国“输出革命”。秘共的“世界人民战争”论否定了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下继续阶级斗争的头等重要地位，而把它替换为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取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托洛茨基的观点。如今巴共红（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托洛茨基和贡萨罗的脚步）声称各个人民战争将融合在一起并被“转化为世界人民战争”。秘共和巴共红的文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相信所有的复杂和不同的矛盾都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军事化社会”的观点以及相关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自说自话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托洛茨基主义。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秘共要把党军事化的第一个理由的最后一部分。他们指出：

我们看到反动派愈发军事化，军事化旧国家机器及其经济，发动侵略战争利用人民斗争，并以向世界大战发展为目标，**但由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趋势**（强调是我们加的）共产党的任务是维护革命塑造主要的斗争形式：人民战争以世界革命战争反对世界反革命战争。

然而反动势力增加军事支出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必须反过来使自己军事化。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在没有使自己军事化的情况下与庞大的反动军队作过斗争。中国共产党就与非常强大的势力作斗争（日本法西斯分子、国民党以及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军）。在一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众多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入侵。这两个党都没有军事化。他们没有军事化因为他们理解党必须指挥枪，而党成为一个军事组织将危及这一点，并削弱党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即用非军事手段）。统治阶级需要通过暴力被推翻；然而如果党转变为一个军事组织并使其主要活动形式成为“军事化行动”那么它将无法执行领导成功革命所必需的复杂和多方面的任务。

此外正如驻阿富汗美军最近的失败所显示帝国主义者大规模增加军事支出与他们的战斗水平不一定等同。事实上增加支出可能产生一种萧条状态，并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国家预算大量用于军事经常导致其他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即使反动势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与党的主要活动形式必须是“军事化行动”毫无关系。秘共因为反动势力增加军事支出，而需要军事化自己的观点建立在非常机械的观点之上，除了说明他们既不理解目前现实的矛盾性质也不理解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外什么都没说明。简而言之他们正在篡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训以证明党的军事化是正确的。

政治路线、社会主义下的暴力和秘共的“一刀切”方式

根据秘鲁共产党的说法，党的军事化不仅是在一切国家成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所必需的。他们还认为军事化的党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关键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化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再次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和基本原则。

那么根据秘共认为为何军事化的党在社会主义中至关重要？让我们现在来看下他们用于证明应该使共产党军事化的第二点理由：

其次，因为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资产阶级失去权力时，它会渗透进党内利用军队，并谋求夺取权力摧毁无产阶级专政以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共产党必须使自己军事化，全面行使三种工具的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增强群众的武装组织、人民民兵的力量以吸收军队。因此贡萨罗主席告诉我们必须“首先将所有战士培养成共产党员，首先成为战士其次成为管理者”；因此每一名党员都在人民战争中被锻造并保持警惕抵制任何资本主义复辟企图。

在此，秘共错误的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当作是反对渗入党内和军中的旧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文革教训的根本扭曲。这是对社会主义下基本阶级矛盾的根本错误理解。问题不是旧资产阶级“渗入党内”，而是新资产阶级在党内自己产生！秘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反映了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进行认真研究，相比他们六七十年代一些文件中对此问题的相对明晰，这是一个倒退。

事实上在《政治总路线》的全部内容中，秘共没有对文革的成功和错误提出任何真正的分析，只提出了进行更多军事行动和对资本主义复辟威胁有更高认识可以防止未来的复辟。虽然在文革末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存在一定的困惑，但华国锋和邓小平能够动员相当一部分群众反对“四人帮”将这场运动框定为“反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反动生活方式”，这表明当时中国人民总体上并非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相反许多群众在如何识别走资派方面存在困惑。

事实上，当时中国有数百万群众参与了人民民兵。然而由于对如何识别走资派存在困惑，许多人民民兵实际上被中立化了，而不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对资本主义复辟威胁缺乏认识。人民民兵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们是一种群众组织形式，而不是贡派所提倡的“军事化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建立在“无条件服从”领导上的方式，只能导致更集中的军事控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容易蜕变为反革命司令部的部分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认为通过使党军事化就能够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论点是荒谬的。秘鲁共产党没有对中国失败的具体原因进行过任何处理。决定文革中资产阶级路线获胜的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整体上的阶级斗争力量关系，以及党内左派在政治路线上的各种错误。直到1976年的政变前，文革都不是一场军事斗争。即便在那时左派也一直在努力准备应对这种政变并且拥有大量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并不是主要在军事上）犯下了关键错误——特别是在团结党内中间群体来反对右派方面遇到了困难，因此他们在文革末期变得脆弱和有些孤立。毛泽东意识到他们犯下的一些错误，并曾警告四人不要犯这些错误。我们在《赤文》第二期中谈到的最近翻译的文革末期的文件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讲解。

右派拥有军事优势，而这成为文革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根本不成立。问题的关键是左派没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防止右派发动政变，因此在决定性时刻右派掌控了更大的军事力量。重复一下，有必要重新强调左派在政变时的军事弱势是其政治路线问题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正如毛主席所说，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包括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一个党的政治路线不是抽象原则的总和，而是对如何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具体情况的理解。正是政治路线决定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弱，包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

秘鲁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下使党军事化的喋喋不休，以及他们对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这一事实的无知，与其从未以系统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有关。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清晰的理解；他们没有领会新的资产阶级如何在党内产生；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领会把党置于军事纪律体制下会如何加强党内的资产阶级关系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矛盾。他们不仅对其党内发生的这一过程视而不见，反而还主张其他党也应该采取这种错误做法。

但是，上面引用的段落不仅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教训。它也不仅是对秘鲁共产党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历史基本不了解的又一次证明。事实上，它以最简练的形式表达了秘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反革命的所谓解决方案。因此详细审视他们在这个话题上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对秘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性质，以及这与使党军事化的关系的理解的观点。

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对秘鲁共产党来说，使党军事化意味着党主要开展“军事化行动”。他们说有四种这样的行动，即：“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消灭、宣传和武装宣传。”暂且不论说党的主要活动应该始终是开展军事行动，这种说法有多荒谬。至少在进行持久人民战争期间，党开展这些类型行动确实有意义。但显然（也许对秘鲁共产党及其当代追随者来说并非如此显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破坏活动、游击行动和选择性消灭阶级敌人通常都是不必要的（而人民法院判处某些反革命分子死刑与“选择性消灭”也不相同）。可以说人民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行动属于武装宣传的形式，但这与中国和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所做的没有什么新意或不同之处（例如举行阅兵式，军队帮助训练民兵等）。

那么秘鲁共产党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持党的军事化”要采取什么样具体的军事行动呢？这些行动又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早先在文件中秘鲁共产党阐明了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民主革命是以革命暴力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革命暴力进行的，面对复辟我们将通过革命暴力夺回政权。我们将通过文化大革命以革命暴力来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哪怕地球上还有一块地方存在剥削，我们都将用暴力来终结它。

以及：

“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发动的。后者旨在制服和消除任何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并与资本主义复辟企图进行武装斗争，它还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迈进。”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秘鲁共产党认为，武装斗争和革命暴力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核心。因此，考虑到他们一再强调使党军事化“只能”通过具体的“军事类型行动”来“继续推进”，很明显他们视这些斗争形式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关键环节，他们认为武装行动是预防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并且他们认为革命暴力是在秘鲁（新民主革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下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手段。这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形成了直接的脱离。

首先，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不同类型的矛盾，必须通过各种方法来处理。剥削的存在不能单纯通过暴力来消除。例如富民甚至中农参与某种形式的剥削，但这种矛盾不是通过暴力来处理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再分配土地，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来处理的。这是因为，尽管其他阶层的农民对贫困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存在某些形式的剥削，但这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虽然这些斗争发生在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背景下，但它们不是革命暴力的形式。简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秘鲁共产党再次修正了毛主义。

革命暴力甚至不是消除一切形式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手段，这一事实已经通过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尽管暴力地剥夺控制大企业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核心，但对某些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采用了买断的政策。事实上在《“左派”幼稚病与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借鉴了马克思强调在某些条件下与“准备诚实地加入苏维埃政权服务帮助，以最大规模组织‘国家’生产的最有文化、最熟练、最能干的资产阶级组织者”进行一种“特定类型的‘赎买’”的可能性。这是布尔什维克所采用的基本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同样在《上海教科书》中也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收大资本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通过赎买中小资本的政策可以逐步使中小资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小资本的阶级性质与大资本相同。他们都参与了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剥削；他们与劳动群众利益相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虽然中小资本往往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也能被无产阶级强制接受补偿他们资产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工人肯定不会拒绝赎买资产阶级。”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生命线，如果这些资本家被迫接受无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将他们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这对无产阶级将是有利的。

这篇文本中所表达出的无产阶级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微妙和细致的理解，与秘共将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的喋喋不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暴力并不总是消除剥削的关键所在。革命暴力是需要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联合专政），夺取许多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工业），并抵挡外部侵略或内部破坏的尝试。它对于夺取政权是必要的。然而，这种革命暴力只是为消除剥削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各种剥削和不平等的残余在推翻统治阶级之后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时期继续剥削，消除这种剥削主要是通过赎买以及其他不涉及暴力的措施来实现的。

断言暴力是这里的关键环节，反映了秘共未能掌握通过俄国和中国革命经验所学到的马列毛主义经验教训。这种困惑与他们“唯我独革”的政治作风和相关的对统一战线实行绝对军事化领导的想象有关，在这种领导下，一切群众工作都是由军队和其他军事组织开展的。这种作风否定了剥削阶级爱国成员支持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伙伴的基础。

即使存在重复的风险，仍然必须再次强调，对于不同的矛盾（即使是剥削也存在不同矛盾），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消除剥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下需要的各种文化革命。秘共没有进行耐心和明确的历史分析，而是提出了现成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呼吁更多的暴力（他们当代的追随者加强了这一趋势，例如，他们的口号“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

如上所述，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党内右倾和极“左”倾力量都试图将斗争变成内战和/或军事冲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文革期间左翼推广的总体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江青提出群众“文攻武卫”的想法时，她因这种表述而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人的批评，各种派系和极“左”力量利用这种表述来证明把文革变成军事冲突。毛泽东和左翼中的其他领导人也批评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各种红卫兵组织。

秘共把文革的焦点放在革命暴力和相关的把党军事化当作预防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途径上，未能抓住文革过程中主要任务和目标之间的矛盾。秘共以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把预防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等同于用暴力镇压和消灭阶级敌人。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未能掌握动员群众进行斗争（主要不是以军事方式）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的需要，也未能理解社会主义下的阶级关系不可避免在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鉴于这种无知，他们无法抓住群众在各个领域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打破旧思想的重要性，而这对于消除修正主义的基础是关键的。与秘共的断言相反，党内资产阶级阶级不是偷偷溜进党内的一帮右倾分子秘密集团。相反，它是社会主义下阶级矛盾的结果，右倾主要是产生于党内而不是偷偷溜入党内。毛泽东强调，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辩证观点，很容易误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作斗争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标。目标是解决世界观问题：这是根除修正主义思想的问题。[...] 如果世界观没有改变，怎么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呢？如果世界观没有改变，那么虽然这次文化大革命有 2000 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下次可能有 4000 个。”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秘共在毛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即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又一次直接背离并修正了毛主义所倡导的实践。通过推广党的军事化和革命暴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预防资本主义复辟的“解决方案”，他们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应主要通过军事和管理手段来监督，没有群众的主动性。这种社会主义观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对党内资产阶级阶级问题的关键结论。秘共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如何克服群众内化的各种落后观念的明确分析。他们拒绝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有条不紊、耐心地克服“四个全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抛弃。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党的军事化在预防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没有任何正当性（因为它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秘共对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的观点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教训也是根本对立的。

托洛茨基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和“社会军事化”

这就让我们来看秘共提出共产党必须实行军事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

第三，因为我们正朝着一个军事化的社会迈进。通过使党军事化，我们完成了朝着社会军事化迈出的一步，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观点。军事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充满武装群众的海洋，它保障我们夺取政权，并在夺取之后保卫它。我们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延安的抗日根据地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一切都要从枪杆子中长出来：党，军，国家，新的政治，新的经济，新的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展战时共产主义。

这一点和前两个论点一样混乱。在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当然会高度武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民持有武器并组织起民兵，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军事化”。秘共和当代的贡派，如巴共红，一再强调，使党军事化不仅仅意味着发动人民战争或武装党。相反，他们强调党的军事化意味着党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军事化行动”。因此，对社会的军事化应采取类似的理解，除非他们完全是折衷主义者，词语对他们毫无意义。必

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秘共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所以，当他们称战争为“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把社会主义称为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要从枪杆子中生长出来”，他们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在社会主义下，人民的主要活动形式应该是“军事化行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在本质上应该是军事化的。

在这方面，秘共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引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期间奉行的一个具有误导性名称的具体政策）非常具有启发性。事实上，他们将“战时共产主义”作为目标进行推广，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是一个“军事化社会”的相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托洛茨基在俄国内战结束时所提倡的政策。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政策是一个政治错误，如果不纠正的话，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

在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在被众多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国内反动势力攻击，经济陷入崩溃，全国饥荒和疾病肆虐的情况下，他们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和特殊手段以确保内战的胜利。为了说明他们面临的困难，详细阐述当时的情况是有帮助的。1918年，许多农民开始为自己保留大量谷物盈余（这对战争和给城市提供食物都很需要），工业中的大规模旷工正在发展，一些行业的工人也在黑市上自行出售货物和备件，以便购买基本物品（价格正在迅速上涨）。这些行为等同于猖獗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加以遏制，将会厄运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党能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和一些农民中推动某些形式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政治纪律（例如共产主义“星期六志愿劳动”），但他们不能在足够广泛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以防止许多这些问题。因此，在群众的政治意识不足以发展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被逼入绝境，被迫使用一种行政中心化和纪律的形式，以确保经济不崩溃并赢得内战。简而言之，他们不得不利用国家权力强迫一部分农民和工人阶级维持经济，以便战争事业可以继续推进。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一再强调，这些措施是临时的，只是由于党陷入极端困难的局面而被采用。

在《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阐述了这一时期采取的一些措施：

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它将中小型工业及大型工业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以积累为军队和农业人口供应的物资。它实行了对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禁止私人粮食贸易，并确立了剩余征用制，根据这一制度，农民手中的所有剩余产品都要登记并按固定价格由国家征购，以积累粮食储备以供应军队和工人。最后，它针对所有阶级实行了普遍的劳动服务制。

此外，还推行了劳动军事化制度。这包括了一个胁迫和劳动纪律制度，工人如果逃避或懈怠劳动，会被送到惩戒劳改营。它还包括将所有工人组织成劳动单位，这些单位的运作严格程度“与军队对军官的要求和作风一样严格”。同样，党也采取了从农民处强制征购粮食的政策（例如非自愿地征收剩余粮食，有时甚至不给足够的补偿），以及“国有化”工会，极大地限制了这些群众组织的内部民主，并将其置于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直接行政控制之下。

鉴于内战和饥荒以及广大工人和农民中的一部分缺乏纪律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政策由于必然依赖行政和官僚的方法，加剧了当时的各种阶级矛盾。例如，像交通人民委员部政治局和交通工会中央委员会这样的国家部门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使它们能够修复铁路和经济，但另一方面滋生了各种官僚主义、非民主和资产阶级行政作风，导致国家机关和“国有化”的工会开始与群众脱节。从农民那里征购所有剩余粮食也产生了类似的动态。

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成功和失败，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首先，他指出这项政策是被当时的形势所迫的，但总的来说尽管有各种错误和过激，这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我们创造的和谐体系不是由经济要求、考虑或条件决定的，而是由战争决定的。在我们发现自己陷入空前的困境时，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又不得不忍受一系列内战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执行我们的政策时，我们在许多案例中可能

犯了错误和走向了极端。但是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条件下，这项政策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诉诸对一切剩余库存实行全面且立即的垄断，甚至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充公。那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经济体系；那不是由经济条件提出的措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战争条件迫使我们采取的。”

他还指出，尽管在内战时期它是一项必要和在很大程度上正确的政策，但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一项能够将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释放相应的生产力发展的政策：

“正是战争和毁灭迫使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它不是也不能是对应于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一个小农民国家行使专政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用农民需要的制成品来换取粮食。这是唯一符合无产阶级任务的粮食政策，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并引领其完成胜利。”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秘鲁共产党提倡社会主义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一个“一切从枪杆子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并声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展了战时共产主义”，这种观点非常奇怪。正如上述引文所显示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临时措施，列宁描述它为“权宜之计”，并指出它“不可能是对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秘鲁共产党不同意列宁对这一时期的分析，而是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模型。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劳动被军事化地组织，一个军事化的党，为了“推进”其军事化，主要从事“军事型行动”。军事，军事，军事！

这一切是多么混乱！多么扭曲了马列毛主义的教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形势”以及这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想法而辩解的。多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冲动和热衷暴力！

秘共在这里透露的是，他们所谓的马列毛主义“新合成”要么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及与之相关的对俄国和中国革命教训的基本认识）的深刻无知，要么是对这些教训的有意识扭曲，以提升贡萨洛为所谓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第四把宝剑”。

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贡萨洛和秘鲁共产党提出的谈话般的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化社会”没有什么新意，大部分是对托洛茨基在俄国内战结束时提出立场的重复，也正是列宁指出的那种立场，它冒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让我们更仔细地检查一下。

随着俄国内战接近尾声，布尔什维克党正准备进入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在内战极为艰难的年代，他们只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来克服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但是到1920年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打败了反革命和外国入侵，一系列问题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实际上，他们处在十字路口：他们可以继续社会的革命转型，或者以各种形式保留现有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关系。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与战时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方法有关，这些方法倾向于加强国家机关（特别是负责各个生产领域的机关）和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倾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列宁和斯大林一方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方的党内危机出现了。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得出结论，有必要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评估这些经验的成功和失败，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任务上。然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对这种做法不满意。早些时候，在该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路线遭到了失败。在那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主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及以后的整个过渡时期，劳动和工会的军事化（及相关的一人管理体系）都是必需的。这是由一种生产力决定论所辩解的。例如，在为代表大会准备的一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主张“必须坚决、系统、持续不懈、严厉地开展反对逃避劳动的斗争，特别是公布逃避劳动者的黑名单，组建由这些逃兵组成的惩戒营，最后把他们关进集中营。”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关于劳动军事化必要性的提议。首先，他坚持认为，“大多数工人必须被束缚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被要求调换工作，被告知去做什么，接受命令。”

他还坚持认为，“在它消失之前，国家强制将在过渡时期达到组织劳动的最高程度。”他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把工人阶级整个时期军事化的必要性来解释所有这些：

军事化[劳动]在没有工会本身军事化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每个工人都觉得自己是劳动的士兵，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如果下达调动命令，他必须执行；如果他不执行，他将是一名逃兵，将受到惩罚。谁来照看这个？工会。它创造了新的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军事化。

托洛茨基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秘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军事化社会的强调，是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应该在某种军事控制下服从党和国家。这与贡萨洛主义关于“同心圆”党的建设以及党对统一战线（因此也是统一战线内的工会组织）进行绝对领导的必要性的观点一致。这实际上使工会的作用降低到在生产中执行军事纪律，是一种极端的行政中心集权，扼杀了群众的主动性。

托洛茨基的观点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否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临时和特殊措施的临时性质得以重申。这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路线，战胜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然而，在1920年底，当党开始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临时措施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掀起了风波，制造了列宁所说的“党的危机”。11月3日，在第五届全俄工会大会上，托洛茨基认为党必须“收紧战时共产主义的螺丝”，并主张对工会进行“清洗”；即从上面移除任何不同意劳动继续军事化和强制方法的工会领导人，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机器中一些官僚倾向的人。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时指出，分歧在于对群众的基本“不同方式”，赢得群众和与群众“保持联系”的方式。

简而言之，托洛茨基的方法——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失败——主张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与列宁的关系有根本不同。列宁反对社会和工会的军事化；他认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也不是为胁迫而设计的，而是为教育而设计的。”此外，他警告说，托洛茨基的方法（包括他坚持党对工会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党随时“清洗”工会领导层的能力）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秘鲁共产党和今天的贡萨洛主义者都重蹈了这个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当时的共同意见的常见错误。这些错误立场的共同点是假设党的无产阶级性是有保证的，因此，党对统一战线、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绝对权威自然地保证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显然是对列宁主义基本教训的修正，这些教训在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列宁的路线最终占了上风，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集权制和将劳动军事化进一步演变为官僚主义、傲慢自大、小职能主义和干涉工会的麻烦行为”。中央委员会还重申，需要摆脱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其他措施，因为到那时内战基本上已经赢得胜利，而这些措施已经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

列宁还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党和国家，以便它们可以保护广大群众免受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倾向的侵害。他强调，这种独立性反过来将有助于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的侵害，并让他们保护我们的国家。”

从所有这些来看，秘共的社会主义路线事实上是深刻的修正主义。事实上，通过推广社会主义作为“军事化社会”的理念，并声称目标是发展“战时共产主义”，秘共及其当代追随者正在抛弃列宁，而采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立场。这完完全全是修正主义。这表明他们在历史知识上严重缺乏，有深层的资产阶级领导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应该如何同广大群众相处这一问题上与马列毛主义根本不同，并且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热衷于暴力和军国主义。简而言之，是一个散发着修正主义恶臭的垃圾堆。但对秘共来说（尤其是对当代的贡萨洛主义者来说）国际共运的历史细节和极为重要的教训太麻烦了。当一个人愉快地宣称“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时，还需要什么呢？阶级斗争的教训在他们的千年王国幻想中被简化为琐事细节。

总结

秘共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列毛主义的关键经验教训。如上所详述的例子中，他们不是结合毛主席和文革的关键教训，而是倾向于采用林彪的分析。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提出类似杜林的全知全能的天才观点；在社会主义问题和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上，他们抛弃了列宁，采取了托洛茨基的立场。与此同时，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的成就也必须被认可：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解放的前提，而这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

与贡萨罗“综合/定义了毛主义”的夸夸其谈相反，事实是就贡萨洛的理论贡献而言，其中的优秀成果并无新意，新的东西则毫无优点。尽管秘共领导着秘鲁的革命运动，但他们的领导最终无法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来指导运动，并在秘鲁浪费了革命局势，最终采取了“左”倾错误路线。这并非不可避免的。尽管秘共起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本可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总结自己的成败，纠正各种错误。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在其《政治总路线》中将许多错误想法和错误倾向确立为政治基础，并坚持这些错误想法具有普遍效力。这无疑促成了秘鲁革命的失败，遗憾的是，甚至在三十年后，它也还是没能重整旗鼓。

如今，各种贡派团体已经建立了新的国际组织。他们正在推广各种受贡萨洛和秘共启发的修正主义理论，并称之为马列毛主义。国际共运在贡萨洛和秘共的理论观点及其对毛主义理论的贡献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斗争。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引发进一步的辩论和必要的斗争。我们也希望同志们能指出我们在这篇分析中存在的短处和错误，并对此进行阐述。

第五部分 宣传内容

本部分是用来专门刊登宣传内容的文章，除了一部分革社认为需要的政治内容外，这部分文章也具有更多的工作性质。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革社（RSF）编辑部

如今，我们东风及斗争公社的同志们达成了一个马列毛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号召我国更多优秀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加入统一战线。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一些优秀的同志能够加入我们统一战线目前正在进行的种种革命工作，发展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1. 对于想做电报群的宣传和电报群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东风同志们的组织。
2. 想做时评、日报、月刊等宣传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则邀请你们加入斗争公社的组织。
3. 想专门创作理论方面或其他方面较高质量文章创作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加入革社（RSF）。
4. 而想做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选择加入革社（RSF）或东风。
5. 想做翻译工作的（专门翻译统一战线的组织文章以及翻译国际重要的文章为中文），请联系统一战线邮箱。
6. 组织上的事宜（如代表自身组织加入统一战线组织或合作等）联系斗争公社、东风、革社（RSF）任一组织说明情况即可。

我们会在本文末提供这里提到的所有组织或机关的联系方式。

东风：<https://t.me/MarxismLeninismDongfeng>

斗争公社：douzhengyuekan@proton.me

革社（RSF）：RSF-kan@tutanota.com

统一战线邮箱：sinomlm@tutanota.com

第六部分 斗争艺术

这部分主要关注革命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斗争手段或技术。这里整编了一些国外内各方面同志的相关成果的文章，具有很突出的帮助实践作用、推动革命工作的意义。

元数据-隐形的追踪器

革社 (RSF) 编辑部

1. 什么是元数据

关于元数据，对比与普通的数据，如聊天记录，本机存储的文件等等，元数据没有具体的数据内容，而是记录这些数据相关的其他信息，如通讯在什么时间进行，设备的开关机时间是何时，手机用户在哪个时间段与何人进行通讯，用户何时打开了微信，在微信中使用了什么样的功能等等。这些元数据相较于实际数据看似价值更低，但是它们依然威力无穷，可以使政府的监控机构轻松获取一个人的相关身份信息。

2. 元数据如何产生

任何基于用户活动所产生的数字信息内容从理论上都含有元数据（不论是聊天记录，还是图像、影像、音频、文档甚至是任何软件和系统的正常运行记录）然而，并非所有的软件都会收集和记录这方面的数据，针对元数据方面的渗透主要由私有软件在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作为中特监视器的微信，每时每刻都在收集使用者设备的元数据，记录着设备的每一个操作，加密储存在设备本地，并定期向中特的国安数据库上传。这就是为什么微信往往占用设备大量存储空间和上传流量的原因）

3. 如何防范元数据的泄漏

从软件层面来看，防范元数据的最好办法是避免使用私有软件（尤其是避免使用中特等威权政府所掌握的私有软件，如微信、WPS、各种网盘）使用开源的，或具有隐私保护功能的软件来替代它（例如聊天软件用 session 替代微信，用 tor 代替非匿名浏览器，用 Libreoffice 代替 wps 和 ms office，用 duckduckgo 代替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

（注：如果使用安卓设备，可以从 F-DROID 网站寻找相关替代品 网址是：www.f-droid.org/）

从数据层面来看，一切用户数据虽然在产生的过程中便自带元数据，但元数据可以通过额外的手段从原文件中去除，常见的清除元数据的工具有：

全平台兼容的 exiftool

网址：exiftool.org

主要兼容桌面平台和苹果端的 dangerzone

网址：github.com/freedomofpress/dangerzone#dangerzone

使用上述清理元数据工具，可以有效避免本地数据和网络发送数据的元数据泄漏，使用者应该定期使用上述软件清理设备内的敏感文件元数据，并在进行网络数据传递时，提前清理所需发送内容的元数据，隔绝元数据泄漏，才能确保个人的相关信息不会被窃取与监视。